



PROBE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探 索



ISSN 1007-5194
CN50-1019/D

2025. 3

哲学社会科学 双月刊
2025年5月

探
索

二〇二五年第三期

PROBE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C S S C I 来 源 期 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入编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
重庆市社科规划资助期刊

致作者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探 索

2025 年第 3 期 总第 243 期

2025 年 5 月 15 日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晓吾

副主任：王 胜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贵 王炳权 王炳林 王洪树 田鹏颖
刘同舫 杨凤城 佟德志 张贤明 孟天广
陈金龙 吴晓林 吴增礼 周 平 徐 勇
项久雨 秦 宣 蓝 江 燕连福

总编辑：金华宝

副总编：王 慧

本期执行编辑：陈 卓

本期英文译校：陈 卓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0-1019/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7-5194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局 78-84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号信箱）

国外代号：BM4024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 011153

地 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160 号

邮 编：400041

电 话：023-68593010

投稿系统：<http://www.tszss.net> 或 <http://suta.cbpt.cnki.net>

微信平台：tansuoazhi

印 刷：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每册 15.00 元 半年价：45.00 元 / 全年价：90.00 元

目次 | CONTENTS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境遇 晏扩明 1
- 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 丁 燃 15

政治学研究

- 标识性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 张淑娟, 李庆堂 29
- 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路径
- 以贵州省为例 李永皇, 赵 潜 43

政党治理

- 数智化党建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孙会岩, 侯劭勋 57
- 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联建共建机制研究
- 以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360为例 薛美琴, 马超峰 70

公共治理

-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演变脉络与优化路径 吴春宝 82
- 赋能与使能：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 张邦辉，李一博 96
-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逻辑递进、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 康健 115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 增强党的青年工作文化力量的实践经验与现实启示 冯刚，王凯宗 130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精神富有的理与路 徐昇，张志勇 144

Contents

No.3 2025 (Serial No.243) (Bimonthly)

1.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21st-Century Marxism	YAN Kuoming	1
2.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scourse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DING Ran	15
3.Iconic Concep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Shujuan, LI Qingtang	29
4.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of Embedded Communities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A Case Study of Guizhou Province	LI Yonghuang, ZHAO Qian	43
5.Digital Intelligence Party Building Empowers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 Value Implication , Realistic Challenge and Enhancing Paths	SUN Huiyan, HOU Shaoxun	57
6.Research on Joint Construc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the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360 in Nanjing South Railway Station Area	XUE Meiqin, MA Chaofeng	70
7.The Evolutionary Context and Optimized Pathways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U Chunbao	82
8.Empowering and Enabling: Important Paths for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ZHANG Banghui, LI Yibo	96
9.Logical Progress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al System	KANG Jian	115
10.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 of Enhancing the Cultural Power of the CPC's Youth Work	FENG Gang, WANG Kaizong	130
11.Principles and Paths for Achieving Spiritual Enrich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XU Sheng, ZHANG Zhiyong	144

引用格式:晏扩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境遇[J]. 探索, 2025(3):1-14.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境遇

晏扩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和把握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与前进方向,进而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即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以及携手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愿景提供理论指导与价值指引。21 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社会风险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建设实践探索中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全球南方”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面对“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新境遇与新命题。从理论脉络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叙事,是在全球体系失衡、生态边界逼近与技术伦理困境日益突出的现代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度认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从资本全球化到劳动全球化、从西方现代化到全球现代化、从革命型话语到发展型话语、从一元价值中心到多元价值共识等诸多维度的理论转型,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长足发展,并实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性重建,更好引领 21 世纪的全球化与现代化。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001-14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伊始便高度重视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变革与共同进步。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相互交织与不断深入,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性问题也日趋复杂,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跨国界、跨领域的共同挑战。在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举不仅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省思,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机遇与挑战,彰显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基于全球共同利益对人类社会整体未来发展的全面考量与价值诉求。正因如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把握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线索。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议题

21 世纪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拓展和深化使得国际社会对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以后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失望情绪与悲观言论日益消解,对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及其前途命运的研究日益增加,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发展的研究也逐渐增多^[1]。2021 年《中共中央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项目“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24SGC031),项目负责人:晏扩明。

作者简介:晏扩明,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2] 这为深入研究和探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

(一)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解释“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进入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发生巨大变化。以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全球市场更加多元。生态危机、贫富分化、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赤字等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冷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受到巨大冲击,世界亟需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科学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同时也迎来了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机遇。

从聚焦何种主要矛盾的角度看,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聚焦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压迫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聚焦于如何在民族国家层面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聚焦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对社会文化的控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型剥削问题。那么,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所要聚焦的主要问题又是什么? 当前一个显而易见且令人焦灼的问题是:信息化时代资本全球化扩张带来的人类整体性危机日益加重,全球各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愈发加深与全球性问题日益多元化之间存在广泛矛盾,我们应当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进而言之: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3]5-6}。由此,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与前进方向,进而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成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议题。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反映 21 世纪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4] 那么,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又如何抓住机遇与迎接挑战呢? 一是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在面对 21 世纪社会新思潮时的分析方法,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等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的说明在当下依旧具有科学性,资本主义妄图以恢复经济活力来压倒一切社会矛盾的做法和措施并不能阻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再次出现恶化^{[5]xxii}。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应对策略不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需深刻反思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模式对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深远影响。二是回应全球化、数字化、生态危机等新问题,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表达和理论重构。基于互联网应用的信息化革命和生命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亟待回应的时代理论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遭遇的新情况与新难题”^[6]。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直面世界局势与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化带来的新考验。三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关联与前景。“通览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7]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续,更是对当代世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创新的过程,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注入新的活力。四是以“为人类求解放”为理论总主题,科学解剖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新变化新特征,在 21 世纪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的进程中探索实现全人类

解放和共同发展之路。因此,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注重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论体系”^[8],能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的发展走向提供理论解释与思想指引。

(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回应

面对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和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2013 年 3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①。2017 年 2 月 10 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决议^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在追索“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体现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回应人类共同问题上的整体性思维方法。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问题直接相关,因而它的提出“成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支点”^[9]。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构成“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基石”^[10]，“是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支柱”^[11]。在理论基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的创新性发展”^[1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人类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理想与当前全球治理需求相结合,“为 19 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找到了当代叙事方式”^[13],促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4]。

在价值立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力图破解资本全球化导致的更深层次异化,推动建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命运与共的价值内涵、多元现代性的批判扬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等文明要素的创造性融合。”^[15]因而,“从价值立场和行动原则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的窠臼,彰显了世界主义立场”^[16]。在世界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问题,很好地诠释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界性”^[17]。在面对生态危机、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深刻揭示了文明与发展的逻辑关系,牢牢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18]。总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尝试以全球视野破解“历史终结论”“修昔底德陷阱”等西方叙事逻辑,延续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发展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更通过理论主题从“一国”到“人类”的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跃升,同时也道出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境遇。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史观基础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全球社会的结构性联系决定了单个国家无法孤立地面对生态危

^①原文是“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参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04.

^②2017 年 2 月 10 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在这份决议里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也是这一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参见:共同命运——政论专题片《必由之路》解说词(第八集)[N]. 人民日报,2018-12-19.

机、经济不平等、技术风险与公共卫生等全人类共同问题,各国必须以命运相系的共识达成全球协作的政治意愿和制度安排。这一理念的史观基础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关于生产力进步和全球社会联系不断加深的分析进路一脉相承。如果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视域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表达”^[19]。而其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支点”,必然在理论与现实性上成为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要素。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省思与扩展。

(一)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世界市场的形成终将人类社会连成一个整体,最终形成全球性历史。这一理论为分析世界历史进程的动力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20],而明确系统地阐述世界历史理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市场原则的普遍性,即“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0]538}。这意味着,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发展、交往扩大和市场全球化的物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开始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向整个世界扩张,催生了以世界市场为主要依托的贸易全球化趋势。”^[21]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全球扩展,世界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会日益增强,原本局限于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社会问题逐渐全球化,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命运紧密相连,历史的全局性运动从地理分界线、不同民族的边界和不同国家的界限中超越出来。马克思对此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2]35}。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球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日益相互依存的状态,“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更是阐明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向,为我们进一步科学分析并精准把握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特点及其规律提供了基本遵循”^[23]。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赖以成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是我们的共同愿望”^{[3]22-23}。可以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在当前世界历史进程中如何实现、维护和发展世界人民利益的回应”^[24]。与之相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合作的具体路径与方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超越单一的民族或国家利益,通过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公平与正义,促进全球社会的持续进步,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现实条件。为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回应全球发展鸿沟、国际安全困境、人类文明冲突等世界之问,具有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文明理念、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进步绘制未来图景的文明特质^[25]。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

共同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呈现,更是对全球问题的时代回应。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史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史观基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表明,全球历史的推进是由世界市场的全球扩展与生产方式的全球变革共同推动的,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6]¹⁶⁹。因此,从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涉及经济领域,还会渗透到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所在——人类历史最终将走向一个没有国别地域限制的全球社会。从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再由世界历史走向人类的解放,这一发展脉络是马克思主义立足于“改变世界”对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的史观判断。“从过去的世界历史中发现客观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其目的是为把握人类未来命运提供支撑。”^[27]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革命、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供应链的全球布局等,使得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远超以往。全球化已不再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现实。世界历史不再是若干国家间互动的叠加,而是一个结构化的整体过程,任何一国的发展均与全球体系密切相关。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化了全球社会作为整体的历史建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代语境中延续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强调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是共同的,其解决亦不能依赖某一国家单边努力,而必须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联系空前紧密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没有失效,反而因其唯物史观基础而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实践意义。在世界历史理论所提供的史观视域中,无论是气候变化、贫富差距、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还是跨国流行病等危机,都是任何单一国家或地区的政策与行动难以有效应对的全球性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全球合作,而非某个单一国家的孤立行动。无论是生产力的共同发展,还是资源共享与危机应对,都必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而非通过冲突、独霸、例外来实现国家利益。这种理念也得到西方学者的支持^①。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说,全球化世界的有效治理仍然需要将理性战略行为与信念和价值观相结合,以此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冲突与矛盾^[28]。

(三)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表达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立足时代要求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表达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要解决何种问题。从本质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把马克思所预见的“世界历史进程”从物质运动延伸为价值整合、从生产方式的连接发展为命运的共同承担,最终阐明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全球协同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世界历史”概念所涉及的实践目标与价值基础加以具象化,将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转向合作共赢而非资本主义的帝国逻辑。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曾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极端不平等的结构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试图打破这种结构和逻辑,提倡以平等、互信、合作、共赢为基础的 全球治理秩序,既具

^①“我想让人们意识到,即使两国之间存在竞争,我们依然可以合作。”参见:中国网专访哈佛教授约瑟夫·奈:中美有竞争,更要合作[EB/OL]. (2019-01-12). http://cn.chinagate.cn/news/2019-01/12/content_74365906.htm? f=pad&a=true.

有鲜明的反对压迫与不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还在全球制度层面推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结构愿景。

传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侧重于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机制的揭示与批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这一理论被重新诠释为面向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社会建构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逻辑的超越,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想在全球维度上的现代表达。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0]196}。这意味着,人类普遍交往的社会现实是世界历史的直接体现,代表着“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已然成为现实。并且,“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6]188}。从世界历史理论来看,世界历史的最终落脚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脚点同样是人,而不是某一国家、地区、种族或阶层。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个人而言,虽然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弊端,一段时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类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但同时,世界市场的形成也为全球劳动者和民众提供了联合与合作的空前机会。强调人类命运的共通性和互联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个人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才能完成自由劳动和自我实现。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呈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应对世界历史发展中全球性问题的客观实践方式。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实践境遇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议题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与前进方向,进而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以及携手实现人类共同的发展愿景提供理论方案。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既是理论传承,也是实践必然。从 21 世纪的时代特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面临三种实践境遇: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展及其自身面临的潜在社会风险;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探索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三是“全球南方”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这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回应的重大议题。

(一)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展及其自身面临的潜在社会风险

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开创的社会化劳动和世界市场为全球化、现代化开道铺路,全球化、现代化又为资本主义的巩固和扩展扎根奠基,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形成一个世界体系”^[29]。资本主义与全球化世界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全球秩序具有强大影响力。到了 21 世纪,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解决其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反而在全球范围内放大了这些矛盾和问题,由此造成强大的破坏性。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加速了社会生产的飞跃式扩张,与此同时带来了生产关系调整滞后、劳动异化强化、全球治理机制滞后于资本流动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建立一个与其经济影响力同步扩展的全球法律和强制秩序”,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趋向于空间与政治权力的地域分裂”^[30]。因为,现代民族国家在早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资本与

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不断放大,形成了全球资本流动与国家主权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与此同时,资本拜物教“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而且还不断蔓延并向全球扩散;不仅伴随着持续的战争、暴乱、侵略、杀戮,而且还产生了生态危机、资源短缺、人口爆炸、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疾病流行等严峻的全球性问题”^[31]。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原子能、生物科学等新兴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跃迁,开始以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绿色资本主义等新的表现形式尝试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再塑造。与此同时,由于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变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全球秩序的影响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世界秩序的塑造是通过军事霸权、金融规则制定和文化输出来完成的;经过冷战后的结构性改革、全球化背景下制度性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世界的控制变得更加强烈,其手段和方法趋于多样化,跨国公司、国际金融组织、信息传播体系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控制、影响世界秩序的重要手段。但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方式正在变革,其自身内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受到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普及,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难以维系。阶级分化问题、种族问题、文化认同冲突问题等不断凸显,全球产业链的转移与分散进一步激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矛盾,不断挑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源的再分配难题。

资本主义虽依旧维系全球主导地位,但其所带来的诸多全球性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生态失衡、治理失灵、文明冲突等,已逐步显现出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度性困境。特别是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语境下,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显露出其对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的桎梏。在自媒体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其内部民众对于老套的政治谎言更是表现出反感与冷漠。后发现代化国家已然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片面认知,不再迷信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所谓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念,并且开始积极反思自身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发展机遇与复杂挑战,重思自身在复杂的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日益频发,还是国际社会不断演化出来的潜在困局,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产生了重大挑战。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从客观上面对全人类发展的共同性问题,在发展路线上做出有益于各方的实际改变。

(二) 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探索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

1991 年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实践并未停止。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践行者,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倡导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致力于打造更加公正、平等、包容的全球治理结构。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践面临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挑战。就经济基础来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需要广阔应用场景,因而需要组织动员各类发展要素参与其中,也需要配合合理的需求政策,一体化推进技术进步、产业变革、市场扩大和需求升级”^[32]。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具备资源动员能力强、战略规划明确等特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展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协调推进力。

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探索,“取得了诸多独

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33]。但相较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高性能材料与工业软件等方面仍然处于劣势。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等仍存在明显差距。同时,中国在医疗保障、教育公平、社会福利等方面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比较明显。在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在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叙事上的双重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产品在信息时代表现得更加复杂多样,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等思想意识渗透严重。在此情形下,文化多样性、文明冲突等问题日益突出。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不同文明体如何实现共同发展、如何平等互鉴地推动全球文化与文明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错误地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视为对资本主义自由秩序的挑战,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社会主义制度威胁论”和“文明威胁论”,从而加剧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自身制度和价值观的外部话语压力,其本质上就是20世纪冷战思维的21世纪翻版。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构建多边对话机制与多元叙事空间来加以应对。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在政治制度上不断增强自身的制度效能与人民认同,防范西方价值观输入和“颜色革命”干扰。在发展模式、文化交流、治理规则等方面推动多边合作与制度互信,通过推动构建以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全球事务、化解结构性矛盾,从而在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与可能性,以实现全球发展利益的均衡分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参与全球秩序的当代建构正成为影响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变量。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仅回应了全球性问题,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全球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可行路径。

(三)“全球南方”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

“全球南方”是一个具有经济、政治和历史含义的概念。虽然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地理上处于南半球,但其本身并非单纯由地理位置而得名,其含义更多侧重于描述那些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称为“全球北方”)而言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展水平等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般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一些岛屿国家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通常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面临较高的贫困率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国际上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全球南方”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其重要根源和原因并非自身传统的生产方式,而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明显具有普遍崛起之势,旧有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国际秩序尚未成熟。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区域组织、南南合作、“金砖+”机制等平台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协调,正在逐步改变长期依附于“全球北方”的不平等关系格局。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已成为塑造新型国际秩序的重要变量,其崛起对全球力量格局的重构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全球议题中的话语权也日益上升,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数字鸿沟、公共卫生等问题上展现出更强的集体诉求与主动参与的态势。但“全球南方”的内部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国家之间的制度类型、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稳定性不尽相同,它们在全球资本逻辑主导的结构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被排除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话语之外,这也决定了其整体性崛起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制约,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反对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实现持续自主中心式的发展”^[34]。而人类命

运共同体则试图打破这种结构性排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包容性更强的发展平台与共赢机制。在全球格局深刻重塑的背景下,“全球南方”逐渐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实际上,上述三种实践境遇又可以统一于世界市场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中,表现为全球生产方式变革所带来的世界历史新诉求,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既带来人们交往的扩大和发展的机遇,也带来社会矛盾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矛盾多局限于单一国家或地区,在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全球卫生危机、国际经济不平衡等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这表明,随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展,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单一国家,而是跨国界、跨地区、跨意识形态甚至是跨文明的普遍性问题。因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需要正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类交往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格外强烈地凸显出来,以至变成人类命运攸关的紧迫课题”^[3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离不开对上述全球实践境遇的深刻反思。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要回应以上重大时代课题,同时在回应和解答中获得自身的发展。

四、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实践境遇中可以看出,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对全球性问题的整体性回答,其显著特征是将理论重心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批判”拓展到人类整体的“命运共建”;从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革命”过渡到“全球治理”。这些理论变革并非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在全球体系失衡、生态边界逼近与技术伦理困境日益突出的当代境遇之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与规范性话语体系的构建。

(一)从资本全球化到劳动全球化

在资本主义扩张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其独特的制度视角和价值逻辑,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发展方向确立了理论靶向。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与资源最优配置,其后果是导致地区发展更加不平衡。这种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强化了不平等的结构性特征,使得弱势国家在全球规则制定、技术获取和价值链分配中处于相对劣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逻辑在于:“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的驱动力,不是某国或某个国际集团的资本扩张动力,而是世界各国与相关当事国的人民的共同福祉和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之间在和平发展过程中的共同需要。”^[36]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经济驱动背后所隐藏的殖民性、排他性与异化机制。这些机制在 21 世纪以“规则输出”“价值观先行”“人权话语干预”等形式出现,借助国际组织、金融系统与文化传播方式,将资本主义制度优势合法化,从而维持世界秩序的等级化与不平等分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推动劳动全球化的意向,劳动全球化构成了对资本全球化的历史性超越,致力于将资本的全球化逐步转变为人的劳动的全球化。”^[37]这种劳动全球化的历史逻辑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上质疑资本逻辑主导全球秩序的合理性,并力图超越资本积累与利润最大化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从全球制度演进的历史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以往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范式中所蕴含的“国强必霸”式霸权主义的深刻反思,同时是对以发展权为核心的全球公平理念的充分肯定。劳动全球化意味着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开始成为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所谓劳动全球化,并非简单的劳动力流动,而是强调全球生

产体系的合理再配置,以人的创造力和合作能力为核心,建立一种公平、公正、包容的经济发展机制。这一理念不仅重新确立了劳动价值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基础地位,也预示着国际社会开始从以资本逻辑为中心向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核心的秩序重构转变。因此,从资本全球化到劳动全球化的转向,既是全球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的历史必然,也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对全球正义与公平发展道路的制度性探索与理论性回应。

(二)从西方现代化到全球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文明/野蛮”的二元划分模式,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共生与互鉴,反对文化优越论与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主张构建平等、多元、包容的世界秩序。这正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全球治理话语中所展现出来的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通过平等协商、文明互鉴与文化多样性,打破“文明优越论”与“现代性神话”,推动形成以共存共荣为核心的新型全球文明观。“历史一再表明,沿袭西方‘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叙事下的等级性文明没有出路,人类亟须寻找新文明观。”^[38]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对传统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一次理论反驳,并尝试提出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现代化新路径。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其世界意义的哲学延展,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鲜明的时代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所推进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均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思想指引,强调发展权与参与权的全球普惠性,主张各国人民是现代化的共同建设者与受益者。这一理念的世界性与普遍性,使其能够兼容多样化发展路径与文化形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人类自由联合”。

从“西方现代化”向“全球现代化”的转变,实质上是对长期由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叙事的一种超越。传统西方现代化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以“自我—他者”区分为基础的等级性秩序。在这种秩序中,“非西方世界”往往被塑造成现代性的“他者”,其现代化发展道路被限定在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模仿和趋同中。然而,这种以单一现代化经验普遍化为世界标准的逻辑,早已在多极世界的现实中面临瓦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超越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主张各国应根据自身历史文化条件和现实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这种“全球现代化”观念既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排他性,又避免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碎片化,力图在全球合作中重建现代化的共同价值与实践方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解释框架,更重塑了全球现代化的可能性:它强调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共同价值,以文明互鉴替代文化征服,以共商共建共享替代强权主导,为构建真正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奠定了价值基石。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现实维度与全球视野,使其不再局限于阶级斗争的旧叙事,而是走向了对整个人类命运、文明未来的系统关怀。

(三)从革命话语到发展话语

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各国社会结构的深度变化,革命话语难以覆盖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多样化问题与系统性风险,人类社会亟需一种能够包容差异、协同发展、构建和平的全新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承载的不是阶级对抗与制度冲突的政治叙述,而是一种具有超越性与建设性的全球政治哲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我们”而非“敌我”,主张

协同而非斗争,提出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安排,逐步构建一种以人类整体福祉为导向的新型全球治理结构。在此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外交语言的更新,更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话语范式的根本重构——从革命话语到发展话语,这标志着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应对全球复杂现实中的自我更新与理论跃升。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了国际交往的主体间性,是一种新型的建构性世界观,旨在建立推促世界形成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新世界秩序与治理体系,这恰恰是全球善治秩序的具体呈现”^[37]。这一理念强调“共同命运”的历史事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现实要求与“共赢未来”的价值目标,深刻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抽象的自由走向具体的普遍解放的历史追求。

在当前世界多重危机叠加、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价值理念不仅唤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合作”“发展”“和平”“正义”的集体共鸣,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应对时代难题的持续生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到底是要求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一切文明形态的国家一道,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共同治理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共享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正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问题,即如何看待并处理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的共同治理问题。从这一角度看,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用新的发展话语表达出来。革命的本质并不在于暴力对抗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对现实秩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革命话语与发展话语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革命话语提供了价值取向与批判逻辑,发展话语则提供了实践路径与制度蓝图。这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包含着推动世界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结构性危机的治理任务。

(四) 从一元价值中心到多元价值共识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特性,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和基本特征。”^[39]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关照世界的未来走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化解全球治理出现的紊乱,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冲突与矛盾,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创造更加合理、平等和多元的新型世界秩序。这就突破了冷战时代制度对抗的旧逻辑,提出了超越制度分裂与地缘冲突的多元共生之道。在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关切当前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发展前景,在实践中指出全球结构性矛盾的转化之路,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面对“世界之问”时作出的最具原创性与普遍性的回应。其价值旨归不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对物质资源再分配的关注,更在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制度形态的国家之间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去中心化”努力,即从不断强调“一元价值中心”发展为不断推动“多元价值共识”的转变。这不仅体现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历史逻辑的深刻回应,更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价值引领。

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方案的战略表达,更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创性发展的重大成果”^[40]。它通过回归人类历史整体性、关注普遍解放目标、批判资本中心逻辑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观念推向了全球化时代的新高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共同价值的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反映了不同文明间的价值共识,在联结共同体成员‘共同命运’方面起着纽带作用。”^[41]尽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断阻碍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的进程”,尤其是

近些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倾向加剧,“但人类命运日益休戚与共的必然趋势不会被打破”^[42]。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不仅关乎中国对全球问题的回应能力,也关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能否完成从“民族革命话语”向“全球合作话语”的范式转换。

五、结语

总体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被日益视为连接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全球现实的重要中介;从“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基本矛盾”三重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分析,有助于构建一个逻辑严整、结构清晰的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框架。在这个意义上,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线索发展出兼具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理论体系。面对客观条件的外在变化,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互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价值重塑,实现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性重建。作为其关键要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全球化的共同性视角重新审视全球合作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逻辑。这不仅是对全球社会矛盾的一种回应,更代表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制度思维尝试,是一场对全球文明秩序的深刻认知。它强调以全球协作、命运与共的整体性视角,重新构建人类社会的制度架构与文明逻辑,要求对人类社会整体走向进行结构性反思,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理论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的当代表达。

具体而言,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出发,全球化不再是一种线性进程或阶段性策略,而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整体联系与相互依赖的结构性现实。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资本跨国流动与全球供应链的深度重组,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命运愈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影响、相互加深的时代背景下,生产力的全球化扩展与生产关系的局部固化之间矛盾加剧,传统的上层建筑形式面临全球治理失灵、制度合法性危机以及意识形态分裂等新问题。这一现实改变了传统历史观念中“国家间互动”的叠加逻辑,转而形成一种全球体系下的结构性整体。这个整体的话语基础就是“人类”的共同性的历史自觉,或者说,“人类”是全球历史的主语以及全球制度重构的基点。当今世界的历史过程本质上是基于高度相互依赖与全球互动的人类整体的社会结构的自我调整与重组。在此基础上,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普遍价值诉求和制度想象力的核心概念。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契合了当今全球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演化逻辑。这表明,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全球层面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性,推动构建一种以共同命运为前提的普遍性交往结构。由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延展与现实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 [1] 沈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J]. 理论视野, 2024(10): 86-92.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 2021-11-17.
- [3]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4] 逢锦聚.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1(1): 16-25.

- [5] BRENNER R.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 1945—2005[M]. London: Verso, 2006.
- [6] 刘同舫.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重张力及其进阶[J]. 江海学刊, 2022(2): 22-29.
- [7] 林建华. 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与未来走势[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9): 101-112.
- [8] 韩庆祥.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4): 4-23.
- [9] 钟明华, 董扬.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价值与建构[J]. 探索, 2018(2): 5-12.
- [10] 查建国, 陈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国智慧[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9-23.
- [11] 韩庆祥, 虞海波. 中国学界眼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 1-8.
- [12] 柴尚金.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4): 132-142.
- [13] 田鹏颖. 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2): 21-28.
- [14] 张梧.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若干重大问题的中国解答[J]. 甘肃社会科学, 2022(2): 28-36.
- [15] 丁存霞.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重叙事逻辑[J]. 世界哲学, 2025(2): 5-16.
- [16] 陈曙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关系再辨[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1): 33-40.
- [17] 田克勤.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1-10.
- [18] 靳呈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意蕴[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3): 29-34.
- [19] 孙伟平, 贺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蕴、双重内涵与实践路向[J].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3(6): 87-94.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1] 汪亭友, 刘月红. 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视阈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1-8.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 李武装.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12-28.
- [24] 蒋英州, 王创宇. 人民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J]. 重庆社会科学, 2023(4): 5-21.
- [25] 吴凯. 以“三大倡议”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境界[J]. 探索, 2023(4): 1-14.
-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7] 吴宏政, 王野.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2): 52-59.
- [28] KEOHANE R O.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1(1): 1-13.
- [29] 林建华. 现代化与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J].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4): 5-16.
- [30] 冯旺舟. 全球化时代资本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多面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辨析[J]. 哲学动态, 2022(3): 5-15.
- [31] 袁祖社. 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境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及其意义[J]. 教学与研究, 2023(2): 37-47.
- [3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机遇挑战和应对思路[J]. 新经济导刊, 2022(4): 4-18.
- [33] 刘志欣, 张琰第.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理论演进及其立新开局[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61-70.
- [34] 周森. 国外左翼学者视域中的“全球南方”及其现代化问题探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11): 108-130.
- [35] 何中华. 文明的历史含义及其当代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6): 70-81.
- [36] 鲁品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飞跃[J]. 哲学动态, 2018(3): 5-11.
- [37] 刘同舫.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性实践[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5(2): 4-12.
- [38] 田文林. “文明与野蛮”叙事与等级性世界秩序[J]. 政治学研究, 2023(5): 114-125.

- [39] 吕朝辉.“同球共济”: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泛共识的精神力量[J].探索,2025(2):45-56.
- [40] 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4-21.
- [41] 谢菲菲.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挑战及优化路径[J].学术交流,2023(11):17-28.
- [42] 孔泽鸣.中国式现代化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24-30.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21st-Century Marxism

YAN Kuom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 central issue for 21st-century Marxism is how to apply it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and forward trajectory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reby answer the epochal question “Where is the world heading?” In the intertwined contexts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is involv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to all countries as they jointly confront global challenges and strive to realize a shared vis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21st century face new social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ir own development, socialist states encounter both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 in their modernization efforts, and the “Global South” exert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world’s configuration. Confronting thes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ided by Marxism, has creatively advance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a community offers new contexts and new propos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21st-century Marxism.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stitutes an epochal narrative of world-historical theory within 21st-century Marxism; it represents a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s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modern context marked by global systemic imbalances, looming ecological boundaries, and growing ethical dilemmas in technology. In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fostering this community,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s unfold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shifting from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o labor globalization, from Western modernization to global modernization, from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to development-oriented discourse, and from a single value center to a pluralistic consensus of values—thereby driving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21st-century Marxism and normatively reconstructing common human values to better guide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is century.

Key word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1st-century Marxism, world-historical theory,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牟 怡 蒋英州

引用格式:丁燃.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J].探索,2025(3):15-28.

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

丁 燃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凝练出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话语来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战略策略与理论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产生的创新性话语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性话语的重要体现与组成部分。在话语创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传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话语,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提出原创性话语、凝练标识性话语、创造自主性话语,以此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时代特征与价值追求,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导力与理论生命力。这种话语创新的特点反映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规律,即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动力、解释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为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不断推进话语创新,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在继续创新性解答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既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显著特点,也推动着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015-14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开始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话语来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战略策略与理论成就。这些创新性话语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与实践突破,也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显著特色和举世瞩目的成就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单一发展模式的局限,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从“破局”到“立序”的话语创新特点。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性话语,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内在逻辑,能够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20&ZD027),项目负责人:李包庚。

作者简介:丁燃,女,博士,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好地展现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中国特色及其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研究的缘起与发展根植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进程和理论自觉,其核心在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叙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的话语体系来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策略与目标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新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走向现代化的自主叙事体系。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行了系统化、多维度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与构建逻辑。学者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和叙事体系^[1],并在哲学层面从一元与多样、批判与建构、一般与特殊、应然与实然的逻辑关系对话语体系的前提性、策略性、生成性、实践性问题展开学理研究^[2],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创新是辩证性思维目标和价值的统一^[3]。这套话语体系需要用中国特色话语来表达,要关照现代化概念体系及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主要范畴^[4]。简言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基于主体性、世界性、多线性三重逻辑,从多重维度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为何叙事”“叙什么事”的意旨逻辑与话语形态^[5]。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文明底蕴与价值追求。学者们通过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文明、世界历史、大历史观等话语来论述中华文明标识性话语的生成历史、内涵特征等,以此凝练中华文明的标识性概念^[6]。学者们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与使命出发,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阐释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对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对人类社会前途命运作出的贡献^[7]。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文明的“总开关”,为建设中华文明提供物质保障、精神动力、文化支持和生态环境支持^[8]。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指向的文明表达,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树立于中华文明根基之上,能够打破西方现代化文明叙事的话语霸权^[9],在本质上是一个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的过程^[10]。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深度融合,从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1]。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主要构成与认知图景。学者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必然性、道路独创性与巨大优越性的话语表达,具有丰富的功能与内涵^[12]。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观念认知和理论创新,围绕战略目标、内涵布局、实践步骤和发展动力等要素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脉络^[13]。与国内学界研究切入点不同,海外学界较为注重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世界价值,并尝试建构这一价值的话语认知图景。虽然这些海外话语认知表现各异、内容迥然不同,但实质上都是西方优越论在东方现代化问题上的不同表述^[14]。因此,基于中国特色的认识论全面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演进,深度总结其历史演进的经验启示,有助于显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15]。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升华与理论表达。学者们一

致认为需要重视话语体系包含的学理性,并从方法论、价值论、认识论等角度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出场方式,以此剖析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历史必然性、道路独特性和显著优越性。这些研究对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很有必要。但也有学者指出,当前对中国式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总结概括还需要深入^[16]。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拓展和深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形成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创新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17]因此,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创新的演进路线,以此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维度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生成脉络及其特征,既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又能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基本内容,从而构建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不仅要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而且要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及其话语创新的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话语。这些话语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的总结提炼。这些理论成果很多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18]3}。它们以术语、概念、范畴的表达方式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具有的继承性、原创性、标识性、自主性特征,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主要内容,一方面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另一方面显示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历程与特点。

(一) 传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含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政党、科学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话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阐释,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南,从而表达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话语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话语,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话语。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的提高与“变革生产方式”对推进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19]366}。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迭代升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20]。中国式现代化传承马克思主义基础性话语,旨在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世界观与方法论,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改革完善生产关系的根本动力层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而言,传承马克思主义基础性

话语是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与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从而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领导与实践指引。

(二) 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话语

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表现为逻辑化的话语系统。话语是知识系统的根基,可以有效表达概念的原理、范畴和边界,又是人们把握思维发展与形成理论的重要介质。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展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也随之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话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话语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回应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而提出的具有独特理论和表达方式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1]510}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提出了诸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22]2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3]25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4]10}、科学发展观^{[25]104}、新发展理念^{[21]167}等具有原创性意义的话语。这些话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深化理论认识的创新意识,并将其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因此,原创性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主导性理论中产生的话语表达。它们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守正创新,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实践认识上升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

(三) 凝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标识性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话语主要是指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色的话语,反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策略、目标、价值与意义的深刻认识,其话语表达具有中国文化的独特风格和特有意境。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以“摸着石头过河”^{[26]279}阐释改革方法论,邓小平以“小康社会”^{[23]216}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江泽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7]528}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4]4},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5]274}与科学发展观^{[28]2},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9]21-23}等标识性话语,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与使命,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0]419}目标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31]153}的信心与决心。这些具有中华民族性辨识度的话语,其深层逻辑是根植于中华文明基因的传承与创造、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与群众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需要“立足中国,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32],提炼具有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基因与社会主义政治属性融合的标识性话语,以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垄断和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话语是基于中国生动实践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认同范式的话语,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各个时期的标识性话语既一脉相承,也反映

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生而非外在的强大动力在驱动其发展,以及对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正是这种追求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四) 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性话语

自主性话语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18]322}。理论是通过批判、吸收和创造形成的具有自主性发展的思想体系,理论之所以具有兼收并蓄的形态,源于人类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实践的需求。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作为理论回应时代的表达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时,既表现出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传承连续性,又通过对其他文明科学扬弃、鉴别良莠,反映出批判创新的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以其批判继承与创新转化的辩证统一表达方式,形成了主动性选择和自觉性发展的自主性话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3]2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10}、“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33]36}、“一带一路”倡议^{[21]433}、人类命运共同体^{[21]417}、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0]等话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34]408},从而“推动构建一个非西方中心的、反映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国话语及知识体系”^[35]。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部中华民族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到主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1]10}的恢宏史诗,自主性话语印证了中国现代化经历从被动现代化到自主现代化的范式转换,体现出中华文化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的现代价值。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自主性话语是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主动性选择与自觉性发展的话语,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解决世界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大国担当精神”^[36]的体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从“破局”到“立序”的转折,从被动回应西方话语霸权逐步发展为自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自主性话语仍然在不断生成,正在书写一部属于全人类未来文明现代化的启示录,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内在逻辑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9]32} 恩格斯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资本论》中的术语是革命性的,“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19]32},需要考察和理解这些术语所包含的重大的和本质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创造了许多具有革命性的术语,实现了“术语的革命”。这种“术语的革命”很多反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创新。而这些话语创新又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这就意味着,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能够探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话语创新的脉络和规律,并理解这些创新性话语所包含的重大的和本质的意义。

(一)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内在推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通过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出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同样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持续性和阶段性地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并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创新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每一次阶段性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都会产生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这种话语创新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在“认识矛盾—解决矛盾—推动发展”的过程中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每一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都会产生新话语,而新话语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自觉,也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不断丰富和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或者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来看,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创造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的理论认识逐步达到新的高度。由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创新过程也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通过“三大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推动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社会主义改造^{[37]276}、社会主义建设^{[37]276}、社会主义工业化^{[37]280}与五年计划^{[37]280}等话语表征着对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法与目标设定,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改变中国人民贫穷落后的面貌,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这一阶段改革开放^{[23]26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23]36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小康^{[30]237}、科学发展观等创新性话语不断涌现。这些话语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目标,以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战略布局等为主要内容,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为己任的奋斗精神。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深化改革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因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33]99}、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38]、高质量发展^{[39]237}、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39]23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9]105}等创新性话语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性地探寻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法与解决策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重心从生产力“量”到“质”的变化,引发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改革完善生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以重构生产力空间布局,通过创新驱动与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措施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从而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进,也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很多创新性话语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的政治性话语,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政策性话语,发挥着政治引领与政策驱动作用。正是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中不断

再认识、再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的认识推到新的高度,最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二) 解释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重要方法

话语是在实践中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工具,实践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话语来表达。“历史表明,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实践创新和社会转型,都会带来价值世界和规范世界的深刻变化。”^[40]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之间构成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实践决定话语的真实性与生命力,话语实现实践的理论升华与表述,两者在互为表里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的解释框架。这就意味着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解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主要方法。

其原因在于,伴随着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每一阶段的实践创新都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通过“两条腿走路”与“五年计划”等具体实践方式,积极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并从最初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转向整体层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成“社会主义建设”理论^{[41]116}。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通过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等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23]405},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通过设立“经济特区”^{[23]51}以及确立经济特区在中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等具体实践,形成了“改革开放”理论^{[23]315},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在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城乡发展等实践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1]141}、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29]11}和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伟大实践推动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实践上的成功逐步转变为规律性认识,并被凝练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话语背后是思想,揭示的是道理;叙事背后是事实,反映的是实践。”^[42]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解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重要来源,因而沿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创造的话语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正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解释而形成的话语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轴心与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9]24}。建成现代化强国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夙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便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

社会主义国家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性目标也在动态调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9]23}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历史脉络中能够看出它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轴心在展开,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也成为它在 21 世纪中叶的价值旨归。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轴心与旨归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各自的阶段性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三步走”战略目标为核心,从解决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相继确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1]237}、达到小康水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9]1}目标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9]目标,并明确提出 203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 2050 年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确立,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砥砺前行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话语或者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话语作为标志性符号展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演进的逻辑主线,即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并逐步形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百年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的奋斗目标。这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1]341}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的“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31]94}的演进与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演进的内容从聚焦物质生产到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全面现代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创新的核心载体,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每一次的话语创新都是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动力,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方法,不断提炼以现代化强国目标为载体的新话语,从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四、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新境界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39]21}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阶段,其话语体系的创新具有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进入新境界。

(一)在回应“四问”中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

实践动力。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着力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1]30},在此基础上将具体措施与实践成效转化为现代化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并系统回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着眼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探索,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回答“四问”,以现代化治理话语丰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和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面对“中国之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面对“世界之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挑战问题,针对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等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3]548}和“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21]478}等方案。面对“人民之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核心,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39]18}、脱贫攻坚^{[21]125}、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21]260}等方案,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面对“时代之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9]25}。

这些创新性话语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揽全局、抓住机遇、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有力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效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也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治理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未来,中国可以在理念、方案和行动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43]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思想力量与实践力量,在此意义上,提炼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形成具有中国解释力的现代化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是开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密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成为全世界现代化实践不可忽视的理论指引。

(二)在解答“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中激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44]的重大时代课题的考验。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解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可以说,解答“三个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道路之问、强国之问、强党之问”,也就是在回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道路、奋斗目标和根本保障的问题。换言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具有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回应和解答,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深化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达到辩证统一的认识,在解决中国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激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重大时代课题,以新时代创新性的话语表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39]83},把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统一起来,系统回答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问;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提出“六个必须坚持”^{[29]19-21},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强调高质量发展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之问;新时代党的建设“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45],以“自我革命”^{[39]259}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党之问。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46]2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辟概括,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方向道路、奋斗目标和根本保证三个维度建构了具有中国解释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随着 21 世纪资本主义历史性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转移到当代中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激发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也将成为走向世界的标识性符号。

(三) 在回答“能行好”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举世瞩目的成就,深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44]。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需要我们“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弄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21]518}。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了一条注重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和拓展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1]10}。这在世界范围内重塑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意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以人民立场的价值话语体系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的映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将这一目标转化为政策导向,“实现了以人的发展为统领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叠加式发展”^[47]。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主体的作用,聚焦人民实践场域,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反映出人类对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和创造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使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真理制高点。新时代中国式

现代化话语体系坚定人民立场,准确解释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主张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重塑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21]12}、“一带一路”倡议和“全人类共同价值”^{[21]12}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理念,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贡献了人民至上、和平发展、文明共生的价值理念。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关切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不断回答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被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受到诸多质疑和责难,因而需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表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经验并形成话语体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式,能够进一步化解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质疑和责难,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世界上的大国无不以自己的伟大实践总结出的理念影响世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需要引领世界实现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推动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发展的重任。在此意义上,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回答“能行好”,可以有效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和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48]331}。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创新背后的“道”,是不断解决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问题的方法,是为人类应对 21 世纪的全球性问题提供系统性答案的表述。随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将成为“引领 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性概念”^[49]。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发生的“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五、结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创新性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表达。因深受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在每个时期都会产生话语创新。这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话语集群以其传承性、原创性、标识性、自主性的特点,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概念体系,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并在总结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动力源,从而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从历史时空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创新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为动力,以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为方法,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核心,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创新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初心使命。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其话语创新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以创新性话语回应新时代重大国内国际问题,表现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打破资本逻辑构建的“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解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创新的历程,深刻说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个积累的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记录下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

标的不懈追求,也证明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多样性,彰显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可行性与优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往往具有多重特征与表现形式,但最为显著的标志是以思想理论层面的巨大变革作为前提。”^[50]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引下进一步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新境界。“提炼理论的‘思想芯片’,既能抓住理论核心从而为理论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也能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普遍意义的重大标识性概念,从而推动中国理论更好地走向世界。”^[51]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改变了自身的面貌,而且也在改变世界秩序和人类存在状态,改变资本逻辑所创造的“物的社会关系”,并按照人的逻辑创造现实,让人类创造并享有自身生活的全部内容和精神价值,使物质世界再次从属人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系统展现和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拓宽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达,使马克思主义“术语的革命”再一次在中国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得到时代的升华。凝练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来时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前方路。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秉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和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

参考文献:

- [1] 任平.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重大使命: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和叙事体系[J]. 江苏社会科学, 2025(2):1-10.
- [2] 黄海.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哲学逻辑[J]. 哲学研究, 2025(2):52-61.
- [3] 姜迎春.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创新意蕴[J]. 江汉论坛, 2024(6):49-56.
- [4] 吕晓斌.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J]. 探索, 2023(6):14-27.
- [5] 王林林, 双传学.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内在逻辑与话语策略[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28-34.
- [6] 史宏波, 李晶晶. 以中华文明标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1-15.
- [7] 蒋英州, 王创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主要内涵与使命追求[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1-13.
- [8] 李包庚.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逻辑[J]. 探索, 2023(5):163-175.
- [9] 金伟, 张钰.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话语构建研究[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2-9.
- [10] 张三元. 文明再造:守好中国式现代化文明逻辑的根脉[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39-51.
- [11] 周大鸣. 文明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1-9.
- [12] 付高生.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丰富内涵及建构路径[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7):38-46.
- [13] 乔贵平, 王洪超.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多维探析[J]. 政治学研究, 2024(5):17-30.
- [14] 杨帆. 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世界性认知”的海内外比较话语建构[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1-13.
- [15] 徐艳玲, 徐林芳.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演进、鲜明特征与经验启示[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9-17.
- [16] 贾磊.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现状、不足及展望[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 (4):1-10.
- [17] 王伟光.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创新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4(1):1-10.
- [1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
-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4] 江泽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5] 胡锦涛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6] 陈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7]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8] 胡锦涛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2] 刘同舫. “术语的革命”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N]. 光明日报,2025-01-13.
-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34]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5] 赵月,邹广文. 论中华文明观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兼论中华文明标识性话语的产生[J]. 道德与文明, 2025(2):19-28.
- [36] 赵耀. “两个大局”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J]. 探索,2024(2):15-29.
- [37]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8]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
- [3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40] 李佃来.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实导向、理论资源与思想原则[J]. 求索,2021(5):5-13.
- [41]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2] 唐爱军.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N]. 光明日报,2024-03-01.
- [43] 孙吉胜. 全球信任赤字与重建信任的中国方案[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8):11-22.
- [4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
- [45] 习近平.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J]. 求是,2024(6):4-7.
- [4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47] 黄建军. 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与世界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6):32-42.
- [4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49] 韩庆祥. 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论纲——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J]. 江海学刊,2022(2):5-13.
- [50] 张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兼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J]. 江西社会科学,2018(4):18-27.

[51] 韩庆祥,汤茂玥. 深化研究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2024(7):1-9.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scourse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DING Ran

(*School of Marxism,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PC condensed many innovative words to represent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strategic strategies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The innovative discourse generated by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and component of the innovative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iscourse innovation, the CPC, on the one hand, inherits the basic discourse of Marxism,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oposes original discourse, condenses symbolic discourse, and establishes independent discours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interpret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era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pursui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eflect the practical guidance and theoretical vit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discourse innovation reflect the la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discourse innovation, that is, to solv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expla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the method, and to achieve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the goal of constantly promoting discourse innovation,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CPC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romotes the discourse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in continuing to creatively answer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times faced by the CPC, “the questions of China, the world, the people, and the times”, and “why the CPC can”, “wh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good, in the end, it is Marxism”. The discourse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not only reflects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adheres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specific reality,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discourse innovation, law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牟 怡 蒋英州

引用格式:张淑娟,李庆堂.标识性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J].探索,2025(3):29-42.

标识性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

张淑娟,李庆堂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摘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对中华民族特征进行集体再定义,通过政治整合、文化凝聚、经济共享、社会融合和历史叙事等多维度进行系统阐释,探索反映中华民族演进规律的民族理论和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新范式。标识性概念充分彰显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标识性概念的提炼要以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核心要义,以本土情境与价值预设为前提条件;立足“语义三角”理论及其要素拓展,遵循边界清晰性、内涵统一性和“种属+种差”的逻辑原则以及平衡性和借鉴性的操作原则。上述各环节构成标识性概念提炼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自觉。在此基础上,突破单一线性分析模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成维度和协同维度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体—意识—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成维度,三者彰显该理论体系的深度及其生成机理,是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协同维度,三者廓清了该理论体系的宽度。通过构建立体化解释模型,初步提炼并厘定了现有的标识性概念。既有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为新标识性概念的生成奠定了基础,进而为构建系统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了基础框架。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文化主体性;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029-14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是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1]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积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2]2014年以来学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对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逐渐转移到理论体系构建上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在构建的内容上,主要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三个部分构成^[3];在构建对策上,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4]、多学科合力^[5],基于概念、范式、叙事和主体维度进行构建^[6],以“三大体系”建设为核心^[7];在构建方法上,强调坚持“六个必须”^[8]、构建国际话语权^[9]。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AMZ002),项目负责人:张淑娟;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研究”(ZL2024001),项目负责人:张淑娟;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项目“‘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主体性研究”(23BF001),项目负责人:张淑娟。

作者简介:张淑娟,女,博士,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李庆堂,男,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系的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推进基础理论研究,而标识性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石。因此,对标识性概念提炼的逻辑起点、构成要素与基本原则等“元问题”进行研究,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中之重。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提炼的逻辑起点

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理论叙事和学术体系构建的起点。当前学界日益关注自主知识生产及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概念提炼,特别是本土化概念的提炼。郭忠华提出“概念之树”^[10]的分析框架,总结了提炼本土化概念的三种基本路径。标识性概念是概念体系的内核,“概念的‘标识性’则在于其在同类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中,‘标识’该种体系所具有的‘原创性’‘主体性’‘自主性’”,而且也建构了该理论体系的“范式性”和“典范性”^[11],能够反映和呈现对象的根本特征。只有确立了标识性概念,才有构建理论体系的真正基础。因此,提炼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概念体系,要以标识性概念为重点,逐渐形成系统完备的“概念家族”。提炼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标识性概念,要以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核心要义,以本土情境与价值预设前置条件,在“我者”和“他者”、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实现平衡,彰显其理论自觉性和主体性。

(一)以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核心要义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在编织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特性的意义之网^[12]⁵,自主知识体系以文化主体性为核心要义。因此,提炼标识性概念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3]¹⁹新时代以来,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学术领域的头等大事。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14]。“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

第一,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精神追求,提炼标识性概念是其基础环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解决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从文化角度而言就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立经历了曲折探索。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进入全面建构期,积极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和生长。抗战时期,针对日本侵略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强调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有效化解了阶级叙事和中华民族叙事的张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经历学习他者的理论和经验的曲折探索中实现了批判性超越。新时代,中华民族相关叙事成为主导性的话语,无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命题的提出,抑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工作的开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的提出,都在不同侧面彰显了中华民族主体性。对西方理论体系特别是概念的套用移植会导致知识生产和话语叙事处于“依附”地位,因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主题。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正在积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炼和创造本土化概念,正是在“去依附”中彰显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第二,提炼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是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生成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主体性的载体。在历史长河中沉淀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基因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的精神纽带。文化主体性涉及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等层面,必将在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和全面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凝聚提供理论指导,而以“中华民族”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的生成与演进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建立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概念群,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大家庭”等,是对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确认与肯定,也是对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回归与强化,更是对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不断唤醒。

(二)以本土情境与价值预设为前置条件

社会科学以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概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严格。社会科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仅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具有价值负载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受到主体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社会科学概念不仅包括描述性概念,也涉及塑造“理想类型”的规范性概念。社会科学理论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核心概念的重新界定。以现代化理论为例,早期的现代化概念强调西方模式,将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等视为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但随着现代化研究的深入,不同社会的现代化路径存在多样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也非截然对立。因此,现代化概念逐渐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制,强调多样性与内生性等新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超越。以柯文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提出的“中国中心观”^[15]⁵²也倡导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出发研究近代史。因此,社会科学概念的提炼需要在抽象与具体、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求平衡。这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探索尤为重要,只有立足中国语境、“以中国为中心”,破立并举地推进概念提炼,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理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于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不能用西方的民族观来裁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也不能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

“从本质上来说,社会科学知识是生活在不同情境—价值体系中的人们为自身编织起来的一张意义之网,概念则是这些网络上的节点。”^[16]概念是沟通经验世界与观念世界的桥梁,是编织观念世界意义之网的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的提炼要坚持“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丰富的历史文化成果中提炼本土概念。同时,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张力,在传承创新中实现二者融通。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标识性概念应立足于本土的情境与价值预设,内生于中国大地,“并不仅仅是去发明或生造一套概念体系,也不是将当代的学术术语翻成中国原来的术语。其本质的核心应当是,中国学术要从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进入到它的自我主张”^[17]。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提炼的前置条件,也是逻辑起点。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的构成要素与提炼原则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变,由此带来观念形态和话语体系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我国受到西方知识范式的影响,主体性一度处于遮蔽状态。“当前,就中国话语的自

主构建而言,最大的发展掣肘是既有的知识体系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也就是‘概念短缺’问题的出现”,“我们需要从中国问题出发,提升概念供给的能力,以合适的概念、恰当的理论来表述、凝练中国实践”^[18]。概念提炼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情境和价值的历史嬗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互动中寻求融通,实现概念内涵的拓展和话语体系的重构。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并非随意创造,而是基于一定的方法论基础,否则就会缺乏逻辑性和解释力。标识性概念的提炼通常经历感性认识、理性提炼和理论检验三个阶段。概念的提炼和创造只有基于一定的逻辑原则,才能逐渐被学界乃至公众接受。

(一) 标识性概念的构成要素

概念的构成包括词汇(符号)、意义(认知表征)和指称(对象)三个核心要素。19世纪至20世纪初,关于语言意义的研究逐渐成为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核心问题。奥格登和理查兹在《意义之意义》一书中提出,传统理论往往将语词与客观对象简单对应,忽视了概念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因此提出语义三角分析方法,为探讨语言词汇、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任何语义系统都包含符号、指示物和意义三个基本要素:符号是语言中用来指代事物的词汇;指示物是客观世界中被指代的对象;意义则是人脑中符号和对象的认知表征。该理论刻画了语言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语言内在结构及其与主客体世界的关系,也为概念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照。“每一个概念都是先前的关联和用法的库存。随着先前的意义退居幕后,新的意义就生成了。”^[19]¹¹⁵ 概念变迁的过程也是概念史研究关注的焦点,语言符号(词汇)同概念的区分得到了进一步强调。考斯莱克认为,概念是已经“吸融其被使用时的全部意义语境”的词语,是历史现实中“经验”和“预期”的聚合、是“视阈”和“诠释”的聚合、是认知和诠释历史现实的一种方式,因而概念也可以蕴含一种“应然”,既包括“描述性成分”,也包括“规定性成分”^[19]⁷⁷⁻⁸⁴。20世纪50年代,国外政治学者将概念分析引入比较政治研究。萨托利强调概念由名词、意义、指称构成,并提出“概念延展”的问题,指出随着比较政治研究对象的扩大,许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出现了模糊和混淆,需要通过概念分析予以澄清。他认为,概念的缺陷是由名词与意义之间的歧义、意义与指称之间的模糊造成的^[20],在提炼概念时要消除一词多义和多词一义,使用决定性属性进行明确界定。比如在讨论“自由”“正义”等抽象概念时不同的社会和群体可能赋予其截然不同的内涵,原因就在于主体倾向于混淆语言符号本身与其所指称的对象,忽视了概念在语义理解中的中介作用。

由此,作为符号的名词在不同的语境和话语体系中会产生不同的指称和内涵。而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又往往源于对既有概念的重新界定和诠释,如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重新界定、涂尔干对“社会”概念的再诠释以及中国情境下对“民族”“族群”“民主”等概念的本土诠释等。通过区分概念的语言表述、心理表征和外部指涉有助于研究者厘清概念内涵,并以之为基础构建严谨的理论体系。郭忠华认为,在概念的构成要素中符号主要指语言中用来指代事物的词汇,代表概念所选择的特定术语;词汇指向经验世界,表明概念所能表示对象范畴的大小;意义指向观念世界,表明概念所表达意义的多少。他在三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场域要素,从概念的外部关系进行思考,即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21]。语义三角理论及其要素拓展提供了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定义概念。将上述四种构成要素置于社会和文化表征领域,有助于考察语义转换和概念变动背后的社会变迁。

(二)提炼标识性概念的基本原则

社会科学概念分析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其中在剖析概念要素、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概念创新是概念理论研究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萨托利提出“抽象阶梯”模型^[22],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性”模型^{[23]48},科利尔进一步提出了“概念辐射”模型^[20],郭忠华提出标识性概念提炼的原则^[24]。标识性概念提炼要坚持学者主体意识的自觉与对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观照,基于“中国经验、中国现实、中国问题”^[25],奠定“问题”基础,赋予概念以新的内涵,形成多序列、多层次的“原创性概念”^[11]。如何在借鉴不同理论模型、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科学、严谨的概念分析范式,仍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在上述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提炼标识性概念的五条基本原则,前三条原则基于“语义三角”理论及其要素拓展,后两条原则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具体语境,力图实现概念提炼的逻辑清晰化和路径多元化。

第一,边界清晰性原则。概念指向特定对象,为了辨识不同对象,概念边界(外延)以清晰为基本原则。实现边界清晰的有效方式是增加概念的本土特色,从而保证对象的确定性与排他性。确定概念边界也就是确定了相关研究边界和理论体系边界,同一层次的若干概念之间在外延上应当具有明晰的界限,彼此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如“民族”和“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指向对象要么基于群体界别,要么基于意识和实践的界别。如果不同概念之间存在过多的重叠交叉就会造成逻辑混乱,削弱概念的解释力。在提炼实践中,要“善于通过调整概念的抽象化阶梯,使原先被遮蔽的本土特色呈现出来,并以之为基础进行概念提炼;善于通过增加属性的数量来增强边界的区分度,使本土特色得到彰显”^[24]。对于标识性概念提炼而言,发现差异性对象的过程也就是发现本土特色并将它们纳入外延边界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界定,即是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本土对象,全面彰显了自身的主体性和标识性。

第二,内涵统一性原则。在意义内涵层面,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内在一性,即概念所概括的诸要素在性质上保持一致,不能自相矛盾。提炼标识性概念时,可以参照概念的既有要素组合,善于发现本土性要素并建立本土的衍生性概念。例如参照“家族相似性”和“概念辐射”模型,以共同要素为基础,发现新的本土辐射因素,从而提炼出反映中国特色的辐射性概念。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民主”这一共性核心要素为基础,增加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这些新的本土要素,祛除了多党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等狭隘性政治程序等资本主义民主要素;在“认同”概念层面,对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反映的是共性要素组合,在我国要增加个性内涵,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等。

第三,“种属+种差”原则。除了外延内涵两方面外,还要关注不同层次概念之间的关系。从纵向角度看,社会科学概念体系呈现出层级递进、环环相扣的金字塔结构。概念谱系的最底层是直接源于经验世界、对应具体事物的个别概念,这些概念虽然能够提供知识积累的原材料,但尚缺乏抽象概括,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个别概念基础上,通过归纳演绎形成对一类事物共同本质的抽象概括,进而上升到种概念的层次。种概念既延续了个别概念的经验基础,又实现了理论抽象。将种概念依据更高层次的共性逻辑加以综合就形成了属概念,属概念代表了社会科学研究对某一领域核心问题的系统把握,彰显出鲜明的学科特色和理论品格。在若干属概念

的共同指导下,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谱系才最终构建完成,并在与其他学科知识体系的互动中不断完善发展。这一体系结构就是“种属+种差”模式,包括上下位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以及相邻概念之间的“种差”关系。先界定概念所属的抽象类属,再阐明概念相对于同类概念的特殊性质,有助于明晰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是构建系统性概念体系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

第四,平衡性原则。标识性概念要建立在平衡规范和现实张力的基础之上。社会科学标识性概念的提炼要坚持唯物史观,“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性植根于现实的生活过程,而思想、观念、精神等只不过是这一生活过程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反射’或‘回声’的发展)罢了”^[26],概念需要建基于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具有明确的指称对象,不能凭空臆想或无中生有。概念具有规范性意义,能够形塑社会现实,但是在学理抽象时也要适度把握“理想型”概念提炼的尺度,使之与现实情境保持适切的张力。这样才能避免概念悬空和脱离实际,即“作为形式的概念与承载现实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相对立,把学术创新简单理解为概念的‘学术化’与‘规范化’,以一种‘抽象式的’主观主义来推动哲学概念的创新,由此导致哲学概念的‘空洞化’和‘形式化’”^[25]。社会科学概念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获得持续发展,既要立足现实土壤,又要超越经验局限。如果概念脱离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就可能成为空洞的理论符号;反之,如果概念完全囿于实践经验,又可能流于庸俗化、片面化。“长期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研究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持续开展有关我国各地区民族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社会调查研究。”^[27]因此,提炼标识性概念除了依靠文本提炼和理论创新,还应加强实证研究,标识性概念提炼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把握平衡。

第五,借鉴性原则。标识性概念要建立在学科交叉和“东西对话”的基础之上。从学科层面看,社会科学各学科又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但彼此关联的概念共同体。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都以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为中心,形成内在协调、逻辑一贯的概念体系。而不同学科之间又存在交叉融合,形成诸多跨学科、交叉领域的概念群落。这就要求在厘清学科概念内部逻辑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概念的“域外生长”,实现学科概念体系的开放互鉴、协同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征,其他学科可以为概念供给提供重要来源。例如,历史学既能够从概念史角度考察概念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又可以从历史文本中提炼出符合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要求的标识性概念;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则提供了概念分析框架和方法论等。从中西层面看,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于思想体系之间当如何进行概念通约、术语互译与逻辑沟通是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如对“民族”“民族国家”概念的辨异求同等。“需要把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放到中国的主体性基础之上,去掉它背后的一些政治预设、主体性预设,来重新焕发这些知识的效能。使其变成从我们自身出发、从实践出发的主体性,变成一种探索和建立更为平等、团结的政治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主体性。”^[28]移植和简单套用西方概念难以真正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和建设的内在逻辑,未来的重点工作还是在于提炼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在西方知识生产占主导的体系下,如何在批判性超越中实现本土根脉和外来借鉴的统一,构建符合自身需要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等工作,是亟待破解的课题。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的初步厘定

“自主性是对中国特色的自觉意识,它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本土化、去西方化,而是指在将

历史经验、外来经验应用于现代实践的过程中追求主体性、体现原创性。”^[29]近年来国内学者积极提炼标识性概念阐释中国实践:一是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词汇,如秦亚青以中华文化的重要概念“关系性”来构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赵汀阳提出“无外”原则和“天下”体系理论;二是基于中国实践创造出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如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以“差序格局”描述中国社会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格局等。从学习、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到根据中国事实经验构建本土性概念,研究者的主体性和中华文化主体性日益得到彰显,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供给了源头活水。概念并非孤立存在,需要“通过逻辑思维,构建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组合而成的‘概念家族’,将概念体系化,并形成系统的理论”^[30]。对概念体系进行层级结构分析是提炼标识性概念的先导工作,需要从构成维度和协同维度出发,建立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概念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可初步提炼五个层面的现有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既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又具有统领性和范式性。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概念体系框架

从广义上来说,概念提炼包括概念“发现”和“发明”两种^[31],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这一新的类概念体系不仅涉及“发明”原创性概念如“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也包括对本土经验和事实,如“华夏”“中国”“中华”等概念的“发现”和提炼。在对概念体系进行结构分析时要坚持历史取向,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依托,使概念内涵与实际相契合。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语境,通过系统梳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总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实践,才能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要坚持系统取向,明确概念间的逻辑关联和层级关系;坚持开放取向,不仅关注本体系下的基本构成内容,也要向协同和耦合领域进行延伸,实现概念体系的完备化。在建立概念体系时应突破传统线性分析模式,建立“实体—意识—实践”和“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的双维框架,从而构建立体化解释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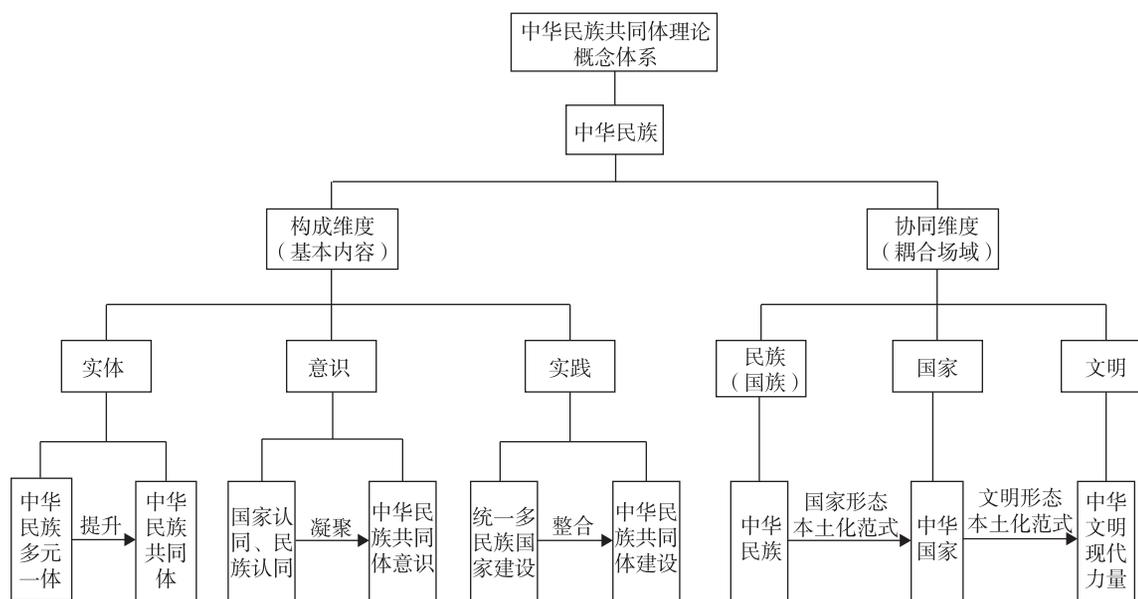


图1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概念体系框架

第一,“中华民族”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概念之树”的基础。相关概念都是基于“中华民族”延伸的复合词,分别指向不同对象和内涵。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早已存在,在近代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跃升。从梁启超最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接纳和使用“中华民族”,各政治派别和知识分子通过丰富的政治实践和历史契机,从内涵和外延上对“中华民族”进行了全面阐释。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国家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也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属性。由此呈现出中华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同步的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对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统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了其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合一。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则以中华民族为载体,国家建设又“应接续并转化自身生存论性质的中华文明传统”^{[32]298},实现国家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构。

第二,“实体—意识—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成维度,三者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深度及其生成机理。“一个新概念只有在长期的学术、社会话语变迁过程中沉淀下来,被公众广泛接受,尤其是被政治力量接受和运用于社会—政治动员之中,演变为高度抽象的观念信条,才能成为时代的基本概念。”^[33]作为实体和规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能动反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作为实现路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是理论体系的三大统领性概念,也是民族工作实践中政治话语的常用概念,成为使用于社会—政治动员的规范性概念。从本体、意识和实践层面分别提炼次级概念,如本体方面的实体界定涉及概念内涵、历史演进、形成途径等,意识层面的凝聚机制涉及语言文字、祖先崇拜、宗教信仰、历史书写和集体记忆等,实践层面的建设路径涉及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建设等,再次级概念如民族互嵌式社区等概念。

第三,“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协同维度,三者廓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宽度。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是多族聚合体和国民共同体的统一。周平提出“中华现代国家”的概念,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国民共同体)与现代国家(民族国家)相结合,中国探索出了有别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形态的多民族国家范式^[34]。“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身份标识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人民共同体的耦合,来源于中华现代国家范式和中华民族国族属性的统一。“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激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和文明观,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现代国家同时也具备文明国家的属性,中华文明为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建构提供了精神根基和身份品格,从而“表征为国家形态与文明品格的形神互构”^[35]。中华民族、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协同推进性,从不同层面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全面彰显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纵深、统一多民族国家新范式以及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这就从横向上廓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边界,使其建立在更为深厚的根基之上。

(二)以“民族”和“中华民族”为建基之本

对“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概念辨析,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相关概念的前提。“民族”概念具有复杂性,拉丁文“Natio”一词指具有共同出生地和血统的群体。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逐渐与国家政权相联系。法国大革命后,政治内涵成为民族的主要含义,并

且在“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下,西方不仅用民族叙事置换阶级叙事的模式掩盖了普遍存在的阶级剥削,也使少数民族群体失去自身主体性。“民族”概念的内涵和指称对象一向是富有争议的论题:建构论认为民族是通过人们持续建构、演化而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如安德森提出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世俗化进程以及官方语言普及共同促成了民族意识的产生^{[36]46-55};原生论则强调民族具有天然、固有的特性,如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等客观要素。对“民族”概念的认知差异,本质在于“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基本上,这两种观点并非截然有别或分头发展,但两者穿梭来去的过程与方式却会产生不同的模式”^{[37]297}。依据概念构成要素方法论,“nation”这一词汇所赋予的意义多元,其指称对象也并不一致,例如指称有实体、想象之分,赋予意义有政治、文化、血缘和工具之分等。与此同时,“民族”的概念要与“族群”进行区分,二者在很多语境和实际研究中外延有重合交叉,需要明晰二者的边界。“族群”更多地强调文化认同与群体边界,其成员“声称拥有共同的世系和文化传统,并将自己与其他类似群体区分开来”,尽管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会形成独特的文化认同和群体边界,这一概念偏重文化层面,关注群体的主观认同^{[38]1-28}。因此,族群属性是一种社会建构,是特定历史情境中人们对群体归属的想象,通过群体互动而形成,具有动态性和可塑性。“如果仅从族群角度诠释民族意涵,容易陷入文化多元主义的旋涡”^[39],不仅有概念歧义,也不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阐释。

辨析“民族”概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40]由此可见,“民族”所指称的对象是实体,所赋予的意义不仅是文化层面的符号认知和历史记忆、自我对集体的认同,而且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依赖交流活动和社会实践。在此基础上,应置于中华文明史、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情境,明确“中华民族”的指称对象和意义。中华民族的对象是一个实体,而不是想象建构出来的,其形成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建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基础上,是在历史传统和特定语境下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为国家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民族实体;在今天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同胞、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等”^{[41]2}。中华民族除了作为归属而表现为国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身份外,又“体现为族裔认同关系(identity of motherland)”^{[32]427}。因此,其外延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同历史基因、民族国家建设和爱国统一战线相呼应,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集合体。

(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表达

“‘共同体’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其特定内涵是由前面的修饰词赋予的”^[42],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描述性概念又是规范性概念。作为描述性概念,其指向的对象为中华民族这一实体,从词汇指向的内涵意义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要与西方滕尼斯等学者提出的共同体思想进行区分,二者指向的意义并非完全一致。参照明晰对象边界原则和“抽象阶梯”模型,“中华民族共同体”将高度抽象的“共同体”进行概

念降阶,用“中华民族”加以对象界定,使之适用于本土语境。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诠释性话语即为“五个共同”：“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2]这既是中华民族历史观,也是数千年文明情境—价值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形成的意义赋予。作为规范性概念,“共同体具有的‘弹性’决定了共同体建构的可操作性,这种可操作性还‘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共同体不仅具有建构上的可操作性,而且这种可操作性在路径上是多元的”^[43]。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所赋予的意义来看:中华民族不同于单纯的国家概念,它是基于中华文明基础和中华民族利益而形成的共同体;也不等同于单一民族国家,它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统一体,既强调整体性,又尊重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强调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超越族群、方言和地域的国族认同,具有现代政治意涵。同时,中华民族又植根于中华文化,强调文化一体和价值认同,既包含国家层面统一的制度安排,也包括立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追求,是一个兼具文化与政治属性的概念。从世界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之树”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的一致性,回应了民族特征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为解决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国家认同、增进民族团结的概念创新。

(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基本支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置概念为家国意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既来自中国古代“大一统”、家国一体等观念,也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共同凝聚而成的观念。“近代抵御外侮殖民的共同患难经历直接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前景又成为这种意识的未来延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则是当下共同生活的直接体认归属,是对共同情感利益的需求与承认。”^[44]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涵盖多种要素的概念范畴,其内涵既包括语言、地域、经济等客观因素,也包括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等主观要素。按照组合内涵要素原则,对于民族身份的确认反映的是共性要素组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的统一,这是本土要素的确认。从概念种属关系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使各领域意识形态实现‘互嵌’的黏合剂”^[4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次级概念则包括情感表达、心理机制、集体记忆、话语叙事等。例如,按照组合内涵要素原则和“概念辐射”模型,建构“集体记忆”这个包含多种要素的次级概念时,核心不变的要素是共同体成员在特定情境中对过去的共同回忆,既立足现在又重构过去。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要突出近代以来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共同记忆独特要素,使之贴合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置概念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新时代则实现了二者的合一。按照边界清晰性原则和“抽象阶梯”模型,标识性概念提炼要善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各个维度划分次级对象,即增加中度抽象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建设、经济共同体建设、文化共同体建设、社会共同体建设;赋予意义则可以概括为“文化认同、制度保障、利益联结、情感融洽”等要素。另外,从界定种属关系原则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概念场域中并列的概念,彼此又有重叠,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二者共同的推进路径,文化

共同体建设是二者最为集中的交叉领域等。在进行理论构建时要避免将二者孤立起来,从而割裂体系的整体性。

(五)以“中华国家”和“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为耦合场域

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其建构不仅是领土、政权和市场的整合,更重要的是基于共同的民族认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融合,即建立在国族认同基础之上的国民共同体。“如果从汉文角度来说,nation也就是‘民族国家’与‘国民民族’二者的统一体,或者亦可称之为二位一体。”^[46]³⁶⁷周平提出,近代中国通过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的方式,实现了中华民族作为国民共同体的凝聚^[47]。肖滨强调构建政治学领域国家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主张将现代国家概念扩展为集国族—国民(nation)和国家统治系统(state)为一体^[48]。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建设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形成了中华国家范式。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深刻揭示了阶级和民族的关系,实现了民族国家和人民国家的统一,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民整合、推进中华国家建设奠定了思想根基。从历史维度分析,中华现代国家生成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凝聚、国民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和马克思主义人民国家的革命改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以现代国家的主权性、民族性和人民性等维度推进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步建构。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属性全面彰显,中华国家应当成为关键的标识性概念和突破西方传统民族国家框架的国家范式。

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中华国家建构在文明层面的呈现。从中华民族到中华国家再到中华文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机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同步同源,二者具有一体性。中华文明现代力量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在顶层设计层面完成了中华民族向内反思链条的完整搭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很难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49]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丰富完善。中华文明也为中华国家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涵养和文化特质,“‘文明型国家’是中国国家的一个重要特质,因而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展开系统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提升文化自信,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50]。“文明型国家”等原创性概念的生产表征了新时代文明叙事的彰显,同中华民族叙事形成合力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创新发展。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耦合场域,也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动实践中走向“真正的共同体”^[51]。

四、结语

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下,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才能完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相一致的知识生产。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这一新的原创性理论体系而言,既有概念的提炼与新标识性概念的供给都还在路上,对其知识基础、提炼原则、体系结构和理论模型等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研究重点仍应放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有概念体系的梳理和内涵厘定上,加强标

识性概念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明确标识性概念提炼方法论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逻辑构建与深度整合,研究其内在机理、运行规律、实现路径,揭示不同概念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构建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体系,应当把握以下要点。第一,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供给应避免孤立分散和忽视历史情境,不仅要在概念体系或“概念家族”的层级结构中进行体系化研究,还需要从概念史维度进行语义变迁研究,构建纵横交错的立体化解释框架。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立足于长时段、跨民族的海量文献,相关概念又具有跨学科、贯中西的特征,这决定了在进行标识性概念提炼时,要着重于立足自身文化主体性进行概念辨析和比较研究。除了上述基础性工作,如何将现有的政治概念转换成学术概念,以理论抽象赋予其普遍解释力;如何基于历史文化语境和文本翻译等差异的认知,展开中西概念对话,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如何通过内部自洽性和外部验证性等标准,完成概念提炼的逻辑闭环等,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体系研究的关键环节,这些问题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3-10-29.
- [2]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4-09-28.
- [3] 严庆,郭雨晨.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J]. 西北民族研究,2024(2):5-17.
- [4] 陈达云,赵九霞.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何以成为一级学科[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16-23.
- [5] 李维军,范金金. 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主知识体系:学科、学术与话语[J]. 广西民族研究,2023(6):52-59.
- [6] 王新红.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四个维度[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24-31.
- [7] 高永久,杨龙文.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构建——评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1-8.
- [8] 张明. “六个必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创新性发展[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3):5-14.
- [9] 于运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路径[J]. 民族研究,2022(3):33-49.
- [10] 郭忠华. 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三种进路——基于“概念之树”的视角[J]. 探索与争鸣,2022(6):147-158.
- [11] 孙正聿. 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2024(7):38-51.
- [12]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 [13]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4]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15]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 林同奇,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16] 郭忠华. 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基本策略——基于情境—价值的视角[J]. 江海学刊,2023(5):164-173.
- [17] 吴晓明. 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N]. 文汇报,2014-12-12.
- [18] 王立胜. 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的六大关系[J]. 哲学研究,2019(10):3-10.

- [19] 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M].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20] 高奇琦.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J].欧洲研究,2013(5):129-147.
- [21] 郭忠华.社会科学概念理论的核心问题[J].探索与争鸣,2023(9):30-34.
- [22] 乔万尼·萨托利,欧阳景根.比较政治学中的概念误构[J].比较政治学前沿,2014(1):35-58.
- [23]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蔡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24] 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24(5):72-89.
- [25] 王海锋.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史的考察[J].哲学动态,2020(4):5-14.
- [26] 吴晓明.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及其具体化运用[J].中国社会科学,2019(10):98-115.
- [27] 马戎.如何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36-46.
- [28] 张志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3):130-136.
- [29] 林红.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与概念供给——以民本的传统性改造为例[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38-46.
- [30] 徐勇.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4):4-10.
- [31] 应星.从“发明”到“发现”:中国社会理论的两种概念生产方式[J].开放时代,2023(3):28-37.
- [32] 邹诗鹏.国家哲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3] 杨须爱.“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和政治化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考察[J].西北民族研究,2023(1):15-28.
- [34] 周平.中华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J].政治学研究,2015(4):19-30.
- [35] 张会龙,朱碧波.中国国家范式:民族国家理论的省思与突破[J].政治学研究,2021(2):43-52.
- [3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37]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社会变迁[M].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38] 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39] 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J].历史研究,2022(3):22-32.
- [4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N].光明日报,2005-06-01.
- [41] 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5.
- [42] 张淑娟,孙冉冉.实体描述与能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双重逻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15-25.
- [43] 于衍学.基于三个认知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建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2):16-23.
- [44]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1-14.
- [45] 张淑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面相:地位、使命与实践逻辑[J].宁夏社会科学,2022(2):14-23.
- [4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47] 周平.“全民一体”:一个述说中华民族的原创概念[J].理论月刊,2024(4):5-12.
- [48] 肖滨.扩展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国家概念[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2):5-14.
- [49]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14):4-8.
- [50] 马俊毅,杨一凡.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探索,2024(1):27-40.
- [51] 孔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性——基于共同体理论的分析[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3(2): 51-59.

Iconic Concep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Shujuan, LI Qingtang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collective redefini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interpret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political integration, cultural cohesion, economic sharing, social integra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explores ethnic theories that reflect the evolution law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new paradigms for multi-ethnic state governance. Iconic concepts fully demonstrate the autonomy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iconic concepts should focus on consolid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with local context and value assumptions as prerequisit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mantic triangle" and its element expansion, following the logical principles of boundary clarity, connotation unity, and "species+species difference",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balance and reference. The above mentioned sections constitute the knowledge found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for constructing iconic concepts. On this basis, an analysis of the dimensions and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conducted, breaking through the single linear analysis mode, that is, "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is the constituent dimens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hree demonstrate the depth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is the basic content;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stat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are the collaborative dimensions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three clarify the breadth of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explanatory model, the existing iconic concepts system have been preliminarily extracted and defined, providing a basic framework for generating new iconic concepts and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conic concepts,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责任编辑:赵超

引用格式:李永皇,赵潜.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路径——以贵州省为例[J].探索,2025(3):43-56.

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路径 ——以贵州省为例

李永皇¹,赵潜²

(1.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4;2.安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而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的重要制度安排与实践路径。在城乡融合发展、人口流动加快与文化多样性凸显的背景下,互嵌式社区治理通过促进多民族群体的共居共建、共事共学、共乐共享,回应了资源配置不均、文化融合受限与心理认同弱化等现实问题。以贵州省互嵌式社区为例,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五个维度分析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空间治理通过优化社区布局与智慧赋能,促进各民族融合共居;文化治理通过文化符号共享与实践创新,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经济治理通过产业协作与利益联结,夯实多民族经济共生基础;社会治理通过多元协商机制与社会力量参与,提升治理效能;心理治理通过教育引导与支持机制,强化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多维路径不仅克服了族际交往中的结构性隔阂与认同差异,而且在制度创新与实践转化中实现从结构融合到情感认同的协同转化,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嵌式社区;治理;全方位嵌入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043-14

在多民族聚居格局持续演化、社会融合面临深层挑战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当前民族事务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互嵌式社区作为制度创新路径推动着民族关系从物理邻近迈向情感融合与认同深化。互嵌机制在组织协同、社会运行与心理归属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制度效能与实践价值。本文以贵州省互嵌式社区实践为参照,力图揭示在国家叙事与地方行动交汇的动态关系中,多维协同机制如何嵌入社会结构、生成情感黏合,并由此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通道与制度基础。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部署中,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已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与制度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各民族相互嵌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281},强调要“逐步实

基金项目: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贵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有精神家园调查研究”(25ZLJD02),项目负责人:李永皇。

作者简介:李永皇,男,博士,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潜(通讯作者),男,博士,安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2]²⁴⁷,推进民族关系由交往交流向交融深化演进。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3],将互嵌式社区建设明确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与制度支点。互嵌式社区作为一种兼具空间联结与精神认同的新型民族治理结构,其理论根基在于系统建构族际结构性联系、价值共享基础与心理认同机制。互嵌式社区突破了传统民族关系建构中“界域清晰—身份固守”的思维路径,转而强调一种去边界化、再嵌化的认同实践。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逻辑出发,这一治理路径不仅回应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也对全球化背景下解决国家认同、社会整合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形式,互嵌式社区建设将制度安排深度嵌入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夯实了其社会基础。

近年来,作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深层次发展的一项制度性安排,互嵌式社区建设逐渐成为民族事务治理研究的热点。学界普遍认为,围绕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等维度展开的协同嵌入,不仅有效推动了民族关系从“物理共居”向“社会共生”的转型,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制度载体与实践依托。在具体研究路径上,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多维协同嵌入研究。如有学者提出“空间—治理—文化”相融合的嵌入机制^[4],聚焦于治理主体、治理模式和长效机制的系统设计^[5],提出从主体结构、内生动能、平台建设和绩效评价四个方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6],推动多元协同的理论深化。其二,单一维度嵌入研究。学者们聚焦于文化、情感、空间、组织等具体领域中的嵌入方式与作用机制,提出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基础^[7]、多维空间的再生产^[8]、族际互动中的情感转化路径^[9],以及从党建视角探讨组织嵌入与政治吸纳对族际融合的制度效能^[10]。其三,区域嵌入实践研究。如聚焦云南洱源县郑家庄^[11]、宁夏 AH 移民村等案例^[12],探讨互嵌式社区在不同社会生态下的具体实施逻辑与制度适应路径。总体来看,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证基础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果,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地生根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然而,聚焦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多维协同的整体性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在动态机制建构与长效路径拓展方面亟待深化。未来需要立足全方位嵌入的整体框架,着力提升协同机制的科学性与适配性,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更具实践导向与理论深度的支撑。

2022年,贵州出台《贵州省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实施方案》,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的目标。本文以贵州省为实证研究场域,聚焦该省在互嵌式社区建设与治理中的具体实践,旨在探索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有效路径。作为我国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省份,贵州省近年来依托易地扶贫搬迁、城镇化发展等政策实践,逐步发展出历史自发型、商品房型、扶贫搬迁型与保障房型等多种互嵌式社区类型,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平台与制度载体。2024年4月至7月,课题组深入贵州省9个市(州)、20个县(市、区)、50余个社区,采用访谈、座谈与实地观察等方法对居住空间、经济活动、文化交往、社会生活及心理健康等多维度展开系统调研。“全方位嵌入”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路径安排,明确提出要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等多个方面推进各民族的相互嵌入。这一顶层设计不仅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部署,也对应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物理聚合到价值归属的生成路径:空间维度着眼于生活交集的结构塑造,文

化维度强调共享认同的精神纽带,经济维度强化利益联结的物质基础,社会维度推动日常互动的制度协同,心理维度则致力于增强群体认同与情感归属。上述多个维度在贵州的基层实践中相互嵌合、协同推进,构建起一个多要素共融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揭示实践场域中多维嵌入如何在制度配置与日常互动之间生成耦合机制,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结构融通向价值认同的深层转化。

二、空间治理路径:通过优化空间嵌入模式推动各民族融合共居

空间是民族关系建构的基本维度之一,不仅体现为群体聚居的地理格局,也深度嵌入制度安排与社会秩序的日常运行之中。构建互嵌式社区,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走向深入、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效能的重要制度路径。在具体实践中,空间治理既提供了民族交往的物理前提,也构成了族际交往、文化协商与情感认同发生的基本场域。功能布局、资源配置和场景设计直接影响不同民族群体的交往频率与心理认同。因此,空间治理不仅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优化,更要围绕交往关系的重构展开,通过功能复合、资源共享与智慧治理等方式打破生活边界、重组交往逻辑,推动交往关系从地理共居向社会共生的系统性转变。

(一)优化空间规划设计,构建交融共居的物质场域

空间不仅是民族聚居的地理场所,更是一种组织社会关系、构建社区秩序的制度载体。在互嵌式社区建设中空间治理不仅决定了各民族物理嵌入的方式,也深刻影响着群体交往的机会结构与心理认同的形成。“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现实的人’,必然要在一定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中从事物质与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13]因此,空间不仅承载生活功能,更与社会关系体系深度耦合。空间结构优化是提升多民族居民交往频度与情感黏性的重要前提。从治理实践看,功能复合与开放共享是当前提升空间整合能力的关键。功能复合注重多种用途在同一空间内的协同布局,突破以往空间单一化倾向,重构生活场景的多样性与连贯性。贵阳市A社区通过建设共享广场、文化走廊与多功能节点实现居住与交往的联动整合,推动居民日常生活与文化互动自然衔接,构建起多民族频繁接触的交往空间。这种空间结构重组不仅提升了资源使用效能,而且在社会关系层面促成了从“物理共居”向“社会共生”的转化。在此基础上,空间的开放共享机制进一步增强了社区整合力。开放式街区设计消除了物理边界,公共节点的合理配置则打破了交往过程中的心理门槛。在遵义市B社区,开放街区与共享设施嵌套布设,使多民族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路径重叠与文化联通,提升了互动频率与认同程度。这种空间布局理念,既回应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治理目标,也有效提升了族际融合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空间治理不仅关涉场地安排,更是制度性民族关系建构的重要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物质依托与实践平台。

(二)完善服务供给机制,构建多民族互动支持体系

在互嵌式社区治理体系中,服务供给机制不仅承担着资源配置与功能落实的基本职责,更在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与族际互动关系的重塑中发挥着深层作用。空间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理容器,而是社会关系得以展开的结构场域。“空间性是社会关系的真实展现,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偶然反映;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因而是这种生产受到影响和逐步转变的场所。”^[14]¹¹⁹ 服务机制的空间指向不只是物理功能的嵌入,更意味着民族关系的持续调适与认同

基础的制度性生成。需要指出的是,服务层面的功能整合不同于空间治理中的功能整合,前者着眼于制度内容的协同配置,后者侧重于空间功能的合理使用。从机制运行的角度来看,服务供给体系的优化应建立在对居民差异化需求的精准识别和动态回应上。多民族群体在文化背景、社会经验、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异,使服务需求天然呈现出多样化格局。传统的一体化、静态化供给机制难以覆盖不同群体的具体需要,容易造成服务断层与交往障碍。都匀市 C 社区以综合服务中心为依托,搭建多功能联动平台,整合职业技能培训、文化交流与心理支持服务,形成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促进交流为目标的服务供给体系,显著提升了社区互动频率与文化认同基础。在机制设计上,功能整合已成为推动服务融合的重要方式。遵义市 Y 社区通过将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整合至统一平台,构建出兼顾生活便利与交往需求的服务空间。这类复合型空间在提升资源效能的同时,也让多民族居民在共建共用中拓展了交往机会,激活了情感认同,为族际关系迈向制度化积累了基础。所以,服务供给机制不仅承担着基础功能的实现,更成为推动社会融合与情感联结的重要制度支撑。同时,推动服务体系的可持续运行,还需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的有效嵌入。多民族社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单一治理主体难以全面响应各类需求,因而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共治成为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保障。铜仁市 D 社区引入高校与企业资源,在原有服务平台基础上开展技能培训、心理疏导与文化建设等项目,既拓展了服务供给的深度,也重塑了社区内部的信任网络与支持体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与整合力。

(三) 数字技术赋能空间治理,提升资源管理与协同效能

在多民族社区治理体系中,空间不仅是资源配置与服务供给的物质基础,更是承载族际交往、公共参与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社会场域。随着治理任务复杂性和居民需求多样性的持续提升,传统治理模式在资源调配、协同联动与场域构建等方面逐渐显现出响应滞后与效率瓶颈。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工具,凭借其嵌入性、整合力与精准性,正成为推动空间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通过数据驱动、协同治理与共享平台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推动了社区治理范式由粗放型向精准型、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第一,通过数据驱动实现资源管理的精准化。在传统治理模式中,信息不对称与资源错配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智慧平台则通过对社区人口结构、服务需求、基础设施使用等信息的实时采集与综合分析,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响应的灵敏度。例如,贵阳市南明区依托“智慧社区”管理平台,整合通行管理、安防监控、物业服务等多项功能,形成了完整的数据反馈闭环机制,有效实现了动态响应和精准服务,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第二,智慧平台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高效支撑。在多民族社区中,治理结构的多主体特征有时导致事务分散、协作阻滞与政策落地缓慢。智慧平台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集成与协作交互系统打破了治理边界与信息壁垒,促进了各方治理资源的协同整合。如毕节市 E 社区在构建智慧社区的过程中并未将平台视为技术工具的简单叠加,而是作为一种组织机制的再布局、一种协同逻辑的再构建。居民诉求的表达不再局限于线下窗口,社区治理的事务也不再分属各自体系,而是通过信息接口嵌入统一的处理路径,跨部门的互动由此成为一种结构常态,而非临时协调。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治理的效率,而且在制度层面夯实了“共建”的实际支点。第三,数字技术通过共享场域的构建,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与社会关系整合水平。空间资源的共享不只是物的共用,也是交往关系的生成场域,更是情感认同的沉淀机制。在多民族社区中物理资源、制度资源与社会情感的流动原本各

自运行,而数字技术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分离状态,使“线上联通”与“线下交互”得以统一于同一治理语境之中。遵义市 F 社区将教育、医疗与文化资源纳入同一平台管理体系,居民在预约服务、反馈参与的过程中从被动的信息交换转化为主动的交往行为。这种连续性的交互节奏为跨族群的情感联系提供了微观结构,也为认同的生成创造了制度通道。

三、文化治理路径:通过深化文化交融实践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作为互嵌式社区构建的内在驱动力,其功能不仅体现在象征体系的承载,而且在于通过动态交往与价值协同建构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深层次社会整合机制,可以通过符号建构、创新激活与交流嵌合系统重塑多民族文化的传播路径与认同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多民族文化得以实现融合,从而不断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与实践维度,构筑起多民族共享的精神家园与认同平台。

(一) 构建中华文化共享符号体系,夯实文化认同基础

互嵌式社区成为族际交往交融的复杂场域,而文化多样性容易催生因文化认同差异引发的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既是社区治理的现实挑战,也是文化治理的重要着力点。文化符号作为承载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与情感归属的象征,是推动群体共识生成的重要基础^[15]。构建超越族群边界的中华文化共享符号体系,有助于在强化文化认同的同时,整合多元文化资源、拓展意义空间,从而有效缓解认同断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例如,毕节市 G 社区作为一个典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聚居有来自 18 个民族的 1.7 万余人,面对高度多元的文化背景,社区通过引入中华文化符号与节庆场景设计,推动居民在参与中实现文化认同的转换与情感联结,构筑起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空间。首先,中华文化共享符号体系的构建是对认同逻辑的符号化再造。“中华文化符号记录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过往,连接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它们超越物理时空与天然联结,在符号‘扩散化’中‘构建共同的文化形态’。”^[16]这种动态属性使中华文化成为超越地域与族群的精神坐标。“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理念能够通过节庆活动、历史叙事等形式,转化为居民可见、可感、可认同的具体象征载体。如贵阳市 H 社区在民族团结共生主题文化节中,将中华文化理念嵌入多民族居民日常互动场景,使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其次,文化符号体系并非静止的象征堆叠体,而是嵌入社会关系与制度逻辑中的意义生成机制。它不是对民族文化的被动呈现,而是在多民族互动的结构张力中不断重组的象征系统。认同的形塑不能仅依赖单向度的价值传输,而必须建立在文化符号的共构逻辑之上,在参与中生成、在协商中稳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多个互嵌式社区的经验显示,文化元素的呈现并未固守民族内部逻辑,而是以节庆、公共活动等空间为载体,构建出一种跨文化共享的交往秩序。在多民族聚居的社区,苗族芦笙舞、布依族刺绣等象征性符号不再以“文化表演”的面貌出现,而是在共享场域中被重新编码,转化为日常交往的交汇点。这种意义上的符号重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再现,更是文化实践中认同关系的再生产。最后,文化符号体系的持续建构也依赖于教育机制与媒介平台的协同嵌入。传统文化要素的传播若仅依托文本或展陈,其影响将趋于表层化、短效化。贵阳市一些社区通过数字媒介将节庆内容、民族历史与文化象征融入社区生活,实现了文化意象从“符号可见”到“情感内化”的跃迁。文化认同不再是观念灌输的结果,而是在制度语境、传播机制与日常生活相互交错中深度

生成。

(二) 推动民族文化“双创”实践,激发传承发展内生动力

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实践中,民族文化如何推动现代化转化,实现价值延展与结构重塑,已成为文化治理的关键。随着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民族传统文化原有的生活依托被持续压缩,文化表达的公共性空间逐渐收窄,嵌入式生成机制面临深层挑战。这一变动不仅冲击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也对多民族社区内部的认同整合提出了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推动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文化延续的路径选择,更是构建文化内生秩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契机。创造性转化的核心在于文化内涵的提炼与符号系统的重构。传统文化并非封闭于民族内部的历史记忆之中,而是蕴含跨文化共享可能的精神资源,经由形式变异、结构嫁接与语境重置,其可转化为多民族可识别、可使用的文化资源。侗族大歌的传播实践即为典型例证。作为“非遗”项目,侗族大歌借助影视配乐、公共艺术、基础教育等通道在现代场域中重新定位,完成了从“遗产性存在”向“内容性传播”的符号跃迁。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不仅形成了新的表达逻辑,而且通过被重构的象征秩序在群体之间嵌入情感通道,激活了共识结构的在场机制。创新性发展的重点在于打通文化表达与社会场景的现实通道。现代技术条件打破了文化存在的时空封闭性,为其跨域传输与生活嵌入创造了可行条件。贵州省在数字化民族文化展示方面的探索中,通过将苗族刺绣、布依族服饰等元素嵌入数字展示平台,创新了传统技艺的呈现方式,使文化由被动保存走向主动建构。这一转化不仅拓展了传播边界,也将文化资源引入经济、教育、社区营造等实践空间,实现了从“物的保护”向“用的认同”的功能转换,提升了文化系统的适应能力。“双创”实践的展开离不开制度体系的协同支撑与多元主体的有效嵌合。政府不再只是政策的发布者,更承担着资源整合与机制构建的组织职能;市场也不仅仅是供需关系的调节者,更成为文化资源重组与价值转化的行动参与方;社区作为文化嵌入的基本单元,承担起实践转化与认同生成的双重职责。在基层治理探索中,一些地区探索建立文化培育平台与服务机制支持传统技艺的传承转化。这种“文化—机制—场域”协同构成的联动结构使文化不再作为外部资源被动调用,而是内嵌于社区治理与社会发展的运作逻辑之中,形成具备循环能力与制度韧性的内生系统。

(三) 深化跨民族文化交流机制,促进文化共生互鉴

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文化交汇与认同建构的重要平台,不仅体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格局,也面临文化交往机制滞后、资源壁垒固化等深层问题。缺乏有效的文化交流机制不仅削弱了不同民族间的日常互动与情感黏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因此,推动文化共生互鉴需要从制度层面完善各民族文化交流机制,构建常态化的交往体系与共享化的文化场域,使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互动中实现动态融通与价值共建。在构建文化交流机制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主干,而各民族文化是枝叶,两者在互动中互为滋养、共生共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17]328} 这一论述明确了中华文化的统摄地位与开放逻辑。从文明的发展来看,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是一部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史^[18]。中华文化通过包容性与整合力为多民族社会提供了价值坐标和文化框架,同时通过吸纳、融合各民族文化精华,构建起认同结构的制度基础。主干与枝叶之间的互动,既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精神纽带,

也在社区实践中转化为现实认同。交流机制的构建应以打破文化隔阂与资源壁垒为前提,推动文化资源在更广阔的平台实现协同共建与共享利用。贵州省部分民族地区融合“非遗”技艺、节庆表演与群众互动的文化活动日益常态化,为多民族居民在公共空间中实现情感认同提供了重要平台。这种基于日常生活场景的互动模式能够推动文化从象征表达向行为认同转化,为社区融合奠定实践基础。此外,技术赋能为交流机制建设提供了全新支撑。数字化平台突破了物理时空限制,为多民族文化的传播、认知与体验提供了新路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非遗云展馆”作为全景VR平台,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传统节庆与技艺的沉浸式呈现,扩大了文化参与的覆盖面与接触频率。这在增强文化可及性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认同重构。交流机制的可持续运行还依赖于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尤其是社区居民在文化互动中的主体性表达。都匀市在文化治理探索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对话活动,通过多民族居民共同参与的文化交流强化了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推动形成基于互动共识的社区文化认同。这种多主体协同的交流机制不仅提升了社区文化治理的能动性,也拓展了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的新路径。

四、经济治理路径:通过产业联动协作夯实多民族经济共生基础

经济要素不仅是资源调配的核心内容,更是结构关系的建构机制。在互嵌式社区中经济嵌入意味着民族关系的重新调适,它打通的不只是物质通道,更重塑了制度信任与身份认同的底层结构。唯有将“共生”嵌入产业体系、将“协作”嵌入资源逻辑,民族团结才能从文化共识走向制度常态。

(一)构建跨民族产业联动机制,优化互嵌式经济协作结构

“从经济上看,互嵌式发展是一个地区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交易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19]在嵌入理论的视域中,资源流动的背后往往潜藏着社会结构的重组逻辑与文化编码的转化机制。互嵌式经济治理之所以成立,不在于经济和市场制度的简单融合,而在于多民族主体通过经济交往实现协作结构的逐步内嵌与互动秩序的重构,从而打开从“交往逻辑”向“融合结构”跃迁的可能性通道。毕节市I社区以农产品深加工为支点,搭建起覆盖种植、加工、销售的联动链条,使各民族主体从被动嵌入走向深层协作。在这一过程中产业不再只以盈利为目标,更成为一种结构性信任的孵化机制,推动跨民族的经济关系从单向参与向协同嵌合转化。在资源整合基础上,功能协作机制进一步推动主体间的结构性依赖与协同参与。在铜仁市J社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物流体系相融合,构建了覆盖生产、销售、配送的完整链条。各环节间的分工协作促使经济关系逐步内嵌于社会网络之中,推动从契约性交易向日常互动转化,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有些社区通过规则设计与激励安排,推动多民族居民在参与中形成制度性信任。毕节市K社区推行的“七星”评比活动将居民参与度与集体收益分配挂钩,有效激发了居民参与产业合作的积极性。这一制度安排不仅提高了组织效率,也通过公平激励机制推动了跨民族主体间的长期协作,促使经济活动走向规范化、可持续化轨道。在本质层面,经济协作不仅是资源交换的技术过程,更是社会关系重组与身份认同协商的制度通道。当经济活动嵌入族际互动的日常场景之中,交换关系便超越了功利逻辑,成为情感联结与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资源共享不仅是物的再分配,更是对“我们是谁”的再界定,在这种协作结构中经济成为认同的中介、制度成为共生的保障,而社区转化为日常性的“共在实践场”。

(二) 扶持民族特色经济模式,增强社区发展内生动力

在互嵌式社区的经济治理体系中民族特色经济模式的培育与扶持,既是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重要路径,也是激发社区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机制。该模式以地方资源禀赋和民族文化特质为基础,通过经济要素的有序嵌入与市场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多民族主体从松散共处向协同共建转化,实现经济黏性、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的有机统一。民族特色经济的生成逻辑体现的是经济活动、文化表达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多维嵌套与动态调适,其本质在于通过持续性经济行为重构共同体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路径。民族特色经济的构建体现在对地方资源的结构化整合和文化优势的价值转化上。地方政府通过推动传统手工艺现代化、区域品牌建设与产业链完善,形成了涵盖产品设计、加工销售、文化传播的多维发展格局。毕节市I社区依托本地农产品资源延伸加工链条,打通了产销路径,不仅提升了配置效率,也在共享机制引导下促成跨民族主体的协作关系,进而在实践中培育出信任纽带,推动文化认同由交往走向凝聚。在制度层面,民族特色经济的长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政策保障和机制设计。地方政府应通过加大财政支持、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配套政策,为特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贵州省部分民族地区依托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探索将传统技艺嵌入文旅产业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支持推动苗绣、侗戏等文化形态与旅游场景深度融合。这一实践不仅拓展了文化表达的现实空间,也激发了区域经济的内生动能,促进多民族社区实现产业协同,为基层社会的融合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由此可见,民族特色经济的内在活力源于文化与经济之间不断深化的关系嵌合。在长期的实践中合作机制已不仅是物质利益的调配,更逐渐转化为社会互动与文化联系的稳定基础。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联结的触发器,它促使各群体在合作中建立信任、生成认同,最终构筑起一个具有共享经验与共同价值的社区结构。这种由合作走向共识的过程,正是民族特色经济在推动社会整合中的独特价值所在。

(三) 健全利益共享与分配机制,构建多元共生经济体系

列宁曾深刻指出,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20]136}。利益分配是一种深层的社会关系建构机制,它决定的不只是资源如何流动,更决定了人们如何归属、如何协作、如何看待彼此。经济共融的核心就在于社区居民之间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体^[21]。在互嵌式社区的经济治理体系中,利益共享与分配机制不仅是经济协作体系中的核心节点,更是构建多民族社会信任结构与认同机制的关键支撑。通过规范化的分配规则、公平合理的收益制度与动态协调的协作安排,多民族主体间的经济关系不断由交易行为转化为结构性联结,推动多元共生经济体系的有机生成。这一机制的完善既是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通道。在社区层面,健全的分配机制需要以制度来保障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参与的广泛性。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中分配规则不仅回应经济公平的需求,更嵌入社会结构、塑造社会信任,并在持续运作中重构族际互动的秩序逻辑。铜仁市Z社区依托集体经济平台构建起以农产品加工为核心的收益共享机制,通过组建经济合作社实施“按劳分配+资本分红”模式,不仅提升了分配透明度,也增强了居民的制度信任与参与意愿。在此过程中多民族居民由“分利关系”走向“协作关系”,进一步夯实了社会整合的微观基础。在区域层面,协同机制的构建带动了利益共享体系的延展。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L社区为例,手工艺产业链的打造推动了跨区域经济协同,各民族群体围绕生产环节实现分工配合,通过共享机制将文化资源

嵌入产业体系。协作结构的形成不仅提升了运作效率,也增强了族际合作的稳定性与内生动力,成为互嵌式经济网络的重要支撑。在政策层面,制度性资源的嵌入为利益共享机制提供了外部支撑。贵州省文化旅游基金通过支持民族特色旅游项目,推动民族手工艺、节庆活动等传统资源与现代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这些项目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还增强了居民的社会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此类制度供给提升了共享机制的运行效率,并通过政策反馈机制推动了共享价值的制度化。

五、社会治理路径:通过创新多元协商机制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效能

社会治理是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服务供给与认同整合的制度保障。在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中,面对多民族文化差异与利益诉求的高度复杂性,传统单一主体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精细化、协同性治理的现实需求。以多元协商机制为核心的社会治理路径,通过整合社区、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推动从行政主导向协同共治转型,不仅提升了民族事务治理的整体效能,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与有力的结构支撑。

(一)创新多方协商机制,推动民主共治与协同治理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多元文化共处、差异诉求并存的治理空间,亟待通过机制创新构建协商式、嵌合式的治理框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当社区缺乏强有力的凝聚力、向心力时,人们呈原子化分散状态,维护自身利益、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22]这种分散状态不仅会撕裂社区成员间的互助网络,更会直接削弱基层治理赖以生存的群众根基。“当群众力量在基层场景中逐渐式微时,基层治理往往深陷‘悬浮’‘空心’的泥潭。”^[23]传统的单中心治理结构因其决策路径封闭、回应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协调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多中心治理和协同治理理论为支撑,多方协商机制通过制度化程序、动态反馈机制与技术赋能体系,为互嵌式社区提供了有效的协作平台和制度保障。在实践层面,议事平台作为多方协商机制的核心载体,主要功能在于为多民族居民提供一个制度化、常态化的协商空间,使多元利益诉求得以在制度规范内进行表达与协调。在贵阳市M社区,议事平台吸纳政府、居民和社会组织多方参与,围绕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开展定期协商。通过政务公开、程序规范与协商监督提升了治理的透明度与参与度,逐步构建起族际间的信任结构与合作机制。动态反馈机制则增强了协商过程的响应性与调整能力。在贵州部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资源配置初期曾因信息反馈机制尚不健全而出现供需不匹配的现象。其通过设立实时信息反馈机制,相关决策得以及时调整与修正,提升了治理方案的回应性与公平性。动态机制打破了治理与需求之间的时间差与结构割裂,使社区治理真正转向高效运行模式。在多民族社区中协商平台既是话语空间的制度化表达,也是共识生成的认同容器。当协商机制深入日常生活,民主就不再是一种程序安排,而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存在方式,并在实践中不断“达成治理效能与民主价值的有机统一”^[24]。

(二)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协同秩序的社会化建构形式,它不是简单的主体叠加,而是通过关系生成、制度协作与情感认同,实现治理由管理逻辑向治理逻辑的转换。它所塑造的不只是权责格局的重构,更是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重申。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明确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广泛参与、责任共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

步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协同共建、融合共治的制度架构;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标志着社会治理从理念建构到系统建构的深化。随着这些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已不再停留于宏观理论层面,而是具体落实到多民族社区治理的实际需求之中。在多民族社区治理中,社会结构的复合性与需求的多样化要求治理模式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协同”。社会组织、企业与志愿服务等社会力量在资源补充、功能协作和情感联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组织凭借其专业能力与运行灵活性,已成为多民族社区中联结特定群体、服务差异化需求的重要力量。在贵州省部分社区,企业通过援建基础设施与文化交流空间,支持文体活动的常态化开展,不仅改善了社区环境,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认同结构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成。这种由企业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推动其角色从经济主体向公共事务协同者转变,强化了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嵌入。在贵阳市N社区,组织化的志愿服务通过“邻里守望”行动与民族交流活动构建起跨民族、跨家庭的互动桥梁,重塑了社区内部的信任体系。志愿服务因其低门槛、高频次与广覆盖的特性,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响应滞后的不足,成为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柔性嵌入机制。

(三) 完善民族事务调解机制,促进社区和谐与社会稳定

民族事务调解并非治理体系中的边缘性安排,而是在族际关系内部结构持续演化背景下嵌入情感调适与规范协商的关键机制。互嵌式社区的构建使得原本相对封闭的群居空间转化为频繁互动的社会场域,文化差异与认知分歧也因此更加凸显。在这一结构性张力之下调解不再是行政性的手段,而成为制度性介入与情感性修复之间的一种平衡策略。它并非以刚性秩序替代社会弹性,而是通过规则明晰来缓解因信息不对称与身份错位带来的信任风险。在贵阳市A社区,针对社区事务中出现的文化理解差异,调解机制以“法律规范+社区规则”构建协商路径,使居民得以在可预期的制度规则中表达分歧、协同处理。程序的意义不在于压制矛盾,而在于为协商提供安全空间,使冲突得以转化。如果说程序构建了可预期的行为秩序,那么柔性调解则引入文化理解与关系修复的实践理性。部分冲突往往源于文化经验的断裂与情感结构的错位,而法律条文难以触及其实质。在安顺市P社区的一次调解实践中,调解者围绕社区内部存在的传统观念差异,引导长辈介入调解,调动礼仪与习俗资源,使协商过程转化为一种文化重组的关系修复。这种调解不仅强调规则的有效性,而且在认同基础上探索持久共处的可能路径。更深层的调解机制是如何将“共识的生成”纳入日常结构,而非偶发性的制度调解。参与机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扩大了治理的主体结构,更因为它将个体记忆与集体秩序联结成一个可被持续调动的认同系统。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指出:“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他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25]82}在贵州省若干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中居民通过对话平台协商公共事务,使调解成为一种关系重塑的制度形式,社区的信任结构亦由此获得新的锚定方式。调解机制不仅仅是问题本身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社区认同结构的再生产过程。

六、心理治理路径:通过完善心理认同体系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

心理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支撑,是联结多民族社区成员思想结构、情感

逻辑与行为模式的深层机制。在多民族社区治理实践中心理认同是内嵌于认知生成、情感共鸣与社会互动之中的动态系统,它通过持续激发个体对国家、民族与文化的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构建起从制度共建向精神共识转化的内在通道。心理认同的培育不仅需要依托传统文化的延续与核心价值的传导,也需要回应时代语境,通过教育更新、技术嵌合与生活场景的日常浸润,使共同体意识由制度嵌入转化为心理结构的自觉内化。

(一)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构筑思想认同基础

思想认同是多民族社区心理认同体系构建的起点,是个体在共同体中达成价值归属与文化自洽的认知过程。常态化宣传教育对于增强全体人民思想认同和价值观念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26]。在多元文化并存与社会结构复杂化背景下,思想认同的构建既需要制度性规范,也依赖于情境化路径。唯有通过宣传教育方式的多维创新,打通“认知—情感—信念”的生成链条,才能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首先,依托现代传播技术构建多元媒介体系,提升宣传教育的互动性与沉浸感。在贵州省部分互嵌式社区,通过营造沉浸式文化情境,将少数民族历史、节庆与日常生活场景具象化呈现,使居民在共同体验中感知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这类情境生成式教育,不再是对文化知识的灌输,而是一种对文化空间的共在体验。思想认同像一张由记忆、经验与情境共同织就的关系网络,只有当个体意识到“我已然置身其中”,共同体意识才真正产生。其次,聚焦核心价值理念的内容建构,推动价值内容从抽象理念向具象表达转化。中华文化中的“家国一体”“和而不同”“命运共同”观念,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支柱,也是多民族文化共识构建的底层逻辑。贵州省一些社区在宣传中通过“情景化演绎+叙事式传播”,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历史节点和地方记忆串联成系列短剧,在公共空间中循环呈现,在视觉共鸣与叙事沉浸中激发多民族群体的认同情绪。最后,宣传教育深入日常生活,将思想认同嵌入社区空间与居民互动之中。思想认同的生成不是通过一次性的灌输,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关系互动与情感渗透。

(二)优化社会支持体系,营造包容心理环境

在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中,社会支持体系不仅是缓解心理压力的关键机制,更是推动认同生成与归属建构的重要路径。社会支持包含情感支持、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评价支持四个维度^[27],分别通过心理慰藉、实际帮助、认知引导与反馈评估回应个体需求。在多民族社区中,语言差异、文化隔阂与资源分布不均常引发适应性障碍,亟待通过支持机制实现资源统筹与情感联结,营造包容而有温度的心理环境。情感支持作为基础环节,通过互动关怀重构心理纽带。在铜仁市Q社区,通过刺绣、音乐、书法等文化形式建立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居民反馈显示,此类活动显著提升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与社区包容感。贵阳市R社区设立心理健康服务站开展心理评估与个性化辅导,并通过数字系统动态跟踪服务对象。服务站不仅扩大了心理服务覆盖范围,也提升了居民对治理体系的信任度。部分社区举办心理适应与文化融合讲座,通过资源介绍与文化课程帮助新迁入居民快速融入环境。为解决语言障碍,一些社区探索多语种服务平台,推动信息可达性与认知共建,拓展了支持系统的普适性。安顺市部分社区探索建立积分激励机制,鼓励居民参与日常互助与社区事务。该机制通过规范反馈程序与认可形式增强了居民“被看见、被肯定”的体验感,有效提升了社区参与度与群体信任水平。对多民族居民而言,这种制度安排在强化互动的同时也构筑了柔性的认同平台,使评价支持在潜移默化

中转化为情感联结与心理归属。多维协同的社会支持体系不仅缓解了个体在适应过程中的心理压力,也在制度与情感的交汇中积蓄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动能。

(三) 创新心理融合模式,实现情感深度交融

心理融合是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情感认同走向深层化、持久化的重要机制。“个体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内涵,就是促进个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融合。”^[28]与空间嵌入、文化交流等外显路径不同,心理融合聚焦于居民主观认同的生成过程,强调情感共鸣与内在归属的耦合逻辑。在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中,心理融合需要从认知引导、路径建构与制度嵌入三方面系统推进,才能有效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与心理支撑。首先,认知同频是心理融合的认同基础。多民族社区中的心理异质性主要来源于文化隔阂、身份分层与记忆断裂,单纯依靠信息传递难以构建稳定认同。因此,社区治理应强化共享认知的构建机制,围绕多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象征与现实关切开展具象化、情境化的认知引导。贵州省多个社区将“家国情怀”“多元一体”等理念嵌入社区治理与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制度引导与情境呈现并举的方式逐步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与文化根系。其次,交往嵌入是实现心理融合的实践路径。融合的关键不在于“表达相似”,而在于“体验共在”。通过设计高频次、低门槛、深参与的情感交往机制,推动多民族居民在互动中建立信任关系与情感依赖。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部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民族团结食堂,社区通过“食堂+”运营模式,举办民族节庆宴和文化展示活动,使居民在共同参与传统美食制作和民族文化表演中激发情感共鸣,打破群体间的隔阂,增强了心理融合的现实基础。最后,制度协同是心理融合的治理保障。心理认同的生成不仅依赖文化互动,更需要规则支持与反馈响应。社区通过制度化嵌入得以构建起动态感知与回应机制,确保融合过程具备稳定性与适应性。例如,铜仁市S社区建立居民情绪回访机制与议事参与平台,实时收集居民心理反馈并调整活动设计,实现了从“服务提供”向“情绪协同”的转变。这种制度协同不仅提升了居民参与度,也使社区治理更加精准、柔性且可持续。心理融合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深层机制,只有在认知共识的引导下、在交往机制的牵引中、在制度体系的支撑里才能真正推动情感的深度交融,实现多民族社区“共在感”与“归属感”的双向生成。

七、结语

互嵌式社区的探索实践根植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结构,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化、制度化、生活化的重要抓手。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战略部署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社区不仅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单元,也日益演变为共同体意识生成与巩固的关键场域。其构建过程所体现的不是单一功能的延伸,而是民族关系由物理嵌入向认同凝聚的内在跃迁。在空间重构、文化共育、经济联结、社会协同与心理支持等多维协同中,互嵌模式呈现出机制嵌合、功能复合、目标同向的综合图景,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支点与经验范式。从机制运行逻辑看,互嵌模式并不是将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要素并列堆叠的“拼盘式”设计,而是在多维场域中建构出彼此嵌合、相互作用的协同体系。空间维度提供交往的物理支撑,文化维度激发价值共鸣,经济维度拓展利益纽带,社会维度夯实治理基础,心理维度则实现情感内化。这一体系并非外在强加的制

度配置,而是在规则引导、机制协同与情境塑造中使民族团结理念在日常互动中自然衍生、持续积淀。它不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整合,而是从生活逻辑中生长出来的组织实践,因而具有自组织性、可调适性与可复制性的基层治理特征。

未来,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深化应在系统集成、主体培育与技术赋能三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推进嵌入要素的系统化集成,通过统筹空间布局、文化培育与心理调适实现治理机制的高效协同,打破条块分治与资源割裂的结构桎梏;二是强化社区在认同建构中的主体功能,围绕规则共建、事务协同与价值对话提升居民的参与动力,使其从治理对象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者与守护者;三是推动数字技术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深度融合,强化数字平台在数据采集、服务反馈与协同调度中的支撑作用,推动治理逻辑从程序响应向价值引导的转变。通过在机制协调性、主体参与性与技术适配性上的持续突破,为互嵌式社区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化转化中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与现实路径。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4-09-28.
- [4] 曲世闻,张本祥,高寒,等. 互嵌式社区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理与路[J]. 广西民族研究,2023(2):84-91.
- [5] 谭元敏,陈博.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逻辑与实践路径[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93-102.
- [6] 单菲菲,高敏娟,张东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实践与未来进路——基于三个民族互嵌式社区公共服务的调查[J]. 贵州民族研究,2024(1):39-45.
- [7] 红梅. 榫卯联结: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传统文化根基[J]. 思想战线,2024(3):53-61.
- [8] 周春芳. 以空间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广西社会科学,2024(5):96-104.
- [9] 龙金菊.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的情感逻辑——基于情感社会学的视角[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7):24-31.
- [10] 史诗悦. 党建引领视角下城市互嵌式民族社区治理研究——基于义乌市鸡鸣山社区的考察[J]. 民族学论丛,2022(1):92-98.
- [11] 郑洲.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以云南省洱源县郑家庄为考察中心[J]. 民族学刊,2023(1):75-86.
- [12] 沙彦奋,马丹妮.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宁夏 AH 移民村的调查[J]. 贵州民族研究,2023(3):103-109.
- [13] 黄慧. 互嵌·交融·共生:空间视角下拉萨市城关区互嵌式社区考察[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5-70.
- [14] 爱德华·W·索雅. 社会生活的空间性:迈向转型性的理论重构[G]//格利高里,厄里.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谢礼圣,吕增奎,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5] 常轶军. 增进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J]. 探索,2024(3):14-23.
- [16] 姜黎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进路[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8-14.
- [17]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8] 赵潜,李芳芳. 基于系统思维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阐释[J]. 广西民族研究,2024(3):156-162.
- [19] 郑长德.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互嵌式发展研究[J]. 区域经济评论,2024(1):88-98.

- [20] 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1] 温顺生,兰成东.融嵌—共生:民族互嵌型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G省H社区的个案分析[J].民族学论丛,2025(1):113-120.
- [22] 韩小凤.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共性困境及优化路径[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33-140.
- [23] 张力伟,李宇晗.责任型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J].探索,2024(4):42-53.
- [24] 邢国忠,赖希然.社交机器人的意识形态传播及其启示[J].探索,2025(2):129-140.
- [25]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26] 李传兵,任平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常态化宣传机制建构[J].贵州民族研究,2024(5):34-41.
- [27] HOUSE J S, LANDIS K R, UMBERSON D J.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J]. Science, 1988(4865):540-545.
- [28] 管健,杭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助推策略研究——个体、群体、社会情境三域综合模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1):209-215.

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of Embedded Communities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A Case Study of Guizhou Province

LI Yonghuang, ZHAO Qian

(1. Guizho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Guiyang 550004,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core task of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Establishing embedded social structures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s has become a ke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localizing and grounding this goal.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ccelerated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growing cultural diversity, embedde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aims to promote co-residence, co-construction, co-learning, and co-enjoyment among multiple ethnic groups. This model responds to challenges such as unequal resource allocation, limite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weakened psychological identity. Taking model commun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as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five pathways of embedded governance: spatial governance supports ethnic integration through optimized layout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cultural governance enhances identity through shared symbol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economic governance builds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s; social governance improves effectiveness through multi-actor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nd psychological governance fosters belonging and recognition through educational guidance and support systems. These interconnected strategies not only bridge structural and emotional divides in interethnic relations but also facilitate a coordinated shift from structural integration to emotional identity. The embedded community approach thus offer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model for strengthen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Key words: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mbedded communities, governance, comprehensive embedding

责任编辑:赵超

引用格式:孙会岩,侯劭勋.数智化党建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J].探索,2025(3):57-69.

数智化党建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孙会岩¹,侯劭勋²

(1.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2.上海开放大学上海信息安全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上海 200092)

摘要:随着数字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经济社会数智化转向正推动现代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效能发生深刻变革,促使数智化党建逐渐成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范式。与传统“技术+党建”相比,数智化党建更侧重人机互融、虚实同构等赋能社会治理,能够填充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理论构建与实际应用间的空隙,正在改变社会、政党与国家间的互动模式。数字智能技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潜藏着“利维坦”风险,技术理性超越价值理性的现实困境带来新的社会治理壁垒,数字平台具有特定的资本与技术逻辑、算法偏见带来的新型数字鸿沟、加之治理与制度滞后形成的伦理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基层党组织内聚力以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面对未来,需要从组织与技术互构深层维度优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理路,聚焦数智时代开放、动态的组织、社会系统,依循“技术嵌入-实践驱动-技术风险-路径优化”框架分析数智化党建的深层次命题,通过“组织-技术-队伍-制度”构筑以数智化党建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为核心指向的整体智治框架,推动组织、技术和社会深度融合,探索融合、多元、联动的智慧治理路径,进而为党的自身建设与引领“数智社会”提供启示。

关键词:数智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赋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057-13

基于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多重数字技术叠加效应,智能 APP、数字孪生、虚拟数字人、AI 大模型等已经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智能技术不仅成为引领社会治理的外部条件和技术工具,还向政党内部组织形态及运作机制不断渗透,推动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成为技术嵌入的基本场域。中国共产党作为引领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进程的关键力量,坚持技术赋能与制度赋权并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构,进而推动数智化党建逐渐成为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因此,需要把握技术与组织互构的逻辑理路,探索新一代智能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图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智治”迈向“善治”,进而为提升数智时代党的自身建设水平与引领“数智社会”创新发展提供启示。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时至今日,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数字智能技术已在各领域迅速渗透,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智化党建赋能社区治理的实践效能提升研究”(24BDJ084),项目负责人:孙会岩;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2024VVSZ012),项目负责人:孙会岩。

作者简介:孙会岩,男,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侯劭勋,男,上海开放大学副教授,上海信息安全与社会治理创新实验室副主任。

术进步与社会治理的互动过程日益成为基层党建领域需要面对的深层次命题。与传统“技术+党建”相比,数智化党建更侧重人机互融、虚实同构等赋能社会治理,能有效弥合原有基层党建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日益成为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范式。

纵观现代政党研究历程,技术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推动现代政党政治的重要动力。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几十年中,政党研究经历了信息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阶段,技术革命为政党革新增添新动力,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命题。一是国外学界很早就开始重视数字技术对政党的影响,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条件下政党重新获得曾经丢失给其他中介组织的功能,甚至重塑了政党^{[1]43};随着一些大党老党从“电子党务”到“信息化政党”不断转型,政党开始不断加强网络技术应用来巩固其地位^{[2]20-29}。二是国外政党政治体系正遭遇来自新兴技术的挑战,数字技术革新了长久以来依赖传统组织架构的层级管理范式^{[3]25};这些数字化赋能的政党因摆脱组织制度的固有惰性,更加倾向于采取“破坏性创新”的治理策略,甚至有学者把这一新的政党运行方式称为“数字化政党”^[4]。三是西方政党数字化的实践模式不断增多,在政党内部治理中党员招募和管理更加开源,内部选举与决策过程变得日益公开透明;在社会治理中随之兴起了数字治理、生成式治理等新理念,政党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化政府与社会协同,以实现多方政治参与、多元共建共治^{[5]54}。

对于国内而言,技术革命已然成为政党转型和发展的源动力^[6],社会快速数字化转型的新态势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7]。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数智化党建是“数字政治”的重要内容,强调通过全域、全员的数据感知和信息萃取对党建工作进行场景创设和协同辅助,并赋能社会治理的效能提升和对策研判;“数”既可以理解为互联网、大数据,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信息技术。“智”可以理解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也有学者将其解释为人机协同^[8]。第一,数智化党建不是数字技术与党建工作的简单叠加,而是多维度多层次技术增权和交互融通赋能党建工作的创新模式^[9];同时是一种具有动态、自适应、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新治理样态^[10]。第二,数字技术日益推动党建的实践形态不断增多,比如北京怀柔的微信群党建,重庆市的“141”基层智治体系,南京市的“链通万家”虚拟现实场景联动等。第三,技术双刃剑特性对基层党建带来新挑战,数智时代虚拟组织数量激增并与实体组织摩擦碰撞,造成信息超载和组织低效问题^[11];同时也会引起工具支配的价值风险、责任缺位的伦理风险、结构耗散的制度风险^[12]。第四,数字化技术融入党建的路径探讨主要包括顶层设计、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深入推进党建工作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13],主动谋求与专业技术企业合作打牢数字基建,进而实现党建工作与数字技术的有效融合^[14]。

从既有文献来看,数字技术进步与政党互动过程正成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领域面对的重要命题,需要从政党政治层面阐释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深层面影响。基于此,本文聚焦数智时代下开放、动态的组织、社会系统,依循“技术嵌入—实践驱动—技术风险—路径优化”逻辑分析数智化党建这一命题,通过厘清数智化党建的价值意蕴与实践逻辑,深入分析“数字化”和“智能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而从组织、技术、队伍、制度维度上构建政党与社会平衡的数智化治理新格局。这对于深入理解数智社会中的政党引领逻辑以及加强党的建设和实现“数字中国”整体愿景具有重要价值。

二、“数字技术+”党建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

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紧抓技术发展的历史机遇,从早期的电子党务、党务公开网,到后来的党建云、智慧党建平台,几十年来坚持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运用于自身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中,并在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增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了推动作用。

(一)信息技术赋能基层党组织功能重塑

世界的信息化进程加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自 1994 年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政党政治开始在这一时期从线下逐渐走向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有学者指出,信息高速公路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15]214},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信息技术在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强大作用。一方面,依托信息技术推动电子党务发展。早期的信息技术处于 web 1.0 时代,适用于党建领域主要是探索电子党务,以及为党员干部配备计算机并进行信息技术培训,尝试运用信息技术来提高党组织的服务能力。1996 年中央电视台建立门户网站,1997 年新华社网站、人民网先后创建,随后各地方网站纷纷建立,搜狐、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也开始崛起。中国共产党积极把握线上阵地以实现民众与国家的链接,党员干部不再受限于线下的物理范围,通过电子党务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民众与组织之间开辟新的宣传动员渠道。另一方面,地方积极探索信息化党建赋能社会治理模式。随着 1999 年腾讯公司开发 QQ 软件、邢明创办天涯论坛等网络交往平台,民众的政治参与也开始从线下走向互联网,一些地方通过引进数字技术和装备,积极制定政策推动社会的信息化水平。如福建省提出的“数字福建”政务工程^[16],浙江省以“电子党务政务”为突破口在全国县域范围内率先使用电子党务办公网^[17],这些探索减少了基层党组织内部治理的无效摩擦,开创了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融合发展的新局面。随着信息技术日益成为政党功能重塑的重要工具,有效的秩序在信息化早期探索中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于 2001 年成立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形成政党引领式的技术管理体制,为信息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互联网+党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技术推动社会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性的^{[18]203-232}。互联网在 21 世纪初开始迭代升级,不论是网民数量还是网络基础设施都较信息化早期有很大突破,中国共产党把互联网作为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构建“政党—技术—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持续驱动经济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一方面,通过 web 2.0 提升政党自身治理数字化水平。随着网民数量快速发展,促使政党组织拓展自身的“联络版图”,一些基层党组织开始借助网络搭建起线上沟通桥梁实现便捷、高效的交流互动,让广大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在网络空间的坚实存在。如上海开通地方区域党建网站“杨浦党建网”,中央办公厅 2004 年将“电子党务基本理论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予以立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6 年 7 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为构建“三网三库一平台”提供强有力的数字化支撑。在此基础上,众多地方相继推出民意沟通与整合的党务公开网站,为政党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大动力。另一方面,网络技术赋权提升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在 web 2.0 技术加持下,设计完善的网站给党组织提供了富有凝聚力的前端,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 2006 年颁布《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2009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

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19]¹⁷。各地各单位开始通过网络整合与线上回应等方式解决广大网民诉求,为“全方位”影响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可见,“互联网+党建”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借助互联网优化组织结构、梳理内外部流程,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数字化知识与专业技能,以此保障实现内部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三) 智能技术革命推动数智化党建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智能技术进入革命性发展阶段,“从使用位置数据的智能手机到城市中心的各类LED屏幕,各种新传播技术以新的方式将媒介空间化,并构成了当代世界有机的组成部分”^[20]¹。虽然政党功能定位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但都意识到智能技术是政党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甚至出现全新的超越于传统类型学的“数字化政党”。一方面,基层智慧党建模式不断创新。新时代的数字技术不仅冲击传统政党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也对政党功能和价值范式提出了新要求。2019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21]⁸⁰³。这期间,哈尔滨探索的“大数据党建平台”、德阳市“1平台+N系统+1终端”党建服务平台、重庆的“群工系统”纷纷亮相^[22],推动基层智慧党建实践从边缘转向主流、变被动为主动。另一方面,依托智能技术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升级。时至今日,“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3]³⁶²。以数据为核心驱动力的决策机制与“计算式治理”^[24]模式正在基层快速发展,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党中央专门设立社会工作部统筹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工作,同时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国家数据局等。各地方也积极探索技术创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如上海浦东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城市大脑4.0”中,通过民情民意感知平台为解决复杂问题提出高适应性解决方案。截至2024年底,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近2.5亿人,数智化党建在技术现实和党建实践层面不断迭代演进,有力推进基层治理的组织架构、运行流程、监管体制等转型升级。

三、数智化党建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意蕴

在经济社会深度数字化背景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依托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不断叠加升级,推动人类进入名副其实的“数智时代”。数智技术蕴含的数据感知、虚实交互、情景策略创设等特征,能够填补传统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理论构建与实际应用间的空隙,正在改变着传统社会、政党与国家间的互动模式。

(一) 以“智能集成性”增强基层党组织全覆盖水平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演进,社会空间场域虚实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政治生活也呈现从“社会人”转向“数字人”的趋势,一些政党开始不断注重数智化的技术应用来壮大自身力量,推动数字技术不仅成为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外部条件,也在向政党内部组织生态和运作机制不断地渗透、扩散和嵌入^[25]。一方面,数字技术“集成性”优势能够推动传统领域组织全覆盖。多重数字技术可以降低组织门槛和淡化组织边界,有益于打造开放、渗透性强的组织生态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可以实现对党组织及党员干部信息数据的集成管理,包括党员个体信息、党组织活动内容、党建项目流程等,基层党组织通过智慧党建网、党建公

众号、党建 APP、党建 VR 体验馆等创新组织活动形式,扩大传统线下组织覆盖面,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从“治”到“智”的转变。另一方面,数智化“在线式”特点能够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面对外卖、快递、直播、网约车等新兴领域流动多元的群体差异,借助虚拟党组织、在线管理平台等数字化工具,实现组织生活的网上网下相结合,有效提升组织的活力和覆盖广度,如通过数字孪生和通用型人工智能技术实现“项目党建”“平台党建”甚至是“空间党建”等场景,为组织覆盖、决策优化提供强大的支持,实现组织发展与技术势能的深度融合。与传统组织矩阵相比,智能集成性有效实现了不同区域和领域的组织力量整合,并衍生出多元、复杂、融合的物理新形态,为政党内部治理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提供了新模式,在基层党组织“再组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以“智慧引领性”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在新一代数字技术影响下,人类正迈入一个“日益量化的社会”^{[26]33}。各种新型智能化平台有效改变传统组织体系中治理效率低下的难题,量化的数据对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带来便利。首先,智能技术推动意识形态的主客体不断被“算法化”与“技术化”,数字技术带来新质生产力和分工体系变革,政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面临技术的二次重构,元宇宙、云计算等数字化平台可以让主流意识形态变得更为喜闻乐见,提高年轻党员和高科技企业党员参与党建工作的积极性,政党可以借助数字化社交媒体形成叠加式的新连接,激发不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促使基层党建工作深入人心。其次,智能算法推动党员教育管理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智能技术带有更多的传感器,模拟人类行为的能力将变得更精细。”^{[27]136}数字孪生模型能够重塑党员教育管理环境,进行学习质量监督、个性化教育方案定制、情感心理元素引导^{[28]39},实现党建信息个性化推送、党员行为精准识别、党员管理系统升级,从技术上解决“数据孤岛”问题。最后,数字技术不仅能够优化日常党建工作流程,还能通过机器学习提升党组织决策能力。党务工作者通过大语言模型辅助党务工作,有益于减少繁文缛节,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减少沟通交流成本,探索新型党费缴纳、组织关系转接、组织生活等电子化办公流程,通过智能 APP、数字机器人等全方位提升基层党务工作效率。可见,随着技术的广泛运用,数字智能化从辅助性功能转向主导性功能,基层党组织以数字技术手段来补充线下策略工具包,能有效推动组织形态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革新和调适。

(三)以“数智交互性”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符号化”“数字化”日益成为技术社会发展趋势,人机融合及其具体实现方式成为影响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因素,很多政党通过大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机器分析,利用大数据的完整信息链条复盘,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监督,既包括价值认同层面的,也包括决策、范式、方法本身层面的整合。首先,数字化交往为党内民主开拓便捷高效的新渠道。具备特定的数据管理和机器学习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改善集成产品开发的测量和实践,运用大数据技术、智能感知技术能有效激发党员政治参与的热情,数字算法可以全面分析党员的政治诉求和意见建议,从而更好落实和保证党内民主的良性运行。其次,多重数字技术助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运用到反腐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对腐败的整体性治理,通过将客观数据引入腐败治理的组织管理过程中^[29],增加个别人通过权力寻租的成本,进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由“碎片化”走向“系统化”。最后,数智化推动党内监督科学发展。

在党内监督工作范畴内,新一代数字技术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对各类相关数据展开深度剖析,涵盖党员活动参与情况、理想信念、党性觉悟关键信息,通过机器学习、语义分析等建立队伍思想评价标准,精准洞察潜在的风险隐患与存在的问题,助力党内监督工作实现精细化、精准化发展。总之,数字化技术通过其即时互动与深度沉浸的特质,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模式的革新,有效实现了从人为管党到技术理性决策的价值嬗变^[30],体现党内民主平等与反腐败斗争的算法理性过程。

(四)以“整体智治性”赋能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技术的快速迭代导致政治关系的可预测性减弱、社会政治空间趋向碎片化,依赖于传统人海治理的管控体系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治理情境,智慧治理作为一种多重信息技术叠加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正成为助推基层社会向更高层次演进的途径之一。一是数字化技术的即时交互为民众政治参与提供了新载体。算法升级降低了民众在线上参与过程中的时间与空间成本,使得个体能够更容易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助于整个政治系统循环有序进行,这种开放性深度影响着政治过程中的智能反馈、智能评价以及体验,进一步激发了受众的自主参与热情^[31]。二是多重数字平台有助于“数字群众路线”的开展。智能算法可以快速从大量数据中挖掘出潜在的和深层次的信息,整合分析民情民意,增强党政服务群众需求的匹配性,例如杭州市利用“城市大脑”开发出“邻里E家”,社区干部以“家人”身份通过数据库和AI智能数据分析群众需求,实现分类管理、精准服务,打造真实且精准的居民图谱。三是数字化技术的智能创造有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能力。数字技术的智能分析处理能力帮助基层政府洞悉社会治理问题的细微差异和内在机理,挖掘数据背后的深层信息,为决策提供了更科学的指引,如一些地方探索的智能政务机器人、智能问政系统、智能公文系统、智能认证系统等^[32],有效实现了决策的更新升级,切实为基层减负增效。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在线政务用户规模已经突破10亿人,随着基层数智场景不断增多,智能算法和硬件技术一起构成智能时代的“眼睛”和“耳朵”^[33]¹⁶⁴,虚拟和现实空间的相互融合让社会生活焕发新的活力,技术赋能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分析决策和问题解决能力。

四、数智化党建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挑战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党建领域的普及度不断提高,技术治理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数字平台具有特定的资本与技术逻辑,算法偏见带来的新型数字鸿沟,加之治理与制度滞后形成的伦理风险,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基层党组织内聚力以及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和整合力。

(一)资本逻辑制约数智化党建的技术覆盖水平

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需要深厚的技术积累与大额资金投入,在资本逻辑影响下,企业的工具理性往往高于社会的价值理性^[34]⁹⁶,算法推送与认知引导功能决定受众所接收的信息内容并深刻影响着用户时间、精力与注意力分配倾向,甚至潜藏着技术失控风险。一是资金因素导致地方在数智化党建领域建设参差不齐。由于资金投入差异,大型科技公司对数字技术和信息的垄断会危害民主^[35],有些地区数智化党建实践局限于党建网页与APP层面,主要用于党务信息公示和教育资料分享,以及在线学习平台增强党员的教育培训、互动交流和管理工作;有的偏远地区党组织还没有实现数字化转型,其党建管理模式仍主要依靠传统线下方式。二是智能集

成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存在不足。商家和企业依靠技术加持来获得更大利润,其无边界性、去中心化的倾向可能带来组织信息泄露和“数据投毒”^[36]风险,传统的治理机制在面对此类规模化的信息治理时显得力不从心,党建数据渠道容易被资本所掌握,组织之间的党建资源、基层政府之间的治理资源往往难以实现共享。三是轻视内容建设的数字形式主义弱化党组织凝聚力。党建APP、党建大模型往往耗资较多,由于人力物力投入不均的内容建设和数据维护,给基层带来了信息焦虑、数据疲劳、分析瘫痪等问题。由此观之,技术的资本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党建资源的协同与覆盖,单位间的数据烟囱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导致数智化党建呈现碎片化特征,难以全方位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二)新型数字鸿沟带来党组织组织力算法偏见困境

由于新一代数字智能技术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数字精英群体能够充分认识其价值并灵活运用,而大量算法技能薄弱的民众则难以触及数字孪生、大模型技术的高级应用领域,进而催生数字原住民与数字边缘群体之间的分化,给基层组织形态、层级体系、权力格局带来了新的挑战^[37]。一方面,技术鸿沟带来“数字化移民”的技术剥夺感。由于不同地区参与数字革命的时间先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率的实际差异,数字财富与知识创新红利更多局限于“数字精英阶层”,新一代AI大模型有自己的语料库,倘若各类语料库在政治理念呈现、多元文化背景等存在差异,在党组织工作推进过程中可能阻碍党员的成长,破坏党员政治认知发展的均衡态势。以老年党员为代表的部分社会群体,易遭受技术“挤出效应”冲击,阻碍他们在党建信息平台上的信息获取与服务享受,同时老年人和青少年规避成瘾性技术风险的能力比较薄弱,AI“数智员工”会生成大量虚假信息,容易造成不良的社会动员后果^[38]。另一方面,算法存在的原始数据和规则设计偏见使人不知不觉被困在信息茧房当中,由于种族、地域、身份、性别等原因,数据传播容易造成社会认知的分化,给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带来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部分数字化基层党建平台发布的信息往往较为严谨、专业,内容相对枯燥,缺乏吸引力与共情,对群众的服务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倾向,对年轻党员和新兴就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缺乏研究,从而导致“自弹自唱”的局面。因此,“去中介化”的数字体系容易导致组织结构脆弱,若仅凭借数智化党建领域内的信息技术平台来全面推动党建工作,不仅会导致数据收集过程中存在缺口,还会影响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甚至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难以充分彰显其设计初衷与潜在效能。

(三)技术治理逻辑弱激励下的基层治理决策风险

随着技术工具力量呈指数级增长,它们的潜在危害也在同步激增^[39]³⁸。在数智化转型的社会治理实践中,作为主体的一些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容易受技术治理逻辑主导,进而带来责任意识淡化及边界模糊的决策困境。一是基层社会治理领域面临技术人才供需失衡问题,具体表现为党建理论专家与信息技术人才、党务工作者与技术使用者之间的技术鸿沟,即精通党建理论者往往对新一代智能技术知之不多,导致党务工作者的数字化能力难以匹配数智化党建日益增长的需求,如对区块链、VR/AR、交互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了解和运用较少,从而在不同层面上削弱数智化党建的实施效果,对数智化党建工作的全面推进构成障碍。二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采集、管理和共享标准,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数据难以互通互联,从而影响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如何让数字化手段真正契合群众的实际需求,依然是亟待“人”这

一主体进行深入思考与规划的关键议题,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驱使下,社会治理的新问题还会在更广泛的层面出现,如不合理疏导甚至会导致社会撕裂的风险。三是数字化治理平台运营维护有待加强。在量化考核指标的作用下,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与治理实践很容易发生偏离,在“一窝蜂式”政绩驱动下,容易导致数字形式主义,逐渐推动人治主义向技术治理转变,使数字技术存在取代人类主导地位的风险^[40],这不仅增加了基层工作负担,还助长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四) 制度与技术不协调影响数智化党建的责任伦理

技术与制度的相互适应日渐成为数智化党建领域的一大难题,高速发展的技术想突破原有制度限制,一些制度呈现滞后性甚至制约技术发展,“新技术—旧制度”的不匹配状况愈发突出。一方面,新技术赋能凸显旧制度框架张力不足。技术依赖型治理模式以其强大的去壁垒能力和跨部门协作潜力,在推动基层党建数字化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制度的内部矛盾周而复始,这是政治体制的普遍特征”^{[41]138},导致基层治理实践中容易陷入新的治理困境。具体到数智化党建工作,数据资源标准的差异、体系规范性制度的缺失以及部门间协调联动制度不足,造成数据流通的不畅,无法保障数据的准确性、时效性和共享性。另一方面,技术转移加速推进与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在人机关系日益成为治理模式新特征的背景下,现有治理制度在缓解基层工作者与大众隔阂方面显得捉襟见肘,这种不匹配让新技术在落地应用环节面临合规性障碍,而现有制度所固有的局限性制约了新技术潜力的深度挖掘与全面发挥。此外,在智能应用快速爆发下,传统的网络空间权利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部分地区在数智化党建建设中缺乏统筹规划,导致系统建设分散、信息孤岛问题突出,党建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与共享,使得大众成为数字化浪潮下的技术应用落后^[42]。总之,在技术实施过程中,当原有制度难以约束其发展就会呈现滞后性甚至扭曲性,无形中增加数据流通和基层治理成本,甚至制约平台公司对数据价值进行深度挖掘和再投资,进而影响数智化党建的责任伦理。

五、数智化党建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智慧化的路径探讨

当今世界正趋于人和智能技术共存的开放式技术创新时代,要把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构逻辑,通过智能技术增强党组织“对内”的覆盖力度、组织功能和政治功能,以及“对外”的群众工作能力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等,构建出融合、多元、联动的优化路径,进而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引领“数智社会”提供启示。

(一) 组织赋能: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党建引领的组织体系

对于政党而言,政治功能是管方向的根本,组织功能是保落实的基础,数智化党建不仅取决于政党自身的战略考量,更强调“政党引领型”的技术社会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需要完善“智能+党建”的顶层设计,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与组织功能。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技术治理向善发展的前提。数字变革浪潮促使政党的目光更多聚焦于价值规范层面,“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43]10},要坚持党委统一规划和整体部署,形成真正的数智化党建格局,党组织依靠强大的顶层设计能力从精心规划、合理组织到严格监督、有效治理以及深度优化,通过党的领导实现跨功能、跨权限、跨层级的整体布局,防范化解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二是加大数智化党建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整合力度。

党建数据需要从不同层级组织和部门甚至从社会和企业中获得,需要贯彻新型举国体制形成科技治理的创新生态,通过党委政府系统梳理资源共享清单,对分散割裂的资源进行整合,减轻数字化的基层负担,避免智能平台重复建设等问题。三是注重数智化党建理论研究,引领党建工作迈向新高度。传统的基层党建多呈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研究范式,在理论研究上需要着力拓宽数智化党建的研究视野,积极将公共管理领域中关于治理理念、计算机学科的计算等理论深度融入数智化党建研究体系之中,推动数字化资源高效便捷地在党建中多元共享。总之,在政党迈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提升党的领导和顶层设计能力是政党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党引领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将“技术嵌入—组织变革—制度革新”串联起来,通过对组织系统进行内部资源配置,使之产生先锋队合力并发挥作用,进而走出政党引领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范式。

(二)技术赋能:突出“智能+党建”高质量发展全域数字生态

技术赋能是赋能理论在现代数字化背景下的重要延伸,就基层社会治理而言,以技术赋能为导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数字技术驱动的治理模式具备协同整合的强大效能,能将各类资源与力量有机融合,促使治理策略改进升级,呈现精细敏捷的显著优势。首先,数智化平台是数智化党建的基本载体。基层社会巨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人感”数据和遍布空间的物联网设备带来的“物感”数据构成现代基层治理的信息来源^[44],在此基础上的“智慧党建”平台打破传统科层体系的行政壁垒与碎片化结构,让基层社会治理从部门化运作向平台化运作转向。未来还需要加大对大型语言模型输出检测的研发投入,开发新工具以增强对算法与生成内容的监控与筛查,开发问答机器人为党务工作提供咨询、情感支撑,构建科学精准的党员群众“画像”算法,形成包括平台战略制定、架构设计、生态系统等在内的基层社会治理全景功能。其次,发挥技术的治理功能,赋能敏捷型社会治理。数字化生存让我们用更精细的方式了解社会运作动态,为打造更加智能、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海淀区政府利用政务大模型将查找数据、指标计算等场景所需的3天工作降低到1分钟;深圳福田区推出基于DeepSeek开发的70名AI数智员工,覆盖公文处理、民生服务、应急管理、招商引资等多项工作,不断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45]。最后,建立技术安全标准并定期开展风险评估。数字智能技术发展已经超出人类对其设定人权标准的速度,这种超越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为此,必须建立严格的技术安全标准,以确保数据处理和存储的安全性。例如,引入加密技术和分布式数据库,通过“收集—分析—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综合评估和优化基层治理流程,定期审计和监控降低外部干扰带来的技术风险,确保基层治理数据独立自主。

(三)队伍赋能:线上线下联合重塑社会治理决策范围

数字智能虽然在处理大量数据上有出色表现,但其缺乏对世界的真正承诺和伦理责任感,使其难以替代人类判断能力。无论是政务管理、公共服务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人的数字化能力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2024年,国家九部委联合印发《加快数字人才培养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强调数字素养已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一是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数字化本领。要“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46]。作为新时代的干部,加强数字化应用不仅是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的必要途径,更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党员干部要“以人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持续学习新一代人工智能知识,拓宽智能化视野与思

维方式,深化对数智化党建核心理念的认识,并着力提升个人的数字化技能与综合素养。二是注重线上线相结合做好群众工作。要协调好线上与线下角色分工,回归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和目的价值,通过人机协同打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枢纽,将点多、线长、面广的群众工作汇聚到“智慧窗口”,实现群众在哪里工作就做到哪里的愿景。同时,要适当对基层群众的智能技术能力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通过开设一些数字技能课程、组织线上与线下培训等方式,帮助基层群众掌握数字技能方面的知识,提高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三是找回人机协同决策的主导性。在人机协同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机器自主决策的高效能优势,让其快速、精准地完成相关工作,又要把握基层社会治理的决策自主权,基层治理决策者不能有懈怠与放松。为了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靠性,需坚持价值理性构建起智能决策结果预测机制,在决策执行前对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科学预估,并不断激发数字生态环境沉浸的年轻一代“数字原住民”参与治理的热情,把各方面优秀的人才汇聚到社会治理体系中。

(四) 制度赋能:完善技术伦理推动人机协同的敏捷治理

制度赋能治理是一种与技术治理相补充的观点,“社会数字化”不仅会推动现存技术治理的变革,而且也会使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理论与法律文化发生改变,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基于算力、数据和算法三大要素确立和发展的,在快速迭代升级中使原有的制度滞后问题更加凸显,倒逼政党政府推动现存的制度机制变革。一是不断完善引领数智化党建的通用制度。数字化改革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改革带来的是系统性重塑,是一场制度革命,是从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的跨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基于此,《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对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提出切合工作实际的数智化党建标准化建设思路。同时,一些地方在探索中也出台相应制度,如《北京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等,根据党建工作目前需求,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设计数字化系统的整体框架和功能模块。二是健全双重约束的权责体系,保障民众的数字化权利。在吸收借鉴既有制度安排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和完善层次化的原理解释机制、标准化的记录留存机制、结构化的人工介入机制^[47]。不断健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适老化制度,积极探索建立数字服务地区间、群体间公平机制,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保障智能技术领域的正义属性,进而实现对民众需求的制度回应以及为民众提供更好的体验环境。三是不断探索多方合作共建技术伦理制度。随着开源优势的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等的重大突破,使我们深刻意识到数智社会的关键在于形成多方协同机制的重要性,应加强与社会组织和企业间的合作,通过多方利益合作共同推动技术的社会治理与安全制度共建。总之,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数智时代的重要悖论,即“一个社会的数字能力越强,这个社会就变得越脆弱”^[48]¹⁸⁹,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打通“技术嵌入—组织运行—数字服务”链条,最终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治与善治。

六、结语

今天的政党正在卷入不可逆转的数智时代浪潮,技术进步日益成为政党自身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驱动力,数智化党建作为新时代政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范式,有效回应了数字

技术革命与社会治理智慧化的双重需求。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始终致力于优化组织系统资源配置,打破“信息孤岛”与“数据壁垒”,以此开辟出一条党领导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典范路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49]³⁴¹。因此,面对新一代数字化技术升级掀起的智能化浪潮,政党自身的数字革新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平台实现渐进式组织革新。政党自身内蕴着崇高的使命引领与强烈的责任担当,主要是遵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逻辑^[50],这一使命体现在鲜明的现代化导向,有效的数字智能算法能够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从而做到“从环境中实现自主、并达到党内结构的高度凝聚”^[51]²⁵²。

另一方面,数智化并非政党自我革新的万能钥匙,需审慎推进新一代数字智能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融合应用。既要不断加强组织自身的数字化程度,通过智能技术成立虚拟党支部、智慧党建等平台,升级“智能+党建”领域的顶层设计,既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组织与政治功能,又要注重顶层设计,减少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制度的价值理性规训“算法化”与“技术化”带来的“信息不断”却“知识贫困”结果。这需要在智能技术运用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组织架构优化、运行流程精简以及监管体制重塑,通过数智化党建提高风险识别精度和准度,加强数智技术的顶层设计引领“使命-责任体制”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政治形态。

总之,数智化党建既是技术革命的必然产物,也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标志。要构建以政党为中心“技术嵌入—组织运行—数字服务”的链条,不断推动政党政府与技术研究领域的深度合作,确保技术、组织与价值理念的深度协同,从而塑造出价值导向明确、组织结构高效、技术应用精准的基层社会数智化治理新生态,尽而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启示。

参考文献:

- [1] 史蒂芬·E·弗兰泽奇.技术年代的政党[M].李秀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3] GERBAUDO P.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M]. London: Pluto Press, 2019.
- [4] DOMMETT K. Are digital parties the future of party organization? a symposium on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by paolo gerbaudo[J]. Ita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ri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2021(1): 136-149.
- [5] GILARDI F. Digital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 [6] 刘红凇.技术革命驱动政党转型发展:历史逻辑与当代演绎[J].政治学研究, 2021(6): 128-139.
- [7] 苏竣.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中国道路[J].中国行政管理, 2021(12): 21-22.
- [8] 张志学,华中生,谢小云.数智时代人机协同的研究现状与未来方向[J].管理工程学报, 2024(1): 1-13.
- [9] 刘元贺.界面整合与流程可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减负的实践探索与内在机理——基于重庆市G镇“141”基层智治体系的观察[J].探索, 2025(2): 115-128.
- [10] 米加宁.生成式治理:大模型时代的治理新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 2024(10): 119-139.
- [11] 许丹,姜晓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治理数智化变革风险及其实践规制[J].行政论坛, 2024(1): 54-64.
- [12] 刘伟兵.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逻辑与科学防范[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 10-19.
- [13] 张春满,王秀.数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技术与组织互构的理论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 2024(5): 101-109.

- [14] 张冬利. 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赋能智慧党建的逻辑与策略[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 21-32.
- [15]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 [16] 游宪生. “数字福建”纵横谈[J]. 发展研究, 2000(11): 5-8.
- [17] 耿建新. 实施电子政务工程 构建党政机关信息桥梁[J]. 信息化建设, 2001(11): 30-33.
- [18] 刘易斯·芒福德. 机器神话: 上卷[M]. 宋俊岭,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 [19]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0] 斯科特·麦夸尔. 地理媒介: 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M]. 潘霖,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 [2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22] 徐明.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数字化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5): 126-133.
- [23] 习近平书信选集: 第1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24] 阙天舒, 吕俊延. 智能时代下技术革新与政府治理的范式变革——计算式治理的效度与限度[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2): 21-30.
- [25] 孙会岩. ChatGPT技术视野下政治秩序重构及其风险治理[J]. 学术界, 2023(8): 81-90.
- [26] 杰米·萨斯坎德. 算法的力量: 人类如何共同生存[M]. 李大白, 译.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
- [27] 阿莱克斯·彭特兰. 智慧社会: 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M]. 汪小帆, 汪容,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 [28] 金江军. 智慧党建[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
- [29] 董石桃. 技术执行的组织整合: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大数据反腐[J]. 电子政务, 2020(11): 24-36.
- [30] 谭新雨.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嵌入社会治理: 赋能场景、风险样态与规制路径[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2): 97-111.
- [31] 黄威威. 传统党建融合数字党建: 新时代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J]. 探索, 2024(2): 86-97.
- [32] 汪波, 牛朝文. 从ChatGPT到Gov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构建[J]. 电子政务, 2023(9): 25-38.
- [33] 卡洛·拉蒂, 马修·克劳德尔. 智能城市[M]. 赵磊,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34] 杰瑞·卡普兰. 人工智能时代[M]. 李盼,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 [35] 黄杰, 程毅恒. 数字化政党在西方的兴起: 特征、成因与影响[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5(1): 125-132.
- [36] 乔喆.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在内容安全治理领域的风险和对策[J]. 电信科学, 2023(10): 136-146.
- [37] 姜晓晖. 信息技术驱动下官僚科层制的发展进阶、衍生问题与优化路径[J]. 国外社会科学, 2022(4): 73-83.
- [38] 向超, 卢娟. 数字成瘾: 形成机理、风险审视与规制进路[J]. 电子政务, 2024(12): 108-120.
- [39] 穆斯塔法·苏莱曼, 迈克尔·巴斯卡尔. 浪潮将至[M]. 贾海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4.
- [40] 王天恩. 人工智能通用化及其实现途径[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3): 105-124.
- [41] 詹姆斯·G·马奇, 约翰·P·奥尔森. 重新发现制度: 政治的组织基础[M]. 张伟,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 [42] 严洁, 林胤志. 计算政治学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方法、主题与展望[J]. 世界社会科学, 2025(1): 116-144.
- [4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44] 孟天广, 严宇. 人感城市: 智慧城市治理的中国模式[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3): 104-112.
- [45] 刘芳. 深圳福田“数智员工”: 人机协同为基层减负[N]. 中国青年报, 2025-02-19.
- [46]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N]. 人民日报, 2019-05-17.
- [47] 容志. 技术赋能治理的异化风险及其防控[J]. 人民论坛, 2023(3): 60-63.
- [48] 亨利·基辛格, 埃里克·施密特, 丹尼尔·胡滕洛赫尔.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M]. 胡利平, 风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3.

- [49]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0] 唐亚林. 使命型政党:从概念到理论范式的生成过程[J]. 开放时代,2023(1):12-23.
[51] 安格鲁·帕尼比昂科. 政党:组织与权力[M]. 周建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Digital Intelligence Party Building Empowers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Value Implication, Realistic Challenge and Enhancing Paths

SUN Huiyan¹, HOU Shaoxun²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Shanghai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Ope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teration and upgrading of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s driving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modern political party, prompt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party building to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adigm lead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plus party build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party building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features such as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and virtual-real isomorphism to empower social governance, enabling to fill the gap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is changing the interaction patterns among society,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untry. However, the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lso hides the “Leviathan” risk while it is rapidly developing. The new barriers to social governance brought by the realistic dilemma wher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ranscends value rationality, the specific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logics possessed by digital platforms, the new digital divide caused by algorithmic biases and the ethical risks formed by the lagging governance and systems, to a certain extent, weaken the cohes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bility to govern grassroots society. Looking ahead,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collaborative path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deep dimension of the inter-construc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technologies, focus on the open and dynamic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system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analyze the deep-seated proposi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arty build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embedding - technology driving - technology risk -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and build an overall intelligent governance framework with the core orient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arty building empower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organization - technology - team - system”, which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organiz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d explore an integrated, diverse and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governance path, thereby providing value enlightenment for the Party’s own construction and leading of a “digital intelligence society”.

Key words: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social governance, empower

责任编辑:王 慧

引用格式:薛美琴,马超峰.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联建共建机制研究——以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360为例[J].探索,2025(3):70-81.

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联建共建机制研究

——以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360为例

薛美琴¹,马超峰²

(1.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南京210094;2.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37)

摘要:党建联盟作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创新,是巩固基层党建薄弱环节的有效方式,也是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探索。实践中的党建联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理论支撑,它是结对帮扶经验在基层党建领域中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共同体理论作出的新时代注解和中国化阐释。“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360”的创新实践,以“区域化、大党建、共享圈”为抓手,形成了“区域共融、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多元共治”的基层党建大格局,成为“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探索。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360”经历了三个阶段,制度压力、资源链接与敏捷驱动是推动党建联盟不断演进的动力,通过基层党组织之间的联建共建,党建联盟的形态依次形成了同态型党建联盟、跨界型党建联盟、涌现型党建联盟,不断演进的联盟形态也使基层党建共同体得以有序构建,成为内嵌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之中的引领力量。进一步辨析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机理,能够为经验创制提供理论基础,也能够为典型扩散提供学习蓝本。研究发现,使命认同驱动下的“基础性认同—条件性认同—系统性认同”链条以及行动演进驱动下的“制度性行动—协同性行动—敏捷性行动”链条,是影响党建联盟形态演进的驱动因素,也是推进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双重机制。党建联盟的实践探索不仅是基层党组织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平台枢纽,也是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基层党建;党建联盟;联建共建;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070-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1]560}因而创新党的基层组织形式、让基层党组织更具活力,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流动性、碎片化、悬浮化等“痛点”问题,基层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形成了众多党建创新实践,党建联盟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党建联盟是指政府部门、基层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之间开展的联建共建,它是以党的组织为主要成员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盟性组织团体^[2],是全域党建、区域党建、行业党建、毗邻党建等新兴党建模式的进一步拓展。

党建联盟不仅是基层组织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方法,也是基层党建共同体建构的新途径。但实践中的党建联盟在“联出党建新活力”的同时,也存在“联而不建、强行配对、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如何理解“创新中的实践困境”,需要深入剖析党建联盟的内在机理,探讨联建共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社会组织党建高质量发展的联建共建机制研究”(21CDJ005),项目负责人:薛美琴。

作者简介:薛美琴,女,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马超峰,男,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的经验条件,从而为党建联盟有效运行提供理论基础,为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提供经验支撑。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党建联盟作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实践,是对政党整合视角的新拓展,也是政党自身建设的新方法,更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在党建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围绕基层党组织间的联建共建这一主题,学术界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现有研究中的相关文献,一方面可以从历史视角循迹党建联盟研究的理论渊源,锚定党建联盟在基层党建研究领域中的位置,贯通实践议题与理论脉络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可以从实践维度出发,归纳凝练党建联盟的制度逻辑,寻找拓展理论的新视角。

一是党建联盟的理论渊源。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创新典范,结对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是对治理的“拟家化”想象、情感的链接与锻造^[3]以及共同富裕下的责任分担^[4]。不论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结对帮扶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基层党建实践过程中,基层党组织通过联建与共建,形成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行动网络^[5]。这样不仅可以为基层党组织发展带来活力,而且有利于建构基层党建共同体。联建共建形成的治理新通道增进了党内联系与党群联系,激活了以党组织为主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诠释了以政党为核心的社会重建路径。在此过程中,党建联盟并非传统科层组织的复刻,而是内含丰厚社会资本、情感能量、共享秩序等特征的“情理一体”的治理场域^[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党建联盟的实践探索是结对帮扶经验在基层党建领域中的创造性转化。

二是党建联盟的制度实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呈现复杂化、综合化、多样化的特征,立足“大尺度的顶层设计”与着眼“微尺度的精细治理”成为基层治理实践创新两个支点。在基层党建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区域化党建、行业型党建,还是以事件、项目等为依托的临时党组织建设,都在努力调适“党的组织建设”尺度与“党的组织工作”精度,能动性地嵌入基层社会之中^[7],实现从基层重塑政党^[8],回应新时代的治理议题。作为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枢纽,党建联盟通过组织联建、队伍联合、阵地联用、资源共享、活动共创等方式,构建起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党建共同体,实现了基层治理中的价值理性重塑^[9]、权威与利益耦合^[10]以及社会治理一体化^[11]。可以说,党建联盟不仅是单个组织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选择,也是多个组织合力实现党建引领的实践探索。

历史维度的理论溯源为党建联盟实践提供了守正创新的示范,而制度实践的经验累积为党建联盟的经验扩散提供了充足准备。现有研究在理论层面扩展了分析思路,在案例层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依然存在可拓展的空间。特别是组织制度分析往往将基层党建创新置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脉络之中,容易忽视政党视角以及基层党建工作的特殊场景。与此同时,研究者对基层党建能力提升的效果评价往往集中于单个组织分析,系统性研究则略显不足,因而在中观层面对基层党建创新实践的解释较为乏力。

从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出发对党建联盟展开分析,探析联建共建的内在机理,诊断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丰富基层党建研究理论体系。本文以“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 360”(简称“党建联盟 360”)为案例,分析党建联盟形成过程中的实践行动、演进中的联盟形态以及基层党建工作优化中的行动选择。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试图回答党建联盟在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存在哪

些类型、特征与形态,在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其内在的机制有哪些,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能够拓展基层党建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放置于共同体构建之中,从而全局性地理解基层党建工作的意义。

二、基层党建共同体:党建联盟研究的新视角

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党建引领是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和提升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12],也是将“政党之制”转化为“政党之能”^[13]的关键环节。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实现“政党之能”的行动在于实践机制创新,而保障“政党之能”的关键在于基层党建共同体的有序构建。因此,理解基层党建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是分析基层党建联盟研究的新视角。

(一)基层党建共同体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共同体”范畴在时空上的演进形态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经由“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14]。区分不同形态“共同体”的标准,是“共同体”能否代表其成员的利益以及代表的程度。因此,对人的本质的关注以及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15]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特质。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6]³³⁸。从理论逻辑来看,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共同体”的理念为原点^[17],以建设“真正的共同体”为目标。从实践逻辑来看,“真正的共同体”建设,需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众等多方力量整合起来,实现党政、党群、政社、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18],巩固“社会治理共同体”之中的“共同利益以及作为其集中体现的共同价值”^[19]。

实践中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社会动员、社会整合与社会赋能等行动策略,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自主性动力^[20],实现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融合贯通^[21]。“党建联盟”作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实践新样态,是以政府部门、基层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化基层党组织联合开展党建工作而形成的基层党建共同体。从具体特征来看,基层党建共同体强调区域化联合、制度化联结、共享性交往、党性文化认同,它是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核要素,也是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创新。

(二)党建联盟:构建基层党建共同体的新方法

一方面,重塑国家社会关系需要“把政党带进来”。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核心中介,三者密切联系。不过,随着治理范围的不断增大以及社会诉求的多元,政党与公众、政党与党员的联系趋于弱化,这既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大党独有难题”在新时代需要破解的关键命题。如何增强大党领导力和凝聚力,探索团结有序、灵活有力的组织体系成为基层实践的焦点^[22]。因此,新时代党的建设需要不断调适自身的组织功能,以此来适应环境变化、扩大与公众的联系,从而重塑“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党建联盟的实践探索,既有自上而下政治势能推动的制度压力,也有自下而上基层主动作为的内在动力。实践中的党建联盟往往是形成合力的过程,更多强调联盟内部的治理面向与合作机制。这种联结形成的制度实践有助于条块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克服以往条块分割问

题^[23],实现跨越边界的共同发展^[24],共同缔造出具有中国特色、贯通“政党—国家—社会”三者关系的实践方案。

另一方面,党建联盟是政党塑造、反映和整合社会的新平台。国家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分析框架,而“将政党带进来”不仅丰富了二者之间的关联,也能够反思和重构国家社会关系的内容^[25]。此时,传统二分视角中国家社会强弱组合分类以及国家在社会建设中的职能问题,开始转变为政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位置问题。如何选定位置并发挥政党功能是“政党—国家—社会”三重关系建构的核心。在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政党位置的有效建构在于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平台建设,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多元力量纳入平台之中,以此来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

作为基层党的组织联建和工作共建机制,党建联盟结合了政党建设的规范性和灵活性,构筑国家、社会、政党交流的有效平台,塑造以协同共治为路径的基层党建治理化格局^[26]。正是政党的这种塑造、反映和整合,将多元而分散的个体聚合成具有统一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的政社共同体^[27],从而形成党建引领的“共生型国家社会关系”^[28]。尽管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党组织间的非强制性联盟,却拥有松散联盟所具有的“使系统作为整体获得高度适应性”的能力^[29]。正因如此,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党是整合力量的枢纽,既能够调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又能生成整合多重力量的空间,而锻造枢纽与生成空间的关键在于建构有效的平台。

三、案例描述：“党建联盟 360”的发展历程与类型演化

作为首届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 360”是 2017 年 6 月南京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党工委开创的党建创新品牌。自成立以来,“党建联盟 360”的成员单位从最初的 100 余家发展到近 400 家,几乎囊括了辖区内的所有驻地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成了“区域共融、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多元共治”的基层党建体系。“党建联盟 360”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行业党建联盟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实践主体主要是社会组织,通过联建共建形成联合党支部,改变党建薄弱环节的制度性供给不足,回应了党组织全部覆盖的制度性要求;二是区域党建联盟形成阶段,随着联合党支部实践的不断成熟,党建联盟的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多部门联建共建成为行业党建联盟的升级版;三是党建联盟优化阶段,置身于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党建联盟需要不断增强自身活力,优化联盟内部运行,提高自身的引领能力。在上述三个阶段实践过程中,制度压力、资源链接、敏捷驱动是推动党建联盟形态演变的重要力量。

(一)制度压力与同态型党建联盟

“党建联盟 360”创新实践缘起于社会组织合力回应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集体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成为共识,社会组织开始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党建作为规范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既是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巩固基层党建薄弱环节的关键步骤。

第一,“多、小、散、杂”的组织特征使基层容易成为党建工作全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组织数量庞大、身份特殊、位置特别,是基层党建工作的薄弱地带。以 2023 年为例,南京市共有社会组织 12 123 个。面对众多的社会组织,如何开展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对于社会组织,都存在很大困难。正因为如此,碎片化的组织形态使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存在“泛化、虚化、随意化”等问题。

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对于党建工作的认识不足,特别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开展的早期,部分社会组织负责人只是将其理解为“形式主义,对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作用不是很大”(HY 社会组织秘书长访谈),因而主观上对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重视不够。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的组织条件不足,“党员人数、组织场地以及活动经费等约束”(GYC 社会组织负责人访谈)限制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缺失导致部分党员“找不到组织,无法参与正常的党组织生活”(GYC 社会组织负责人访谈),社会组织的党员管理、党组织建设存在较大漏洞。在此背景下,南京南站 24 家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党支部”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站”引领下成立社会组织联盟党支部,这便是“党建联盟 360”的前身。

第二,在实践探索的同时,制度化压力加速了党建联盟的成熟。在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制度压力往往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以标准化的方式对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进行重新审视,从而贯通整个治理体系;二是以目标化的方式通过政策执行压力,将社会治理中的难题进行有效化解,从而消除治理体系中的梗阻。面对基层党建工作的薄弱地带,雨花台区通过组织框架建构与项目设计,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进行有效分解:一方面,以社会组织党委成立为契机,形成“横向联系行业党委、纵向联动街道党建工作机构”的党建管理标准化格局,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有了制度化的行动框架与活动阵地;另一方面,以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改革为契机,推动“党建入章”“党建一业建双向融合”,通过示范点创建、专项行动、书记项目、红色创投等项目开展党建创新工作。

制度压力激活了社会组织党建实践,加速了同态型党建联盟的形成。联建共建形成的社会组织党建联盟是社会组织对制度压力的创新性回应。社会组织党建的初步探索以党的组织“全覆盖”为主要任务,包含两个层面的党建工作,即单个社会组织内部的党建工作以及以“联合党支部”或“综合党委”等为纽带的领域化党建工作。由于党建联盟主要聚焦于社会组织领域,属于一种单一组织形态的、任务导向的、制度化联盟,即“同态型党建联盟”。作为党建联盟初级样态,同态型党建联盟是局部化的单一组织联合形成的党建联盟形式。

(二) 资源链接与跨界型党建联盟

社会组织之间开展的联合党建为巩固基层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提供了经验,也为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何将基层社会组织创制的实践经验在治理空间上进一步扩散、在时间上持续巩固,是同态型党建联盟优化的方向。

第一,同态型党建联盟的实践经验扩散为跨界型党建联盟创造了可能。“社会组织联合党建是 1,把这一做法打造成区域化的工作亮点,就需要把 1 变成 360,即大区域、全方位、多领域的联建共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访谈),这便是“党建联盟 360”的建设初衷。在基层治理亮点打造过程中,不仅需要基层工作者发现“1”,还需要地方党政部门有效介入进行体系化打造,形成“亮点的规模效应”。为此,一方面在区委组织部的推动下制定党建联盟制度框架,将“关系互不隶属、层级高低不同”的基层各行业党组织进行有效整合,形成跨行业、跨部门的党建联盟;另一方面则依托设在街道“党政综合部、党建工作办公室、发展服务部、民生保障部”的“共创、共建、发展、服务”四个专委会,将党建联盟的工作内容嵌入已有的基层治理体系,分工负责“品牌创建、党建事务、吸纳成员、服务对接”,实现联盟任务的制度化、多元化、专业化运行。

借助制度化力量将联建共建经验进行有效推广,使得社会组织的“点上探索”成为区域化的“面上实践”,拉开了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格局,使众多主体进入党建提供的制度创新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新建联盟理事会、四大常设服务平台(政务服务平台、企业服务平台、社会组织服务平台、驻地单位服务平台),跨界型党建联盟实现了组织功能整合、部门对接、活动自治,畅通了基层党组织的横向联结机制。自此,由街道社区、驻地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联盟成员介入的跨界型党建联盟得以形成。

第二,跨界型党建联盟的建立,丰富了基层党建的实践基础。不同组织主体在介入党建联盟的同时,既扩大了党建联盟规模,也促成了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这一时期“党建联盟360”的工作主要由街道党工委统筹推进,聚焦于区域范围内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的需求面,不断尝试搭建各类公共平台、提供各类共享资源,努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动员优势转化为区域内的治理效能。

一是通过实体阵地打造与虚拟平台建设,形成党建联盟的空间资源。“党建联盟360”通过搭建“1个街道主阵地+8个社区分中心”的基层党建服务平台,为基层党组织联建共建工作提供阵地保障。在阵地打造的同时,积极拓展数字平台建设,依托党员远程教育、联合党课、手机党校、社区数字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联合党建效果,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活动宣传,营造基层党建氛围。二是在平台打造的同时,借力党建联盟发起成立慈善基金会。比如南京德雨慈善基金会便是在“党建联盟360”建议及指导下,由非公经济人士联合雨花台区工商联所属商会企业家发起,在南京市民政局登记成立为非公募基金会,形成“慈善+社会资源”的链接机制,“补充与补缺”现有组织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实现聚合增能的发展共享。

从社会组织联合党建探索到“党建联盟360”的形成,社会组织创制的同态型党建联盟为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继“单部门”推动以完成党建覆盖计划的“同态型党建联盟”出现后,“属地党委”创新实践出一种更高形态的基层党建整合发展模式,即“跨界型党建联盟”。这一阶段的联盟参与者有更强的偏好去“寻求跨边界的联盟、资源和支持”^{[30]45}。不同类型组织也从“被动建设、形式挂靠”逐步转向“主动建设、积极入盟”,党建联盟成为聚合新兴力量、链接组织发展资源、实现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三)敏捷驱动与涌现型党建联盟

如何使党建联盟从“机械式组合”向“有机式组合”转化,需要不断增强党建联盟的内在活力。为此,一方面需要在组织制度层面提高党建联盟运行的敏捷性,以回应多元主体介入后的组织复杂性;另一方面则需要在组织活动层面丰富党建联盟实践的多元性,从而激活跨界型党建联盟的内在资源。在敏捷驱动下,党建联盟具有了涌现特征,在组织层次上出现新特性。

第一,敏捷化的组织训练,使党建联盟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涌现出新的特性。动态化的组织训练是提升党建联盟敏捷性的关键,这种训练既包含常规任务驱动的敏捷性,也涉及非预期型事件引发的应急敏捷性。具体而言,由于跨界型党建联盟成员的多元性使得组织行动中的协调成本增大。为此,“党建联盟360”制定了“轮流主持—盟主提议—逆向淘汰—动态调整”的工作责任机制。“细化组织规则,强化责任意识,避免以往治理创新中‘挂牌即结束’的运转困境。”(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访谈)在此基础上,依托党建联盟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在实现党建引领、组织需求、联盟合作、个体兴趣的有效平衡中,涌现出组织行动的灵活性、资源整合的集成

性、组织间协同的一致性等特征。

与此同时面对突发应急事件,“党建联盟360”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快速响应,“在应急中训练,在行动中学习”,形成“党建联盟+应急管理”的联建共建新链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党建联盟360”以系统化的应急方案为指导,借助联盟组织架构,建立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对应急事件的研判,精准联动驻地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联盟成员,形成“应急需求菜单”,为应急所需的人、财、物资源提供清晰的通道,并储备相应的公益资源。在此过程中,党建联盟是“一次难得的体检”(党建联盟360党总支书记访谈),通过联动发现联盟中的梗阻,结合反馈完善和修正工作机制,从而激活自我调节和运转能力^[31]。

第二,敏捷化的实践驱动使党建联盟在活动内容上涌现出多元性议题。依托党建联盟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由于组织成员的多元性,实践形式与内容涌现出新的特征。具体而言,一是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借助“党建联盟360”这一阵地,街道党工委鼓励并指导社区、驻地单位、社会组织、企业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涌现红色话剧、红色骑行、红色观影等有别于往常常态化的活动形式;二是以民生公益为主题,整合联盟单位的专业人员,组建相对固定的志愿服务队,通过点单式服务,发现以往基层党建中的薄弱环节,涌现商圈党建、工地流动党员红色驿站、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等众多新兴党建品牌;三是地方文化为主题,对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进行挖掘,以“仪式再现”“围炉茶话”“义卖义演”等小型互动仪式链^[32]将其进行活化,并将其融入主题党日活动之中。

涌现型党建联盟以事件为载体,在动态中实现了基层党建共同体的有效构建。无论是常态事件,还是应急事件,党建联盟的功能都得到了强化,党建联盟的组织敏捷性得到了训练,资源空间向多维性和密集性转变,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的反应都变得更加灵敏。

四、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实践机理

党建联盟作为基层党组织之间的联建共建平台,是基层党组织建设高质发展的重要实践,也是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关键。因而,解析党建联盟实践的类型差异与内在机制,发现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政党逻辑,能够进一步理解实践的运行逻辑、边界条件与经验界限,为实践优化提供科学诊断,为经验创制提供理论基础,为典型扩散提供学习蓝本。

(一)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形态差异

首先,党建联盟的形态差异与条块结构密切相关。实践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既受到条块关系的影响,也有助于缓解“条块”矛盾等制约基层治理的体制性弊病^[33]。在党建联盟的实践过程中,对于同态型党建联盟而言,主要是某一领域内组织的聚合,一般依靠条线部门推进统筹,意在解决领域内的党员管理、资源约束、薄弱环节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条件匮乏问题。正如“党建联盟360”的前身,它是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同态型党建联盟不同,跨界型党建联盟以及涌现型党建联盟往往依靠属地党委统筹推进,目的在于依托联建共建机制来优化解决区域内的动员、协同与整合难题,所不同的是涌现型党建联盟更加强调动态性与敏捷性。

党建联盟的实践形态受到条块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也成为优化条块关系的抓手。就此而言,党建联盟具有重塑基层治理体系的功能。其中,同态型党建联盟的协调往往以“条线为主轴,块块为区域”,突出行业、部门、领域特性;而跨界型党建联盟与涌现型党建联盟的协调则以

“块块为中心,条条参与”,强调属地常态任务、中心工作与应急响应。不同之处在于跨界型党建联盟主要以制度性统合为主,而涌现型党建联盟则以事件性统合为主。

其次,党建联盟的形态差异与阶段性任务目标相关。从同态型、跨界型到涌现型,党建联盟的任务目标发生变化,逐步从“党的组织全覆盖”推进到“党的工作全方位”,联盟形态演进与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相向而行,“政党之制”也顺势转化为“政党之能”。其中对于同态型党建联盟而言,其初始动力来源于制度性压力,目的在于完成“党的组织覆盖”,巩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薄弱地带,联盟整体实践内容呈现以党务为中心的标准化建设;对于跨界型党建联盟而言,其任务目标在于对已有联盟的“强基扩能”,在属地党委领导下,通过对党建联盟扩容,拓宽联盟资源基础,提高联盟的引领能力,为党的工作覆盖链接更多资源;对于涌现型党建联盟而言,其目标任务在于以敏捷性驱动党建联盟的内在活力,强化联盟组织韧性,提高党建联盟在应急维度的能力,为“党的工作全方位”实践提供组织保障,实现从“1到360”的转变。

最后,党建联盟的形态差异与实践效果。对于上述三种党建联盟形态而言,同态型党建联盟由于是同质组织的聚合,成员单位的资源多样性并没有因联盟而拓宽,资源较少且竞争比较激烈,但其优势在于一致的组织认同、稳定的合作结构以及可控的摩擦成本;跨界型党建联盟由于跨区域和跨组织间的合作,具有综合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特征^[34],党建联盟的关系网络与资源得到拓展,但内在的协调成本开始变大;相比于跨界型党建联盟,涌现型党建联盟在敏捷驱动下,资源在得到有效动员的同时,组织的内在灵活性开始增强。

(二)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实践机制

比较党建联盟的形态异同可以发现影响基层党建共同体的外显特征,而进一步解析党建联盟的实践机制能够理清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隐含条件。实践中的基层党建共同体如何才能建设成“真正的共同体”,需要从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两个维度进行探究^[19]。对于共同利益而言,本文尝试从行动演进展开讨论;对于共同价值而言,本文尝试从使命认同展开分析(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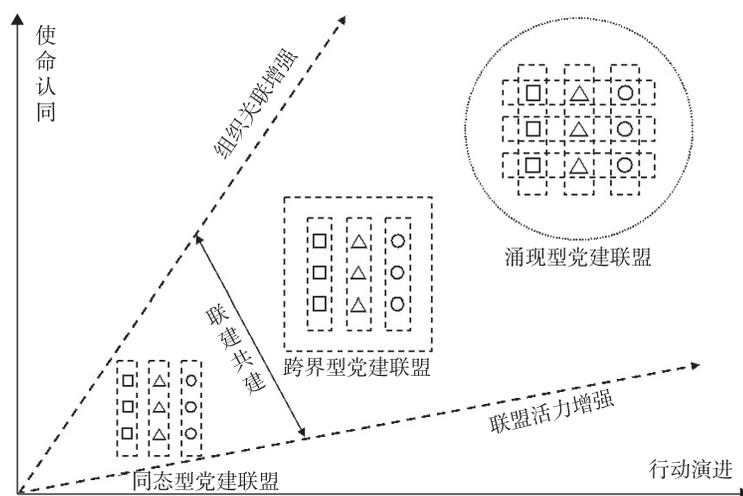


图1 基层党建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

1. 使命认同: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认同机制

作为新型政党理论范式的核心概念,使命型政党内生于“党性人”与“政党主体理性”的理

论假设,承载着“使命—责任体制”的新型政治形态建构^[35],是当代中国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使命认同作为使命型政党内涵的重要维度是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关键动因。以“党建联盟 360”为例,使命认同在“基础性认同—条件性认同—系统性认同”的累进迭代中不断强化,构成了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认同机制链条。

首先,党建联盟强化了“基础性认同”,将价值因素融入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之中。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党建引领是基层实践开展的基础共识,也是党建联盟开展实践的底线。“党建联盟 360”实践的起点,是对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全覆盖”的创造性回应,虽然是“硬性指标”的任务化应对,但在组织制度建设过程中,党建作为价值要素融入联盟的实践之中,嵌入性赋能为基层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价值引领^[36]。

其次,党建联盟激发了“条件性认同”,将情境因素纳入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之中。“条件性认同”是“基础性认同”的具像化,实践中的“党建联盟 360”既需要明确“党建是什么”,也需要懂得“党建能做什么”。结合南京南站区域特点,“党建联盟 360”根据自身资源优势,理解“能”的条件性,适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将情境因素纳入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之中。情境因素的纳入是对“条件性认同”的有效把握,也将价值因素带回到实践场景之中。

最后,党建联盟激活了“系统性认同”,将公共因素汇入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之中。“系统性认同”是“条件性认同”的强化,它不仅要回答“党建能做什么”,而且要关注“党建能做好什么”。从“能”到“好”是“系统性认同”的关键,也是党建联盟树立全局观的体现。此时,党建联盟不再局限于联盟内部的结构优化,而是要注意联盟与外部环境的共治与共享。在“系统性认同”指引下,“党建联盟 360”通过敏捷精准的功能补位,在获得丰富发展资源的同时,关注全局意义上的治理秩序,实现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公共性生产。

2. 行动演进: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行动机制

行动既维持着党建联盟的结构,又改变着党建联盟的形态。“以行动践行价值”构建基层党建共同体,是基层党建工作实践创新的落脚点;“在行动中理解机制”是分析基层党建共同体的关键。结合“党建联盟 360”的具体实践,剖析“制度性行动—协同性行动—敏捷性行动”演进,从而理解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中的行动机制链条。

首先,党建联盟的制度性行动强化了基层党建共同体的规范基础。制度性行动是党建联盟生成的起点,也是从“无”到“有”的孵化过程。面对基层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自上而下的制度性供给是激发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关键。制度性行动虽然只是“对标对表”的回应性行动,却是基层治理动力的重要来源。它不仅为基层树立了新的“目标责任”,也为基层输入了规范性资源。不过,以制度性行动为基础的联建共建,往往倾向于形成同态型党建联盟,虽然只是一种探索,却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党建联盟 360”的制度性行动既是基层党建治理创新的起点,也是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规范基础。

其次,党建联盟的协同性行动提升了基层党建共同体的资源禀赋。与制度性行动相比,协同性行动更加突出党建联盟的能动性,是基层党建共同体实现从“联”到“建”的关键性转换。“党建联盟 360”以党建为枢纽,是嵌入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治理新单元。为此,联建共建的展开,需要协调左右、贯通上下、巩固前后,以党领共治聚合治理主体,提升党建联盟行动能力。可以说,多元主体的协同使基层党建共同体内在的结构得到升级,资源禀赋也得到拓展。

最后,党建联盟的敏捷性行动提高了基层党建共同体的内在韧性。与协同性行动相比,敏捷性行动强调党建联盟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灵活性,是基层党建共同体实现由“建”向“活”的训练环节。“党建联盟 360”通过在常态工作中积极补位、在应急事件中敏捷行动将党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需求进行有效对接,提高联建共建的敏捷性。在此过程中,党建联盟“因敏捷”而获得更多参与机会,提升了党建联盟的内在活力。无论是党建联盟内部,还是外部关系,敏捷性行动提高了党建联盟的积极参与,为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提供了韧性基础。

在“使命认同”与“行动演化”的共同推动下,党建联盟实现了发展资源、组织关联与内在活力的有效提升,成为驱动党建联盟不断演进的双重机制。对于同态型党建联盟而言,使命认同聚焦于制度性的基础认同,联建共建聚焦于党的组织建设,基层党建共同体整体处于初级样态。对于跨界型党建联盟而言,使命认同和行动演进逐渐在“党的组织建设”中融入“党的工作建设”,党建与业建的有机融合促使联盟拓展更多资源,基层党建共同体实现了结构性升级,联盟整体从单向竞争走向多元合作。对于涌现型党建联盟而言,使命认同和行动演进在敏捷驱动之下联建共建更具活力,基层党建共同体的内在秩序由“共建”向“共享”迈进。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创新,党建联盟是聚合区域力量、整合行业功能的平台枢纽,也是贯通基层治理全链条、巩固基层党建薄弱环节的重要抓手。实践中的党建联盟不仅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的工作方法,也为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实践方案。本文以“南京南站区域党建联盟 360”为观察案例,重点关注党建联盟实践类型演变与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之间的关联,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以联建共建为行动的党建联盟既是基层党建实践中的工作方式,也是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抓手,区别于以往“行动—机制”的讨论,基于共同体视角将党建联盟实践放置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拓宽了党建联盟研究的理论视野,丰富了基层党建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其二,党建联盟在制度压力、资源链接、敏捷驱动之下,逐步经历了同态型党建联盟、跨界型党建联盟、涌现型党建联盟,它们是党建联盟在不同阶段的具体形式,也是联建共建在不同场景下的有效选择;其三,从“使命认同”与“行动演进”两个维度发现“基础性—条件性—系统性”的认同链条与“制度性—协同性—敏捷性”的行动链条是影响党建联盟形态演变与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内在机制。上述结论的发现是基于“党建联盟 360”的案例观察,虽然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条件,但是其内涵的特征与机制具有启发性。

具体而言,一是碎片化的社会结构要实现“再组织化”的团结,党建是核心力量。党建联盟作为基层社会新的共同体,需要因地制宜开展联盟工作,把握边界、掌握条件、避免泛化,切实发挥党建联盟的治理实效,以问题导向回应现实需求,规避形式主义。二是党建与业建有机融合,需要合理规划党建联盟的活动内容。党建联盟的实践创新如何走深走实,关键在于党建引领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联盟在于解决问题,而非形式上的挂牌。

综上,党建联盟是基层实践的工作方法,也是基层党建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探索。作为工作方法,党建联盟诠释了党在基层的初心使命,将政党重新带回基层治理场域,创造性地运用联建共建方式,巩固了基层党建的薄弱环节。作为实践探索,党建联盟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并从“关系维度”延伸到“共同体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党建引领”的内涵。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2] 吴新叶,吕培进. 在“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之间:基层党建联盟的活力空间[J]. 学术界, 2021(7):83-94.
- [3] 徐明强. 基层政府治理中的“结对制”:个体化联结与情感化互动[J]. 探索, 2021(5):137-150.
- [4] 梁琴. 由点到网:共同富裕视域下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变迁[J]. 公共行政评论, 2022(2):133-153.
- [5] 薛美琴,马超峰. 关系网络再造:社会组织联合党建的行动逻辑——以江苏省党建联盟的实践为例[J]. 探索, 2020(6):134-143.
- [6] 方雷,弓豪.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的机理与路径[J]. 江淮论坛, 2023(2):97-102.
- [7] 陈家喜,黄卫平. 把组织嵌入社会:对深圳市南山区社区党建的考察[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6):84-89.
- [8] 李威利. 从基层重塑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形态的发展[J]. 社会主义研究, 2019(5):127-134.
- [9] 孙梦婷,王茜. 基层共治何以形成? 党建引领与社会组织价值理性重塑[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2(4):133-143.
- [10] 吴高辉,郝金彬. 耦合调适:乡村振兴中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理[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9):97-107.
- [11] 任克强,卢义桦. 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的现实功能、创新探索与实现路径:以南京都市圈为例[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72-81.
- [12] 黄晓春. 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6):116-135.
- [13] 王韶兴. 现代化国家与强大政党建设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3):26-45.
- [14] 刘同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7):4-21.
- [15] 王贤卿,董扣艳. 习近平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7):27-34.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
- [17] 张贤明,张力伟.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逻辑、价值目标与实践路径[J]. 理论月刊, 2021(1):61-68.
- [18] 吴青熹.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4(3):15-22.
- [19] 陈新夏. “真正的共同体”的基础及其当代启示[J]. 教学与研究, 2020(8):5-12.
- [20] 朱婉菁. 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探源与逻辑建构[J]. 理论与改革, 2025(1):126-141.
- [21] 刘琼莲. 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推进重点与创新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6):72-81.
- [22] 袁方成,陈锦好. 大党独有难题的基层命题及其破解[J]. 学习与实践, 2025(2):23-33.
- [23] 黄晓春,周黎安. “结对竞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机制[J]. 社会, 2019(5):1-38.
- [24] 咸鸣霞,周义程. 市场合作、民间协调与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模式创新:基于联村党建实践案例的类型学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90-98.
- [25] 景跃进. 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J]. 探索与争鸣, 2019(8):85-100.
- [26] 刘蕊,方雷. 党建治理化: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有效融合[J]. 探索, 2024(3):66-76.
- [27] 张跃然. 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 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J]. 社会学研究, 2018(3):216-241.
- [28] 宋道雷. 共生型国家社会关系: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视角研究[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3):196-202.
- [29] 李中仁,郑平. “松散关联型发展联盟”与管委会型国家级新区府际协作困境研究——以湖南湘江新区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23(11):54-62.
- [30] 安德鲁·阿伯特. 过程社会学[M]. 周忆粟,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31] 何艳玲,王铮. 统合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及其对网络治理的再定义[J]. 管理世界, 2022(5):115-131.

- [32] 潘博,王立峰. 小型互动仪式链: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情感表达——基于对“跟党走”类主题活动的考察[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55-60.
- [33] 赵聚军,王智睿. 社会整合与“条块”整合: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双重逻辑[J]. 政治学研究,2020(4):95-105.
- [34] 杜志雄,赵黎,崔红志. 跨村联建、村企共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与发展的实践探索[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1):95-103.
- [35] 唐亚林. 使命型政党:从概念到理论范式的生成过程[J]. 开放时代,2023(1):12-23.
- [36] 李传兵,喻琳. 嵌入性赋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与路径[J]. 中州学刊,2024(2):47-54.

Research on Joint Construc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A Case Study of the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360 in Nanjing South Railway Station Area

XUE Meiqin¹, MA Chaofeng²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2.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as a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the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solidate the weak links and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The practice of the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origin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It is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paired assistance an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ory.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360 in Nanjing South Railway Station Area” forms a new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patter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n, resource sharing and multi-governance”, and becomes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In the specific practice process,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360”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stitutional pressure, resource linkage and agile driven are the driving forces for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which makes the alliance form has successively evolved into homomorphic, transboundary and emergent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The evolving alliance form has enabled the orderly establishment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becoming a leading force embedded in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Further analysis of that practical mechanism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perience creation and a learning blueprint for typical diffus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hain of “basic, conditional and systemic identity” driven by missio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hain of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ve and agile action” driven by action evolution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volving form and the dual mechanisms for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is not only a platform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but also beneficial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community.

Key words: primary-level Party building, Party building alliance, joint construction, community

责任编辑:王 慧

引用格式:吴春宝.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演变脉络与优化路径[J].探索,2025(3):82-95.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演变脉络与优化路径

吴春宝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涵盖了乡村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等内容。顺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趋势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对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深远影响。从历史实践来看,城乡关系调整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内涵意蕴与形态表征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逐步由二元分割过渡到融合发展,经历了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以及城乡融合发展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基层社会治理形态也呈现出从“多元分化”到“有限整合”再到“一体融合”的转型轨迹。就内在逻辑而言,立足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实践条件,通过要素流动、空间融合和技术赋能三者的共同作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夯实、格局优化与效能提升,进而促进基层社会稳定且充满活力,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基于此,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应从城乡基层党建融合、城乡治理单元统筹、城乡治理体制机制衔接以及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系统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演变脉络;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082-14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这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勾勒了秩序图景、指明了发展方向。然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城乡发展形态结构性转换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势必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众所周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基层社会治理依然面临着治理资源不均、治理能力不足、体制机制不畅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切实抓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程,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规划引领和美乡村建设的作用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24BZZ092),项目负责人:吴春宝。

作者简介:吴春宝,男,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2]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各项现代化要素不断向基层社会渗透,各项治理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基层社会面临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模式多样化、治理问题棘手化等新情况。基于此,结合城乡关系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问题,从理论层面对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治理予以政策阐释和学理发掘,明确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与发展要求,为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点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奠定基础。

(一)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表述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表现之一,城乡融合发展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典型时代特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基于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党和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政策也不断调整适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将其作为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内容,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鲜明的政策导向。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实现“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治理的新目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都属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阐明城乡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基层治理的政策安排,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把县城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重申“以县城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价值;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协同推进机制”^[3],将城乡融合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系统阐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有效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新型工业化”纳入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格局,并提出要“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持续丰富基层社会治理内涵。

基层社会治理是城市社会、乡村社会之间各种要素、主体、机制相互交织的前沿领域,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表达。随着党和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入,城乡融合发展日益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并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了发展的社会环境基础。

(二) 研究回顾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按社区类型划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可划分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推动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消灭“三大差别”,其中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因此,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城乡治理模式的分野^[4],学界的理论研究中也按照城乡差别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了细分。

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学界更多关注资源要素的层级配置^[5]。在治理模式上,韧性治理^[6]、精准化治理^[7]、社会治理共同体^[8]、总体性治理^[9]等结构性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

意,其中的技术因素始终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一方面,部分学者肯定了数字技术在多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已成为社会发展潮流,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同样也需要数字技术赋能。技术治理将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复杂信息简化,提高了治理效率。同时,技术治理还推动了公众参与,形成了良好的治理互动关系^[10]。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要避免过度追求技术理性,还应关注群众诉求^[11]。

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学界主要从结构性问题入手,认为造成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原因在于体制不顺与机制不全、城乡二元发展产生的结构性矛盾、资源流动不畅导致产业发展困难、打破传统社会的同时现代化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等^[12]。此外,乡村基层社会在基础设施、资源投入、资源规划、人才队伍、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存在短板^[13]。在空间要素上,学者发现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部分地方忽视城乡空间关系,盲目地将村庄进行合并,打破了村庄秩序,并破坏了村庄的文化功能、治理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14]。还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和提高治理能力^[15],但也面临着资金缺口大、人才支撑弱、科技创新少、体系不健全等现实挑战^[16]。

学界关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界聚焦党的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二者之间的机制联系,着重发挥党建的显著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服务优势。有学者指出,党组织具有统领全局、链接上下、弥合左右、瞻前思后的整合功能^[17]。在理论创新层面,学界提出了嵌入式党建^[18]、融和式党建^[19]、党建统合^[20]等概念。另一方面,学界探索了城乡融合发展下“三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联动治理机制,提出要运用系统思维推动“三生”空间治理^[21],基于空间治理探索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22]。还有学者提出,发挥人才、宗族、数字政府和网格化管理的作用^[23],促进政府责任、社会自治与市场机制三方协同等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24],提高基层社会善治能力。

总体来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资源要素的研究成果颇丰,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上下层级的流动,多从党建融合的角度探索城乡治理资源的横向流动机制。学界对城乡治理空间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关注的是城市或乡村单一社会的空间治理。此外,城乡基础条件不同导致技术在城乡社会的应用程度各异。如何构建城乡融合的技术平台、发挥技术互联互通对基层治理的带动作用,成为学界有待解决的问题。可见,从分治到共治是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特点,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而从整体上把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引入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基于此,本文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切入点,尝试在梳理城乡关系变动与基层社会治理演变脉络的基础上,立足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并提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二、城乡关系变动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演变历程

从历史的纵深考察基层社会治理与城乡关系变动的关系,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关系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渐过渡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实现了从政策调整到制度创新再到路径建设的转型。在城乡关系变动的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样态也经历了从多元分化到有限整合再到一体融合的发展演进,治理主体日趋多元化、治理内容凸显服务化和治理体制愈加灵活化。

(一)“多元分化”:统筹城乡发展阶段的基层社会治理

随着乡村改革日渐深化,我国逐渐具备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条件,而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思路。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国家相继提出了统筹城乡、“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形态转型。

一是确立城乡社区发展目标。一方面,城市基层管理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街居制因职能超载、职权有限以及角色尴尬等问题^[25],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为此,国家提出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逐渐从城市基层管理与服务的配角转变为主角,成为城市基层管理的单元。我国城市基层管理和整合的基本体制也向社区制转型。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建设逐渐展开。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开启了农村社区建设新篇章;2007年,民政部印发《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更是将农村社区建设推向高潮。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社区建设,通过系列部署推动农村社区的整体发展,促进国家对乡村治理方式从资源汲取向资源输入转变^[26]。同时,城乡社区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将村(居)民自治作为社区建设的有效手段,发动民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基层民主活力。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民生福利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性困境,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不小挑战。鉴于此,基层社会治理改革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重点任务,保障公民平等享有社会权益。这一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显著标志,进入城乡统筹、全民覆盖、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其中,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明确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并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逐步发展成为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支柱。具体而言,社会保障制度逐渐由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措施转变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27]。与此同时,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由企业职工拓展到城乡居民,体现了国家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全民社会保障的决心。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多元分化”的特征。随着单位制解体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基层社会逐渐脱离单位制,社会多元分化态势愈加显著。在此背景下不同群体的多元化要求推动了政府转变职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且作用日益凸显。然而,由于政府职能与改革进程存在不同步的情况,使得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大政府、弱社会”的情况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28]。此外,虽在程序上启动了基层民主,但在实际操作中民主的核心原则和目标未得到充分彰显,基层自治总体上仍处于“能人治理”阶段^[29],普通民众的公共事务参与度较低,公共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不够高。另外,这一阶段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仍较为显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面临内容、尺度与标准的不统一^[30],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仍存在明显差异和二元化表达^[31],难以实现城乡基层治理联动。

(二)“有限整合”:城乡发展一体化阶段的基层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出现新调整。其中,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与统筹城乡发展相比,城乡发展一体化更为注重城乡要素流动的优化协调,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

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与政策导向,初步构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机制,拓展了基层治理的内涵与实践,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实现了从分立到整合的跨越式发展。

一是“管理”向“治理”的变革转向。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区治理”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城乡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置于国家治理全局进行统筹谋划;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重要论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任务,不断激活基层治理的社会活力。由此,城乡发展一体化阶段的基层治理体系在理念与实践上有了新拓展,实现了由管理向治理的重要转向,治理话语替代过去的管理话语,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建设的新要求。相较于管理,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并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体现了基层治理方式的优化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二是城乡公共服务制度并轨统一。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完善有助于保障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一时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完善主要包括: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一体化建设,促进城乡之间制度设计的匹配衔接,重点打破城乡地域分割,消除行政区划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消极影响,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另外,还包括引导公共资源和政策扶持向乡村、贫困地区以及相关弱势群体倾斜,着力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的问题。由此,城乡公共服务制度逐步完成并轨且取得良好成效,如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及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并轨等。

总体来看,城乡发展一体化阶段的基层社会治理总体上呈现出“有限整合”的特征。一方面,“整合”主要体现为通过城乡社会事业并轨统一来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向乡村延伸,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建设推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优化。在此过程中逐渐打破基层治理的城乡二元体制,城乡治理联动趋势渐趋明朗。另外,多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思路日渐清晰,实现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向政府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转变。另一方面,“有限”则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一体化阶段的基层治理仍面临基层组织碎片化、基层事务纷繁复杂与基层治理负担过重等问题,而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成为突破上述困境的可行路径^[32]。此外,一些地方盲目地将城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照搬到乡村,没有充分考虑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从而造成治理手段与治理需求的错配。

(三)“一体融合”: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基层社会治理

基于新形势,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并以城乡融合理念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城乡关系的政策导向有了根本性调整,意味着城乡关系向融合发展全面迈进。城乡融合发展体现了对城乡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为新型城乡关系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一是以县域为治理枢纽推进城乡共治。县作为“现代城市的尾”和“传统乡村的头”,是工商城市和农业乡村结合的关键“接点”^[33],在推进城乡共治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城乡二元分治转向一体共治的枢纽。在县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多要素、多维度的系统性过程^[34],需促进多元治理要素、治理主体以及治理资源的协调整合,推动不同治理单元的互动协

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持续增强基层治理结构的弹性和活力。此外,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也成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走向“智理”。城乡共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式,蕴含着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基层社会治理不再是短期行为,而是适应社会变化和满足民众需求的长期过程。

二是推动城乡治理经验互通互鉴。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更加注重城乡基层治理的经验互鉴、协同互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表明“三治融合”范畴已逐渐从乡村延伸至城市,已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推广,成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35]。另外,各地开展“百居联百村”城乡基层治理活动,村庄与社区相互分享基层治理运行理念与地方实践,促进自治、共治水平提升,推动城乡基层治理融合发展。在此过程中也应意识到“融合”绝非等于城乡治理的同质化。为此,创新城乡基层治理不应将城市治理经验生硬地移植到乡村,完全照搬城市治理路径来推进乡村治理,而应在尊重城市与乡村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城市和乡村两种治理形态从“对立分离”向“互补共生”转化^[36]。

简而言之,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体系建设不断健全完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治理认识的不断深化与精准把握。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基层社会治理更是具有“一体融合”的特征,即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联动互促的治理逻辑、强调包容性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的治理模式,实施差异化而又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积极塑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基层治理新形态。与此同时,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从理念走向实践,基层减负工作也持续推进。这些举措充分释放基层治理活力,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三、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城乡关系的演进推动着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通过要素流动、空间融合和技术赋能等多个维度可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夯实、格局优化与效能提升,进而有效回应治理现代化的诉求,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如图1所示)。

(一)要素流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的变迁。伴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运行机制与动力驱动等也出现了新变化,在此过程中重塑了基层社会治理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基础也得以夯实。

一是从“资本导向”到“人本导向”的价值理念转变。现代社会高度工业化容易使人异化,成为“单向度的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大量资本的投入,使得社会利益趋于同质化。在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政府秉持“唯GDP增长论”,形成以提升绩效为目标的经营性治理局面^[37],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并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城乡融合发展强调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诸多举措均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为目标,与基

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相契合。无论是城市治理还是乡村治理均坚持“人本导向”,治理政策和实践始终围绕理解和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展开。城乡人口要素的双向流动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治理方案,及时捕捉群众需求的动态变化并实现精准对接,回归“人本导向”以实现治理有效。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建设,为农民工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供给,逐步消解农民工市民化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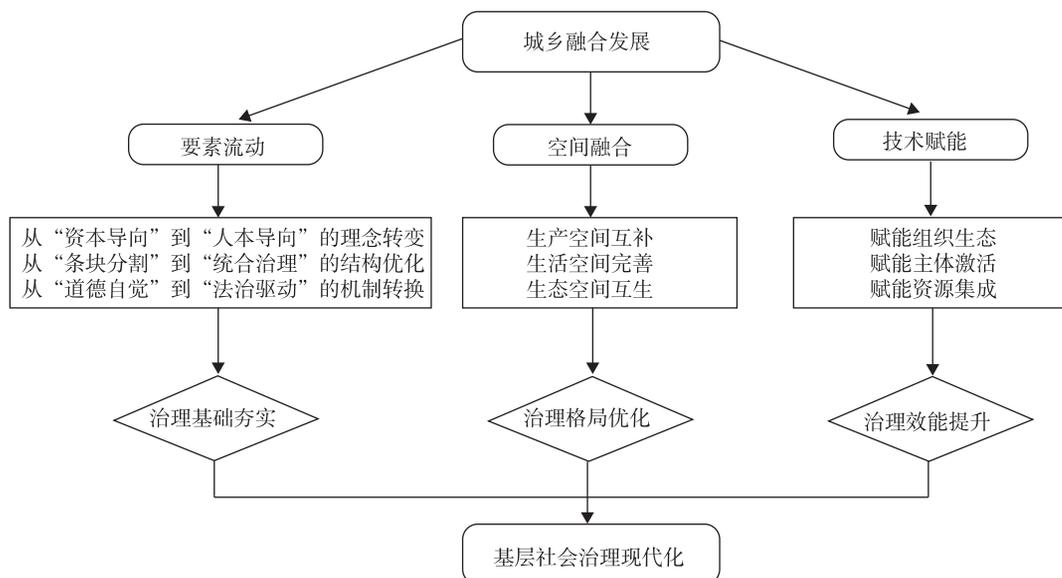


图1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二是从“条块分割”到“统合治理”的运行结构优化。我国政府间关系模式以条块关系为基础^[38]³¹³。“条块分割”则指在行政管理中纵向的“条条”管理体系与横向的“块块”管理体系之间由于权力分割、职权划分不清以及协调不畅等问题,造成部门间各自为政、推诿扯皮以及政策执行的脱节。随着城乡要素流动性的显著增强,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更具复合性,“条块分割”的治理模式往往“治标不治本”,极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困境。在此情境下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转变运行逻辑,由“单兵作战、条块分割”向“多元融合、协同治理”转变^[39],实现“条”与“块”的相互配合。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要健全“社区发令、部门执行”机制,为基层治理领域的条块协同提供路径指引^[40]。如为解决基层治理领域条块分割、城乡联动不畅等难题,山东省以市域为单位建立健全“乡呼县应、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实现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联动。其通过重塑镇街组织架构、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建立事项“呼叫”与考核评价机制等方式,推动覆盖城乡、部门联动、层级互动的基层治理格局建设。

三是从“道德自觉”到“法治驱动”的动力机制转换。“现代化意味着人类社会新秩序的产生。”^[41]城乡关系的变化带来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主要依赖乡规民约、宗法礼俗、道德伦理等维持社会秩序^[42]。但随着社会变迁和城乡要素流动的加快,新的社会力量、价值观念逐渐削弱传统道德权威,更因“道德”自身缺乏强有力的监督约束而导致传统社会自我调节机制难以维持,造成基层社会治理失灵。因此,基层社会治理需要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持续激活和发挥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其中,土地制度改革以市场

化手段盘活乡村集体资源资产,使土地从“沉睡资产”变为“流动资本”,而法治思维贯彻土地制度改革过程始终,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生动实践,提升了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如浙江省德清县通过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基层政府则依法制定交易规则、调解权属纠纷,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法治化升级。

(二) 空间融合: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空间有效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因素。融合发展新阶段的城乡空间界限趋于模糊,城乡空间功能逐渐向产业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保护等多层次的综合功能延伸,愈发注重城乡地域“三生空间”的整体性协调^[43]。空间有效治理成为满足城乡居民不同空间需求、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优化的重要方式。

一是城乡生产空间互补互促。城乡空间融合,生产空间协同是基础。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城乡工农业发展脱节,工业在城市集聚,农业则在乡村分散经营,城乡生产空间缺乏有效联动,加剧了城乡发展“落差”。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不断被打破,乡村资源更好地与城市生产力对接,形成了城乡生产空间互补互促的循环系统,并通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化等方式重塑城乡生产空间发展格局,满足了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优化的现实需求。在此过程中推动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一些地方依托乡村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和农产品深加工,打造集农业生产、加工、研发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促进了乡村生产机制从原料型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此外,一些地方利用现代技术发展智慧农业,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手段优化生产过程,减少了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

二是城乡生活空间温馨便捷。生活空间是承载民众日常生活行为的场所,也是人们产生需求的单元。随着城乡融合不断深入,城乡“两栖”现象增多,城乡居民生活方式渐趋相同^[44],居民对城乡之间生活水平均等化的要求愈发强烈。均等化要求尤其体现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方面,这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以县域为重点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节点,是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良性循环的核心抓手。国家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注重发挥县域枢纽功能,将教育、医疗资源向县域集中,并通过“医共体”“教共体”等形式实现公共服务下沉。另一方面,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合理布局。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出发点,统筹考虑大区域与小单元,合理布局区域内基础设施,构建高品质城乡生活圈。

三是城乡生态空间共生共荣。城市生态与乡村生态具有共生属性,二者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形成有机整体。但由于特定时期实行“城市优先”的发展策略,加之城市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外溢”效应,导致一些地方乡村生态环境恶化。随着城乡关系迈入融合发展阶段,需要着力恢复和加强城乡间的生态联系,探索建立城乡生态共治联动新机制。一方面,统筹推进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基于城乡环境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45],统筹协调城乡环境治理理念、环境基础设施与环境治理资源,实现乡村环境治理向城乡环境共治体系转向^[46],也促进基层治理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从“短期治理”向“长效机制”转变。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生态空间共生共荣中的重要调节作用。通过跨区域生态补偿、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等手段缓解区域生态压力和增强城乡生态连通性。

(三) 技术赋能: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随着数字中国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数字技术的治理属性不断凸显,对基层治理的赋能作用不断增强,已成为变革基层治理体制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力量^[47]。数字技术的通用性和渗透性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契合,并在基层治理领域得到深度应用,推动基层治理从“经验决策”转向“数据驱动”,治理主体从“主体性缺场”转向“主体性在场”^[48],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一是技术赋能组织生态,促进科层制组织运行灵活有效。传统科层组织由于信息流动不畅、沟通成本高与决策过程繁琐等问题,使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分散型”特征。而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组织结构向着扁平化、网格化与虚拟化的方向发展,重塑了科层组织运行机制,提升了科层组织数字化治理能力,也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变迁。一方面,技术赋能科层组织变革信息运作模式。数字技术在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上具有显著优势,推进数据在跨城乡、跨部门之间的存储访问,减少因“信息藩篱”“信息失真”而造成的决策迟缓与资源错配,促进科层组织精准决策、精准施策。另一方面,技术赋能完善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在“城乡一盘棋”理念的基础上持续发挥数字技术对科层组织的“赋责”功能,有助于推进城乡一体联动监督。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将政策执行的过程、行为和效果进行数据化与智能化处理,提高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可控性,同时促进全过程监督与问责机制的健全完善。

二是技术赋能主体激活,重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强化基层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场性特征也是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受到参与成本、治理透明度、渠道通畅度等因素影响。而通过鼓励民众利用数字平台广泛参与在线议事、在线监督等活动,有助于解决传统基层群众自治中“人难找”与“事难办”的难题^[49],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落地生根,实现基层自治提质增效。《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指出,“进一步丰富村民自治手段,推进村民在线议事、在线监督”,可以通过“云治理”手段激活参与主体,破解基层治理主体性缺失难题。如湖南省衡阳市推出“屋场恳谈会”,创新了“三治融合”应用场景,外出务工村民可通过线上投票参与村务决策,解决了“人户分离”所导致的治理主体缺失难题,强化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支撑。

三是技术赋能资源集成,推动公共服务供需精准匹配。数字赋能实现了政府治理工具的革新和治理效率的提升。数字技术突破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城乡地域限制,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的优质共享。一方面,技术赋能有助于城乡政务数据互联互通。城乡“政务云平台”能够以整体性思维推进城市与乡村在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数据共享与信息对接,打破传统属地管理模式,促进城乡公共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真正实现“数惠城乡”。如浙江探索打造“乡村大脑”工程,在省域范围内推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城乡、跨主体的开放共享,破除了城乡间的数据壁垒,营造了公共服务供给“城乡联动、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技术赋能有助于建立健全双向反馈机制。利用数字技术打通政府与民众间的双向反馈渠道,推进自上而下决策与自下而上反馈相衔接,精准高效定位民众需求与社会热点,有效促进公共服务供需的精准匹配。

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城乡关系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更为宏大的思维视野和战略定位。从分治到共治的演进是城乡关系转变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在城乡关系走向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值得关注。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方式。结合上文论述,从党建融合、治理统筹、体系衔接、数字转型等方面拓展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优化路径。

(一)以城乡基层党建融合巩固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

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要素有效转化为治理要素,需要牢牢抓住基层党建这个“牛鼻子”。通过创新党组织建设重构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的互动耦合,从而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城乡党建融合联动城市和乡村,需要发挥党组织在宣传贯彻党的政策主张、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等方面的积极效用。在城乡关系转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区域统筹治理理念为基础整合城乡不同领域的党组织资源,如统筹设置基层党组织和统一管理党员队伍。跨地域、跨部门、跨行业的“党建共同体”能够更好地适应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也能更好地提升治理效能和民生幸福感。另外,可以通过发挥城乡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党组织与共驻单位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以“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管”为基本路径打破行政隶属壁垒,在党组织层面实现治理主体整合、机制协同、职能融合与资源联动。总之,充分发挥党建融合的“磁场效应”,实现党组织在纵向层级与横向地域间的协调联动,为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搭建治理平台、提供治理资源。党建融合能够构筑起“城乡统筹、资源共享、共驻共建、互利共促”的党建工作新格局,破解基层党建“悬浮化”困境,促进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融合发展。

(二)以城乡治理单元统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取代政府的单一管理,促进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在基层社会得到有效落实,实现基层治理成果由群众共享。在这一过程中,重建基层社会治理单元对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域综合服务能力。”^[50]相应地,需要在县域范围内实现基层治理单元上移和下移的有机统筹。一方面,在基层治理单元调整过程中需要着重发挥县域的统筹功能。县域作为工与农、城与乡的“接点”,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搭建以县域为单位的城乡共治平台进一步发挥县域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战略功能,从而有效解决城乡治理结构失衡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因地制宜将基层治理单元下沉至自然村、村民小组以及小区等微观单元。自然村、村民小组和小区是与基层群众直接接触的单元^[51],便于了解和解决具体微观单元中的实际问题。构建政府治理与居民参与的治理共同体有助于政府制定和实施更符合基层实际需求的政策,促进基层治理精准高效。在基层治理单元下沉过程中,也能够推动资源分配更为公平合理。

(三)以城乡体制机制衔接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优化

构建城乡协调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是畅通城乡各类要素双向流动的关键。城乡体制机制的有效衔接能够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破解基层社会治

理机制碎片化难题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优化提供制度保障。一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改善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渠道和条件,加快乡村人口市民化进程。比如,健全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弱化户籍的身份属性与福利属性,增强户籍制度的权益属性。另外,加大乡村地区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鼓励城乡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二是要优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合作制改革与农村土地经营权市场化改革等方式,增强农民的产权意识和经营主体意识,为乡村治理提供有效制度供给、政策动力与经济基础。三是要赋予城乡社区同等的法律地位。从法律层面消解城乡社区分治模式,赋予城乡社区同等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保障城乡社区地位的一致性。另外,应给予乡村社区更多的财政支持,形成与城市社区同等的财政投入机制^[52]、城乡社区一体的发展机制,为城乡融合发展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奠定物质基础。四是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城乡基层自治的权责和程序、强化城乡资源共享与数字化建设,共同推动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融合完善,实现城乡稳定繁荣。

(四)以城乡数字治理转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流程变革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推动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深度融合能够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注入“数字基因”。一方面,要提升基层治理主体数字素养。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也是治理主体能力拓展的过程。通过交流学习、案例分享等为治理主体提供更多灵感来源,鼓励治理主体积极创新数字化治理路径,激发其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动性。另外,针对不同层次的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素养培训活动,如开展简单易懂的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基础薄弱居民对数字化治理的适应力;而对于有一定数字应用基础的居民,向其讲解如何利用前沿技术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民主生活等,培养其参与数字化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形成数字治理合力。通过统筹联动人力、信息与设施等资源推动主体间的数据共享,实现资源互通和工作协同;通过政府跨部门间数据信息的互通,破解跨部门协作难题;通过吸收市场、社会组织、社区民众的意见建议,加快形成协同开放、智能高效的数字治理生态体系。同时,统筹推进城乡5G、光纤宽带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要保障乡村边远地区的网络覆盖率,缩小城乡信息化发展差距,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五、结语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包含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两个维度。随着城乡关系步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治理共同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城乡基层治理融合互促的发展态势愈加显著。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逐渐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层级式转向扁平式,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数字化水平也得到明显提升。同时,治理共同体强调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融合,但不是城乡治理的同质化。无论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还是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均遵循独特的治理模式与运行逻辑,应在尊重自身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城乡治理协同联动。一是纵深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互动,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生态资源与城市市场资源的有效对接,实现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二是构建并完善城乡基层治理协同联动机制,从主体要素、组

织架构、机制体系以及平台资源等方面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提升城乡数据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水平,汇聚起城乡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三是健全和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破解基层党组织软化、弱化、边缘化的治理难题,增强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提升城乡基层治理质效。总之,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应始终立足基层社会实际,以基层实践问题为导向理性选择治理工具,推动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有序转型,构建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
- [2] 习近平谈社区治理:提高社区效能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EB/OL]. (2020-07-24). [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1/2020/0724/c1024-31796701.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724/c1024-31796701.html).
- [3]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7-08.
- [4] 张文显.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J]. 法商研究,2020(2):3-17.
- [5] 刘小钧. 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内涵、动因和路径[J]. 江汉论坛,2022(7):139-144.
- [6] 唐皇凤,王豪. 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J]. 探索与争鸣,2019(12):53-62.
- [7] 王阳. 从“精细化管理”到“精准化治理”——以上海市社会治理改革方案为例[J]. 新视野,2016(1):54-60.
- [8] 王力平.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J]. 甘肃社会科学,2023(2):53-61.
- [9] 吴侗. 新总体性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转向[J]. 江汉论坛,2024(5):44-52.
- [10] 陈晓运. 技术治理: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向[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6):123-127.
- [11] 林志聪,王枫云. 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及其消解路径研究[J]. 学术探索,2019(1):34-40.
- [12] 李红娟,董彦彬. 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21(3):146-159.
- [13] 李敬煊,陈瑞婷.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探析[J]. 兰州学刊,2020(7):137-148.
- [14] 郭占锋,李琳,吴丽娟. 村落空间重构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对村庄合并的成效、问题和原因的社会学阐释[J]. 学习与实践,2017(1):85-95.
- [15] 王丹,刘祖云. 乡村“技术赋能”:内涵、动力及其边界[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38-148.
- [16] 王胜,余娜,付锐. 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J]. 改革,2021(4):45-59.
- [17] 王洪树,任田婧格. 问题与消融: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探索[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4):82-90.
- [18] 罗光华. 从嵌入到嵌合: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J]. 改革与开放,2023(1):24-33.
- [19] 谢琦,李亮. 党建引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运作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结构—过程—功能”的整体性分析[J]. 探索,2023(3):27-38.
- [20] 郑永君,吴春来. 基层党建统合与乡村治理创新——都江堰市“党引民治”实践案例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72-82.
- [21] 陈小卉,胡剑双. 江苏省乡村空间治理实践:阶段、路径与模式[J]. 城市规划学刊,2024(1):38-45.
- [22] 戈大专,陆玉麒,孙攀.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J]. 地理学报,2022(4):777-794.

- [23] 周巍.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探索[J]. 广西社会科学, 2020(10):66-70.
- [24] 周俊, 郁建兴. 社会治理的体制框架与创新路径[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9):70-77.
- [25] 何海兵.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J]. 管理世界, 2003(6):52-62.
- [26] 蒋远胜, 刘艳.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源流、历史变迁和发展路径[J].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 2024(2):68-82.
- [27] 费太安, 江洁.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脉络、面临形势与改革建议[J]. 中国财政, 2024(17):42-44.
- [28] 范逢春.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治理创新:一个伟大进程[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3):66-73.
- [29] 刘行玉. 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解读——基于农村基层治理的视角[J]. 社会主义研究, 2010(3):77-81.
- [30] 常明杰. 城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何以可能? ——基于“共同体框架”的分析[J]. 青海社会科学, 2023(6):91-97.
- [31] 罗志刚. 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回顾与前瞻——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J]. 江汉论坛, 2023(8):79-84.
- [32] 王红云. 个体化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治理困境与突破路径[J]. 农业经济, 2022(9):59-60.
- [33] 李海金, 戴丹.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21-31.
- [34] 李海金, 刘珊. 融合型治理:县域城镇化何以助推基层治理有效[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84-96.
- [35] 徐勇, 姜晓萍, 肖滨, 等.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何以持续(笔谈)[J]. 探索与争鸣, 2025(1):91-107.
- [36] 刘威, 徐明琨. “城乡”作为一个治理单元:城乡共治的理论争辩与中国实践[J]. 学习与探索, 2022(11):49-59.
- [37] 范逢春.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J]. 行政论坛, 2021(5):87-95.
- [38] 林尚立. 国内政府间关系[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39] 涂志明, 杜志章, 何良海, 等. 块数据驱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深圳市 N 区治理实践为例[J]. 社会治理, 2022(12):79-88.
- [40] 锁利铭, 阚艳秋. 城市治理中条块网络化重塑的底层逻辑、识别机理与典型实践[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1):65-76.
- [41] 徐勇.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秩序:邓小平贡献[J]. 邓小平研究, 2024(6):1-10.
- [42] 袁莉.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及实施路径[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11):113-121.
- [43] 倪维秋, 夏源, 赵宁宁. 乡村地域“三生空间”功能演化与耦合协调度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9):111-119.
- [44] 朱郁郁, 卢弘旻. 面向城乡融合的空间“跨界”治理模式研究:以成都、杭州为例[J]. 空间与社会评论, 2023(2):113-130.
- [45] 吕晓梦.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长效管理机制——以 A 市城乡环卫一体化机制的运行为例[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3):18-30.
- [46] 徐彬.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农村生态环境“两端三维”治理模式解析[J]. 社会治理, 2024(5):109-120.
- [47] 何得桂, 武雪雁. 赋能型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有效实现方式——以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6):134-144.
- [48] 牛磊, 原璐璐, 丁忠民, 等. 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何以重塑——基于参与式治理视角的双案例分析[J]. 电子政务, 2024(4):42-55.
- [49] 何阳, 汤志伟. 迈向技术型自治:数字乡村中依托农民主体性建设推进村民自治空间转向[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7):133-140.
- [50]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N]. 人民日报, 2020-12-30.

[51] 王敬尧, 袁安琪. 基层治理单元的历史流变与现实锚定[J]. 江汉论坛, 2023(12): 45-52.

[52] 李增元.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 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2): 164-170.

The Evolutionary Context and Optimized Pathways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U Chunbao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Groups in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s imperative for innovating governance models, perfecting governance systems, and enhancing governance efficacy, encompassing both rural and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indispensable for achiev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s breaking the institutional binar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line with contemporary trends will profoundly shape this process. Historically,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progressing through three phases: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urban-rural fusion development—has precipitated correspo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from “pluralistic fragmentation” to “limited integration” and ultimately toward “unified fusion”. Analytically, the intrinsic logic reveals that under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urban-rural fusion development, the synergistic interplay of factor mobility, spatial convergence, and digital governance leverage collectively reinforces governance foundations, optimizes structural frameworks, and boost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is, in turn, fosters stable yet dynamic grassroots societies and advances governance system sophistication. Consequently, a systematic approach should integrate urban-rural Party building, harmonize governance units, alig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accele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opel Chinese-style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within the urban-rural fusion paradigm.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evolutionary context, optimized pathways

责任编辑: 赵 超

引用格式:张邦辉,李一博.赋能与使能: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J].探索,2025(3):96-114.

赋能与使能: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

张邦辉¹,李一博²

(1.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2.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数字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领域渗透,为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与跃迁升级提供全面支持。随着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应用程度的加深,其赋能与使能效应日益凸显,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赋能意指数字技术通过提供工具或资源以增强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决策与行动能力;使能则强调数字技术通过整合治理资源激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内在潜能以进行协同创新。赋能与使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赋能为使能提供了技术基础与手段,使生态环境治理各参与主体能够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而使能则进一步放大了赋能效果,使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出更大价值。通过对赋能、使能内涵的辨析以及二者间逻辑关系的探析,可以进一步厘清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制。但当前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与应用程度不足、信息数据流通不畅与共享不充分、管理模式与体制机制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基于此,在数字技术应用的初级阶段,需运用动态监测与预先防范、智能分析与科学决策、流程优化与高效治理、互联互通与协同参与等方式以促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在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化阶段,需通过理念转变、体系完善、圈层创新以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创新发展,助力破解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掣肘,进而为我国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引。

关键词:赋能;使能;数字技术;生态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096-19

我国的数字技术正迈入全面繁荣的新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2022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转型,建立一体化生态环境智能感知体系,打造生态环境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指出要推动生态环境智慧治理,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2024CDJSKPT18),项目负责人:张邦辉。

作者简介:张邦辉,男,博士,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一博,女,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1]。在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依托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既是契合新形势下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与赋能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重点大多聚焦于数字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数字政府与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在数字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对生态环境治理转型的有效赋能,认为数字技术通过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优化制度供给、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式促进生态环境治理转型^[2]。也有研究关注数字技术与生态环境治理之间的协同性机制建设^[3],认为应通过建设创新驱动、融合共生、互利耦合、优化治理等多种机制,以实现数字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之间的协同发展^[4]。在数字政府与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互联网+政务服务”,主张政府系统利用数字化手段来开展生态环境治理事务,以解决各级政府部门面临的数字技术差异和信息鸿沟问题^[5]。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解决传统信息化建设模式面临的业务部门多头管理、信息资源联通不畅、数据信息共享程度低等问题,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向着业务协同、数据信息共享的数字化模式转变^[6]。

综合而言,学者们对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应用方面,主要围绕其意义、价值、机制等维度展开了深入剖析。但已有研究对于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机理与作用方式进行的探索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赋能与使能为切入点,通过系统梳理二者的理论内涵与逻辑关系,厘清数字技术对生态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分析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明晰数字技术对生态环境治理的作用方式:通过初期阶段的数字赋能与使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并在深化应用阶段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创新发展,由此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升级。

一、赋能与使能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

在数字化发展的时代浪潮中,赋能与使能作为两个具有丰富意涵的概念,高频出现于诸多领域。二者虽在理论表述上存有差异,但在实际应用中相互交织、互为补充,成为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关键要素。深入剖析赋能与使能内涵,梳理其逻辑关系,既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运用这两个概念,亦能为相关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推动相关领域的创新与发展。在生态环境治理这一复杂系统中,赋能与使能为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提供了新的实践平台与理论视角,使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愈发凸显。

(一) 赋能与使能的内涵辨析

“赋能”一词发轫于20世纪晚期西方心理学、组织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授权赋能理论。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诸多行业与领域开展数字赋能,这也促使赋能概念成为当下的研究热词。作为一种舶来理论,受译介等因素影响,赋能理论在学界研究中存在多种解读视角。其一,从权力角度出发,将其解读为赋权、授权、增权等,主要聚焦于赋能进程中权力的重新分配、重新平衡以及整体效能的优化提升^[7]。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语境下,这意味着打破传统生态环境治理中部分主体权力过度集中的局面,通过制度设计将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决策

权、监督权等合理分配给多元主体,实现权力结构的优化,从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其二,从能力角度出发,将其解读为赋能、扩能、增能等^[8],其核心在于实现赋能对象的能力发展,即推动其能力从初始的缺失状态逐步构建并不断优化升级。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主要表现为针对不同主体进行能力建设。例如,为环保社会组织提供生态监测技术培训、项目管理能力培训等,提升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专业能力;对公众开展生态环保知识普及教育,增强其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其三,从权力与能力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解读,这也是当前理解赋能理论的一个重要趋向。这一综合性理解框架强调,需将“权力赋予”与“能力培育”这两个层面进行有机融合。具体而言,赋能过程既需要关注赋能主体对赋能对象的权力赋予机制,即通过制度性安排或结构性调整赋予其更多自主决策空间,如允许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规划的制定;同时也要重视赋能对象实际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包括知识技能、资源获取及实践操作等多维度的能力建设。这种整合性视角避免了单一维度的片面性,强调在权力重构与能力发展的动态平衡中实现赋能目标,从而为理解赋能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本质内涵提供更具理论深度的分析框架。在此分析框架下,赋能作为一种交互协同机制,其本质在于构建赋能者与赋能对象之间的双向授权关系。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赋能者通过为赋能对象创设支持性的实践环境和提供必要的工具性资源,如生态监测设备、数据分析软件等,以激发并推动后者能力的发展。这种能力发展体现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继而扩大价值创造空间^[7]。

使能指的是使能者通过自身具备的资源禀赋增强被使能者的自身实力,通过技术赋能、资源嫁接与经验共享等方式,将关键能力分享给被使能者,进而激发被使能者的主体能动性,发挥和创造新价值^[9],丰富被使能者的价值空间,为自身用户提供更优良的产品或更好的服务。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使能者利用自身在生态技术、数据分析等方面的优势,为被使能者提供技术支持和资源对接。在使能体系中,使能者虽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但被使能者与用户之间的链接关系并不由使能者掌控,被使能者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完善以自身为主的微生态系统。与赋能理论相比,使能理论更强调“去中心化”原则,关注生态体系中不同的网络节点,有效完善了被使能者各自的微生态系统,与动态和复杂的环境体系高度匹配^[10]。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去中心化”的特点有助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每个主体都能在自身微生态系统中发挥优势,共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二)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赋能与使能及其逻辑关系

根据不同的语境和使用场景,赋能与使能呈现出不同的逻辑关系。在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应用场景中,受生态问题的复杂性、治理目标的紧迫性以及技术应用的阶段性等因素的影响,赋能与使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协同作用,这种交互关系也体现了技术从工具性应用到系统性变革的深刻转变,这一过程不仅是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更是治理理念和实践方式的升级,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赋能与使能的交互关系及其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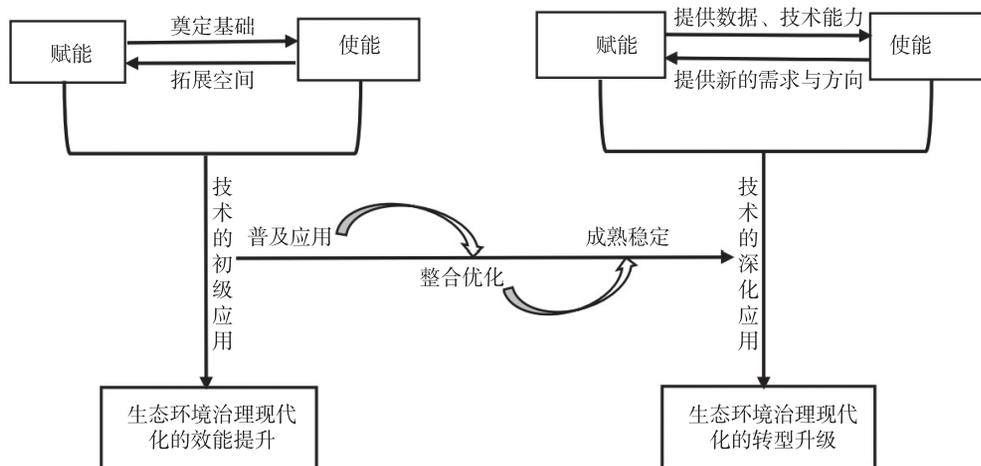


图1 赋能与使能的交互关系及其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其一,赋能与使能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一方面,赋能为使能奠定基础。技术赋能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高效工具,使生态环境治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变。例如,大数据技术实现生态环境数据的实时监测与分析,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后续治理模式和机制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分析能力。没有赋能阶段提供的数据支撑和技术能力,使能阶段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多部门协同治理以及运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生态资产数字化管理就缺乏基础,难以有效开展。另一方面,使能为赋能拓展空间。技术使能通过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为赋能技术的应用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优化的环境。数字化平台的构建有助于打破传统治理壁垒,实现多部门、多区域的生态环境数据共享与协同治理,使得赋能阶段所获取的生态环境数据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通和应用,进一步提升数据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

其二,赋能与使能协同转型,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升级。一方面,赋能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实现初步转变。技术赋能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使生态环境治理从依赖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性和时效性,也为后续更深入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变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使能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实现深度变革。技术使能阶段,数字化平台的构建促使生态环境治理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从单一领域向系统性治理转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意味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and 公众等各方能够通过数字化平台共享信息、协同行动,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而系统性治理则要求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综合考虑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全面、综合的治理。赋能阶段积累的数据和技术能力为使能阶段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同和系统性治理提供了可能,而使能阶段的创新机制和模式又为赋能阶段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技术应用提供了新的需求和方向。二者相互促进、协同作用,共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从初级阶段的数据驱动向深化阶段的多元主体协同和系统性治理转变,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升级。

在具体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的赋能方式在于将生态环境数据转化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通过技术工具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精准性、时效性与协同性;数字技术的使能方式则通过技术重构治理逻辑,将生态环境治理从“执行任务”升级为“设计系统”、从“应对问题”

转向“创造价值”。也正是借由此种赋能与使能方式,数字技术在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主体激活数字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促使治理主体不仅认识到数字资源的价值,更学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创新发展。但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与创新发展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深度融合的渐进式演变,其演变进程大致经历了普及应用、整合优化、成熟稳定三个阶段^[11]。在这一过程中,赋能与使能的交互作用不断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向现代化转型升级。在普及应用阶段,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得到初步应用,主要发挥赋能作用。治理主体逐渐认识到数字技术的价值,开始引入一些基本的技术工具和数据采集设备以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不过此时的数字技术应用还较为分散,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尚未充分实现。进入整合优化阶段,赋能与使能的交互作用逐渐显现。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开始对数字技术进行整合和优化,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生态环境数据共享和协同工作。同时,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开始以系统思维重新审视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推动治理逻辑的重构和系统设计。在这一阶段,数字技术的使能作用开始凸显,治理主体更加注重创造价值。在成熟稳定阶段,赋能与使能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支撑,治理主体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精准治理、系统设计和价值创造,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由此实现现代化转型,治理效率和效果得到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二、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制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 21 世纪获得飞速发展,引领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数字化一方面重构了社会治理空间,改变了治理资源的聚合方式;另一方面促使治理思维发生变革,大数据开始驱使人们挖掘隐藏于数据背后的信息^[12]。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这一变革尤为显著,从传统的信息化、无纸化、集成化办公到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化办公,引领管理部门向数字治理、智慧治理迈进,驱动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向现代化转型升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视角来看,数字政府建设是社会技术形态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演变的必然趋势,是一场涉及结构模式、治理空间、圈层壁垒的深刻变革。

(一) 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与转换

数字时代拓宽了人们对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认知边界与创新能力,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各种技术革新、应用拓展和模式创新等将围绕数字资源的有效运用展开,也进一步带动生态环境治理相关主体与时俱进地追随数字发展步伐,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与重构。

其一,实现政务管理的创新与转换。数字技术的融入与赋能,为生态环境治理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有效规避了传统管理方式的弊端,更加注重在生态环境治理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利用一定规模的数据,通过多方参与、信息技术、良性互动的方式取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构建较为完整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长效机制^[13]。

其二,实现政务服务的变革与重构。数字技术能够构建一个包含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生态环境治理服务平台,既有助于实现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内政务服务数据的有效衔接与整合,同时也推动了政务服务流程的优化升级^[4]。例如,涉及环境事务的网上行政审批和生态环境状况监测预警等新型系统的应用,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与政务服务的深度结合。这种融合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服务的效率,还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期望与需求。

其三,实现政务沟通的革新与重塑。在全媒体浪潮的推动下,信息传播媒介的创新推动着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政府部门利用社交媒体、政务APP、在线服务平台等多元化渠道与公众建立起更加直接、高效、便捷的沟通桥梁,实现了生态环境信息的即时传递与反馈,既增强了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决策的透明度与科学性,也提升了公众参与度,促进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共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向着现代化转型升级。

(二) 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空间实现虚拟与现实的接续与融合

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催生了数字孪生技术,其能够将物理世界的人、物、事件等要素映射至虚拟的数字空间,构建出高度仿真的数字镜像,通过收集与分析虚拟镜像中的仿真数据,为物理世界的实体运行提供有力支持^[14]。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这一技术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近年来,通过深入洞察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共性特征与痛点问题,多地政府敏锐捕捉到数字孪生技术的价值,正积极推动其在生态环境治理场景中的落地应用,构建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之间的“虚实联通”桥梁^[15]。这一过程通过精准映射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虚拟—现实”双向互构,推进生态环境要素在虚实空间的紧密对接与动态映射,有效实现了数字孪生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赋能^[16]。

其一,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带来了革命性变革,它构建起一个全面映射、高度可视的系统化治理架构,为精准高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借助仿真工具、物联网、虚拟现实等前沿数字技术,数字孪生打破了传统生态环境治理中数据采集与整合的壁垒,能够全面覆盖和整合不同领域的生态环境数据采集与传输渠道。通过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数据汇聚渠道,数字孪生体与现实社会之间建立了持续的互动关系,相互影响并不断改进。在这一过程中,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的各个环节在虚拟空间中得到了高度真实的再现。这种高度仿真的呈现方式确保数字孪生体能够实时且全面地监测生态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其动态发展,显著增强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视化与清晰度。

其二,数字孪生促进生态环境治理逻辑向着“虚实交互”的融合治理方向转变。在传统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虚拟层面的规划、模拟与现实层面的实际治理行动往往存在脱节现象,导致治理决策与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偏差,治理效能难以最大化。而数字孪生所倡导的“虚实交互”融合治理逻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虚拟空间构建数字孪生体模拟治理方案与预测效果,现实世界的传感器实时反馈数据供虚拟空间中动态调整模拟方案。虚拟治理与现实治理周期同频、信息即时交互,使决策者能够及时掌握生态环境治理效果、调整治理方案,增强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其三,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系统智能与干预智能的深度融合,促进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数字化与智能化。系统智能指顶层设计的智能化,其有别于以往单纯的手段智能化。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全景映射”的构建使智能服务以数字孪生的生态环境治理系统为虚拟实践平台,完成由手段到目标的转变过程,实现系统层面的智能化。这一转变有助于打破生态环境治理中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协同治理。干预智能的实现主要依托“孪生数据”。在数字孪生的生态环境治理系统中,这些数据涵盖了生态系统的多种要素,如森林植被、湿地、河流湖泊等物理实体及其在虚拟空间中的映射以及各类生态功能性服务与业务性服务,还有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规则等信息。对这些数据进行转换、处理和融合,能获取

更全面、更丰富的生态信息^[17]。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层面,干预智能通过构建数字孪生基座和“虚实交互”技术,实现对现实生态环境的实时干预。系统智能与干预智能的结合与应用为生态环境治理构建了一个贯穿全过程的智能体系,从而可以有效降低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率。

(三) 促进生态环境治理圈层实现内部与外部的破壁与合作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构建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推动生态环境的智能治理,同时加快建设高效智能的生态环境信息化体系。这表明生态环境治理的数字化改革势在必行,而改革的核心在于以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并深刻改造生态环境治理流程的每个环节,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流程的优化与再造。

其一,实现纵向治理圈层内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的统筹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在生态环境数据信息技术领域的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信息分享能力得以提升,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的统筹管理方式也得以优化。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的应用既助力生态环境监管部门构建起统一、高效的生态环境数据管理平台,实现了对各类生态环境数据的集中存储、管理和分析,也促进了政府生态环境数据价值的广泛共享。这种数据流动和共享激发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生态环境数据统筹监管与协作的活力,通过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协同作战,从而有效提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

其二,实现横向治理圈层中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的壁垒破解。各地政府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相继建立生态环境数据信息化体系和数据披露平台,对各类生态环境数据进行全面采集、整合和管理,形成统一的数据标准和管理规范,将经过处理的生态环境数据向其他地方政府和相关治理主体开放,提升了生态环境数据的有效流通,遏制了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保护主义倾向,这一举措促进了生态环境数据的互联互通与高效利用,进一步激发了地方政府间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效能。

其三,实现斜向治理圈层中生态环境“数据孤岛”的资源整合。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着复杂且多维的挑战,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往往并不局限于单一行政区域或单一层级政府部门的管理范畴。而传统层级约束下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使得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信息流通不畅,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治理合力。数字时代衍生而出的斜向治理圈层,作为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一种创新模式,旨在规避传统层级约束的局限性,在不同级别、互不隶属的政府部门间建立起更为复杂和多元的生态环境治理互动网络,能够为各级政府 and 部门之间提供更为便捷的生态环境信息交流渠道,同时整合不同级别和地域的政府生态环境数据资源,进而加强政府与部门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紧密协作,实现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与治理水平的提升。

三、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掣肘

数字技术以其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高效的资源整合优势以及精准的分析预测功能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升级开辟了新路径。然而,实践中辩证审视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具体应用时会发现其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一)生态环境治理中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与应用程度有待加强

作为新时代的“智慧引擎”,数字技术不仅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海量的数据支撑与智能分析手段,还极大地提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前瞻性,使得生态环境治理更加精准、高效、科学。但在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实际应用程度还无法满足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升级的高标准技术要求。

其一,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随着实践的深入,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渐次显露,既制约了我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入洞察与精准施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态环境治理向更高层级的现代化转型。一是受限于数字技术的创新不足。“中国是数字技术领域的专利研发大国而不是强国。”^[18]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数字技术是推动生态监测、资源管理、污染防治等环节高效开展的重要工具,但部分技术创新不足,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的深入推进。二是受限于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支持动力不足。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绿色技术创新亟需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支持,但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主体的专业认知程度深浅不一,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生态环境数据的处理能力;此外,政策层面的协调与衔接不够紧密,也制约了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有效支撑。三是受限于技术创新人才的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涉及环境监测、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修复等诸多领域,这些领域都需要大量具备深厚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当前我国在数字科技人才方面虽拥有庞大的基数,但也存在高层次科技人才不足的短板。无论是立足全国范围,还是具体到环保企业、科研院校内部,高层次人才的总体规模与战略储备都显不足,难以支撑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在新技术研发、新模式探索等方面的快速发展需求。

其二,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有待加深。当前数字技术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深度与广度尚显不足。一是受限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部门的数据获取能力不足。生态环境治理相关部门对数字技术的灵活与充分应用还稍显欠缺,部分生态环境数据的获取方式还停留于间接测算,导致获取的生态环境数据存在失真、偏差的情况,进而影响生态环境的整体治理进程。二是受限于相关部门在生态环境数据信息化应用中的引导力不足。引导力的发挥主要通过构建风险预警机制来提前防范或预知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危机,进而为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我国水环境治理实践为例,构建一个精准的水环境质量预警系统,对于及时发现和监测水环境中的污染风险因素至关重要。该系统不仅能帮助各级政府在规划水污染防治与水生态修复工程时做出科学决策,还能为其制定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相关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19]。然而,当前我国在水环境质量预警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流域水环境承载力预警技术方法体系尚未构建完成,在系统性、综合性的流域水环境承载力预警研究方面存在明显缺失^[20];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水系分布复杂,不同地区的水环境问题各具特点,监测难度较大,且各地水环境数据大多存储在地方服务器上,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增加了在全国范围内对水环境质量进行实时、有效监测的难度。

(二)生态环境治理中信息数据流通不畅与共享壁垒有待解决

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开发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加之多源异构的“数据孤岛”问题仍然存在,使得生态环境数据的采集、适配、重构、共享面临一定的障碍^[21]。这些问题既限制了生态环境信

息数据的有效整合与利用,也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决策科学性与时效性的提升。

其一,生态环境信息数据流通不够顺畅。当前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客观影响,生态信息数据的流通不畅、管理不善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受限于信息数据传输渠道瓶颈。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数据传输依赖于网络基础设施的支撑,但在部分地区或场景下网络基础设施存在不完善的状况,导致现实层面的生态环境数据传输受到影响。此外,在传输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生态环境数据的安全性与隐私保护问题,防止生态环境数据泄露或被篡改等风险的发生,这些都影响着生态环境数据信息传输的顺畅与否。另一方面,受限于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平台支撑体系的尚未健全^[22]。我国目前在生态环境监测、评估、管理以及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建设等基础性任务上,尚未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工作。这也导致生态环境数据难以在相关领域和部门之间有效流通,进而制约了对生态环境数据附带的隐形价值资源的深入挖掘与充分利用。

其二,生态环境数据共享困难较多。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数据共享对于优化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执行层面,生态环境数据共享面临着一定困境,限制了不同部门、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流通,导致生态环境数据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一方面,受限于技术和标准缺乏统一性。生态环境治理相关部门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往往缺乏全局性的规划与科学论证,导致不同业务系统采用不同的技术与标准,形成相互隔绝的生态环境信息壁垒。加之不同生态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难以整合统一,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数据共享的困难。另一方面,受限于观念层面的共享意识滞后。部分人员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数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推动生态环境数据共享的意识和动力,固守传统思维和工作方式。此外,生态环境治理相关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也导致生态环境信息资源开发管理缺乏统一规划,部门之间出于利益考量,不愿将生态环境数据资源与其他部门共享,使得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难以实现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合作,无法形成生态环境治理合力,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果。

(三)生态环境治理中数据管理模式与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当前的生态环境数据管理模式存在碎片化、“孤岛化”现象,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机制不健全,导致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的价值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进而影响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升级。

其一,生态环境数据管理模式适配性不足。已有的管理模式囿于固有的思维观念,与数字时代的适配性不足,给生态环境治理造成诸多阻碍。一方面,受限于生态环境管理理念不够先进。部分生态环境治理组织对生态环境数据的重视程度不够,将生态环境数据视为简单的信息记录工具,忽视了其作为核心资产和战略资源的价值属性。这种理念上的缺失导致生态环境数据管理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创新性,无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数据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受限于生态环境治理组织架构不够完善。在生态环境数据管理实践中,组织架构的不足成为制约生态环境数据价值有效实现的瓶颈。在建立生态环境数据库时缺乏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对海量生态环境数据进行统筹协调,导致生态环境数据分散于各个业务部门,难以形成生态环境治理合力;相关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清、沟通协作不畅,使得生态环境数据需求与供给之间产生脱节;在面对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生态环境治理相关部门往往各自为政,数据共享意愿不强,甚至存在数据隐瞒和垄断现象。这不仅浪费了大量

的生态环境数据资源,也使得生态环境治理决策缺乏科学依据,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其二,生态环境数据信息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往往超前于现有的制度规范,导致现行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法规难以有效应对数字技术的发展需求。在生态环境数据治理领域,由于缺乏完善的配套制度来确保生态环境数据的安全共享,导致共享的积极性不足,特别是在处理敏感数据时,现有的监管体系显现出了与生态环境治理转型升级发展需求之间的不适应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受限于生态环境治理体制运行中的诸多掣肘。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纵向的垂直管理部门与横向的管理部门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协作机制,但仍然存在隐形的“各自为政”情况^[23]。生态环境数据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的协作,当不同部门共同参与某一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时,常常会出现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相互推诿等问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数据管理效能的提升。另一方面,受限于跨区域生态环境数据管理能力不足。当前,在生态环境信息数据的监管领域,各地行政管理部门往往局限于各自行政区划内的生态环境数据监管工作,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生态环境数据信息共享与交流不够充分,这种数据隔阂限制了生态环境数据管理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四、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中的赋能与使能

在技术的初步应用阶段,数字技术对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的赋能与使能价值逐渐凸显,其影响力贯穿环境监测、治理决策、流程优化以及机制变革等核心领域。在这一时期,数字技术通过数据驱动的精准洞察、技术融合的协同发力以及系统协同的高效运作,驱动生态环境治理从“经验依赖”阶段逐步迈向“精准科学”的精细化治理阶段,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提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 动态监测,预先防范

“生态环境监测作为支撑、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业务领域,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础。”^[24]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发挥赋能作用,更通过深度融合与优化应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使能作用。《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政府监管应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新,探索多样化的线上监管方式,并加强对监管数据的汇集、共享和动态分析,以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体系,积极推动智慧监管的开发与应用。这为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动态监测与预先防范应用提供了政策支撑。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生态环境治理监测的信息化建设不断发展,其在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智能化、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方面的作用愈发显著。

一是助力生态环境治理智能监测系统构建与数据整合共享。数字技术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了智能监测系统、数据中心平台以及环境质量发布系统等智慧治理手段,通过各类传感器有效联接现实生活,从中收集有价值的生态环境数据信息。在赋能层面,数字技术赋予传感器生态环境数据采集能力,能够精确测量各种生态环境参数,并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为后续的生态环境数据处理和分析奠定基础。同时,依托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对收集到的生态环境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智能分析、高效整合和交流共享,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在使能层面,数字技术打破了生态环境治理中不同监测设备和系统之间的壁垒,实现了生态环境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协同共享。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

范,使得不同来源的生态环境数据能够对接,实现了数据的协同高效处理。最终通过终端的智能感知系统,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实时动态监测,为生态环境治理部门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持,确保对环境变化的及时响应。

二是助力多维度生态环境治理指标监测与风险预警。基于大数据和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数字技术进一步应用于生态环境治理监测,通过自动化手段对空气的温度和湿度、温室气体的浓度以及地表水的含量和土壤状况等多个生态环境指标进行全方位监测。在赋能层面,数字技术提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监测设备的自动化和精准化水平,使得监测过程无需人工频繁干预,提高了监测的效率和连续性。通过自动化监测,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 and 治理全过程监管数据的采集与汇总,并将这些数据及时通报给相关职能部门,使其能够全面、准确、实时地掌握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在使能层面,系统利用数字技术中的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算法,对收集到的多维度生态环境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处理。通过对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的对比分析,建立多种生态环境治理风险预警模型。与传统的风险预警方式相比,数字技术使能的生态环境风险预警系统能够综合考虑更多因素与变量,如不同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季节变化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等,提高了风险预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种基于数字技术使能的多维度生态环境治理指标监测与风险预警体系推动了生态环境治理从事后监管逐步转向事前防范,增强了生态环境风险的预见性,提高了管理效率。

(二) 智能分析,科学决策

作为对传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革新与升级,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借助技术的赋能与使能作用,通过大数据技术构建动态协同的生态环境治理智能分析系统,进一步精准掌握与全面了解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各类数据信息,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化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数据感知与分析,筑牢智能分析基础。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数据分析领域发挥着赋能作用,为构建智能分析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从海量的生态环境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发现生态环境数据之间的关联和规律;人工智能技术则能够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对生态环境数据进行建模和预测,进一步发现生态环境数据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和趋势,预测生态环境变化态势以及潜在风险。例如,通过对历史气象数据、水质数据和生态物种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以预测某一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这种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深度分析能力,使得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不再仅仅依赖于看得见的数据,而是能够洞察数据背后看不见的规律。

二是数字技术使能生态环境治理决策科学化,打造“数字生态治理大脑”。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使能作用,打造出具备智慧决策能力的“数字生态治理大脑”,有效避免了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依赖于经验和直觉的不足。数字技术通过构建基于海量生态环境数据的决策支持系统,使能生态环境治理决策的科学化。该系统能够对海量的生态环境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和处理,为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持。它利用数据挖掘、模拟仿真等技术对各种生态环境治理方案进行科学评估和优化选择。在评估过程中,系统会综合考虑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多个因素,通过建立评估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对不同方案进行量化分析,从而找出最优的生态环境治理方案。

(三) 流程优化, 高效治理

在数字经济时代,运用数字技术的赋能与使能作用,将其深度融入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能够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流程实现全面优化与高效重构,加速生态环境治理网络朝着整体化、协同化与一体化方向迈进,有效打破部门间的治理壁垒,大幅提升治理效率,助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一是数字技术推动构建整体协同的业务链。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基础架构的搭建中发挥赋能作用,为生态环境治理中整体协同业务链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在网络基础设施整合与综合协调治理平台的构建过程中,数字技术将各类资源紧密连接,促使生态环境资源、企业生产信息、企业征信体系、公民信息体系等数字信息实现高效集成。这种集成并非简单的数据堆砌,而是通过先进的数据整合技术,将原本分散在各个部门和系统的数据打通,赋予生态环境数据新的价值。在使能层面,数字技术使生态环境治理的“信息流”“时间流”以及服务流程得到重塑。以往,生态环境信息在不同部门和层级之间传递存在延迟和失真情况,导致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滞后。而数字技术利用智能算法对“时间流”进行优化,合理安排各项治理任务的先后顺序和时间节点,从而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效率。在服务流程方面,数字技术使能下的生态环境治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测生态环境数据和用户需求,自动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为生态环境治理相关主体提供更加个性化、高效化的服务。

二是生态环境治理中数据共享的实现促进了互联互通的数据链构建。在数据共享促进互联互通数据链构建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既通过赋能机制解决了生态环境数据整合和安全共享的问题,又通过使能机制推动了生态环境数据的高效流通和协同应用,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高效协同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方面,赋能生态环境数据整合架构,打破共享壁垒。通过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协同管理平台,数字技术从底层架构上对生态环境数据整合进行赋能。它运用先进的云计算技术搭建起一个具备强大计算和存储能力的云平台,为生态环境治理相关部门数据的集中存储和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中的数据治理工具,对不同部门的生态环境数据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使能生态环境数据流通应用,促进协同治理。在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数据整合与架构搭建的基础上,技术使能生态环境数据在不同部门间流通与应用,助力跨部门、跨层级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此外,数字技术使能下的平台配备了生态环境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便于生态环境治理部门深度挖掘与分析生态环境数据,各部门可以依此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治理方案。这种基于数据共享的协同治理模式实现了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和体系融合,从而产生集约化的生态环境治理效果。

三是数字技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服务创新,构建系统集成服务链。政府在建立一体化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应用平台时,数字技术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它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平台实现海量生态环境数据的智能交互、精准分析和敏捷反馈。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平台能够对生态环境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发现数据背后的潜在规律和问题。在使能层面,数字技术使智能分析结果能够快速融入生态环境治理与服务过程中。政府依据分析结果及时调整生态环境治理策略和资源配置,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同时,数字技术使能下的平台还能够为生态环境治理相关主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例如,企业可以通过平台查询自己的环境信用信息,了解自身的环境合规情况;公众可以通过平台获取环境质量信息和

环保政策解读,参与生态环境监督和治理。

(四) 互联互通,协同参与

“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意味着精细化和科学化,也意味着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3] 基于此,生态环境数据共享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被视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面和关键手段。传统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多采用单中心的治理协调机制,依托党政领导权威来推进治理工作,并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统筹协调与后续跟进。但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治理情形时,极易出现信息过载、注意力分配失衡等问题,导致信息壁垒和“数据孤岛”的产生,削弱了生态环境信息数据的透明性,影响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以及相关治理主体的参与度。而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通过赋能与使能的交互作用,能够打破传统生态环境治理局限性,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一是数字技术能够为生态环境相关治理主体提供智能化的协同参与方案。数字技术凭借赋能作用,为生态环境治理构建起标准化、智能化的协同参与框架,而使能作用则保障了这一框架在实际治理中的高效运转。在赋能层面,数字技术通过编码手段,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任务、规则和流程进行标准化编码,制定出一系列标准化的处理程序和办理流程,为不同治理主体明确工作方向和操作规范。同时,数字技术的模块化和可重构特性使得生态环境治理流程能够根据生态环境治理状况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当面临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或治理需求时,数字技术可以快速对现有流程进行修改、扩展或重组,无需对整个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进行大规模的变革。在使能方面,数字技术构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平台可以根据治理主体的职责和能力,将任务精准推送到相应的主体手中,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任务的高效分配和协同处理。这种自动流转和分配机制破解了传统生态环境治理中信息传递不畅、任务分配不均的问题,显著提高了多方协同参与的效率,实现了生态环境高效治理。

二是数字技术为生态环境治理相关主体的协同参与搭建了一个网络化的交流平台,赋能平台建设和作用发挥,而使能作用则促进了生态环境治理平台在多元主体互动中的有效应用。在赋能阶段,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构建起一个功能强大、稳定可靠的网络化生态环境信息交流平台。该平台具备数据存储、处理、分析和共享等多种功能,能够满足生态环境治理中各相关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在使能过程中,生态环境各相关治理主体能够通过线上平台针对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非结构化问题进行实时交流、数据资源共享、业务流程分配及实践进展查询等,以便及时调整治理方案,进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自主化协同水平。

三是数字技术能够为生态环境治理相关主体的协同参与带来内生驱动力,通过赋能激励机制的设计,使能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协同治理。在赋能方面,数字技术基于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的分散化特点设计出积分兑换等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对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行为进行量化评估。例如,治理主体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活动时(如提供数据、参与项目、提出建议等)可获得相应的积分。数字平台能够实时记录和统计积分,并根据积分规则兑换奖励。在使能过程中,积分兑换等机制为生态环境治理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同参与创造了生态环境治理资源互换和需求互补的广阔空间。治理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资源状况选择合适的积分兑换方式。例如,企业可以通过累计积分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项目合作机会等,环保组织可以通过积分兑换获取更多的资金、技术和宣传

资源。这种资源互换和需求互补的模式激发了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积极性^[25],使各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与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五、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创新发展中的赋能与使能

数字技术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不仅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力量,更能够进一步通过赋能与使能的交互作用,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创新发展。数字技术的赋能为生态环境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拓展治理的领域与能力;同时,它又通过使能进一步激活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内部的创新潜能,二者共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理念、体系与圈层的创新发展。

(一)理念转变:从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到转变生态环境治理理念

数字技术在驱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兼具赋能与使能的双重作用。在赋能层面,数字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分析与传输能力,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拓展治理手段、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治理效率与质量;在使能层面,数字技术激发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内部的创新潜能,推动治理理念、模式与机制的变革,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价值的提升。二者相互协同、交互影响,共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从提升治理效能到转变治理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始终是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宗旨所在,也是数字技术赋能与使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理念转变的目标所在。

其一,以现实需求为引领,实现从“政府供给为中心”到“公共需求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变^[26]。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生态环境治理职能部门拥有更强大的生态环境数据收集、分析与处理能力,能够精准把握公众需求,从而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变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技术赋能所获取的生态环境数据,通过技术使能推动生态环境治理部门从传统的“政府供给为中心”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在传统模式下,生态环境治理部门往往依据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来规划与提供公共服务,较少充分考虑公众的实际需求。而数字技术使能部门以生态环境数据为驱动,将公众需求置于核心地位,促使部门重新审视生态环境治理流程与决策机制,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生态环境数据的共享与流通,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公众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下的生态环境需求。

其二,以生态惠民为宗旨,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服务模式从“实现技术功能”向“满足群众需求”转变。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为生态环境治理职能部门提供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工具,使其能够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技术功能。数字技术的使能作用在于引导生态环境治理职能部门深刻认识到技术功能的实现并非最终目的,而是要以满足群众生态环境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应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价值初心,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治理误区。数字技术使能生态环境治理职能部门搭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沟通渠道,全面、深入地了解群众对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与利益诉求。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搭建的线上沟通平台,如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账号等,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实现生态环境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反馈;另一方面,通过线下走访、社区座谈等形式,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获取更多、更深入的群众诉求,避免单纯依赖技术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治理决策偏差。

其三,以价值共创为追求,促使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服务模式从“政府单向主导”向“多元主

体协同共创”转变。数字技术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效的技术赋能,打破了信息壁垒,使公众能够更加高效、全面地了解生态环境治理数据信息,提升公众协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共创提供有利的技术条件和治理氛围。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的使能作用体现在推动生态环境治理职能部门积极搭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治理平台、优化协同治理的表达机制。通过这一平台,使能各方治理主体能够平等、便捷地交流意见和想法,打破“政府单向主导”的传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价值创造。

(二)体系完善:从优化生态环境治理流程到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作为生态环境治理基础信息支撑的生态环境数据资源,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既是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手段。伴随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各治理主体对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的获取与价值创新更加依赖于稳固的技术环境。而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再次使能,促使各治理主体不断强化协作精神,重新审视自身的地位与作用。基于此,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使能生态环境治理向现代化转型,以数字技术为指引的配套建设不断推进,其在强调赋能生态环境治理相关职能部门数据管理能力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使能多元主体形成互联互通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模式,进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现从浅层次的流程优化向深层次的体系优化转变。

其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技术转化为数字红利的先决条件与基础保障^[27],凭借快速迭代、泛在支撑以及融合创新等独特技术优势,通过网络中介连接公共服务、政府治理、经济运行等打通社会经济发展的“信息大动脉”^[28],打破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技术壁垒,加速知识单元的挖掘进程,推动虚拟网络与现实世界的深度融合与创新,进一步激发生态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力^[29]。从赋能视角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它构建起高速、稳定、安全的网络环境,使得生态环境数据能够在各治理主体之间快速、准确地传输与共享,同时还为生态环境数据存储与管理提供了可靠保障,确保生态环境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避免数据丢失或被篡改。从使能视角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使生态环境各治理主体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打破了生态环境治理中地域、部门和行业之间的界限,使得不同主体能够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进行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的交流与合作。

其二,数字技术的评估监管体系建设。随着数字中国、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已深刻融入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框架和结构流程之中。这些技术既是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引擎,也是生态环境治理内在组成的关键要素^[30]。从赋能角度分析,数字技术的评估监管体系建设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技术应用提供了规范与指导。通过制定明确的技术应用标准和规范,确保数字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理合规使用。从使能层面来看,数字技术评估监管体系通过风险识别、适用性约束、过程监管和责任追溯等机制,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追责”的生态环境风险闭环防控体系,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其三,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的人才队伍建设。基础理论扎实、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强、跨学科研究能力突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赋能方面,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的人才队伍建设能够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相关职能部门的数据管理能力。高校

要聚焦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领域,打造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加大生态环境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为生态环境治理部门输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在使能方面,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治理技术人才队伍结构,提高数字技术创新人才和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间的适配性,能够激发创新活力,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同时,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还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需求,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和机制的变革,使生态环境治理更加科学、高效。

(三) 圈层创新:从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到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圈层

圈层创新作为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生态环境治理变革,使政策执行者和治理主体能够有选择地与纵向和横向的相关行动者调整彼此关系。在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圈层空间中,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方式相较于传统科层逻辑下的单一线性互动模式,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数字技术通过搭建多维度、多层次的交互网络,使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再局限于固定的线性路径,而是依据制度创新需求,展开多维度的交流与合作^[31]。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圈层创新,凭借其强大的生态环境信息吸纳与整合能力,能够汇聚来自不同主体、不同渠道的生态环境治理信息,构建起动态更新的生态环境治理信息库。同时,借助精准的问题识别与定位算法,数字技术可快速锁定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与关键节点,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精准的目标导向。在此基础上,圈层创新有力推动了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集成改革,催生出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

其一,以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信息吸纳与整合机制助力生态环境圈层创新治理中的隐患排查。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生态环境资源数量、生态环境多样性等数据信息至关重要。这些数据不仅有助于识别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还能为评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可持续发展潜力提供科学依据。从赋能视角来看,数字技术为生态环境信息处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手段。它能够高效地收集来自不同渠道、不同主体的生态环境数据,通过先进的数据分析算法和模型,对海量生态环境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和分析,挖掘数据背后的潜在信息。从使能视角而言,基于数字技术赋能所获取的生态环境信息,圈层创新治理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生态环境隐患排查。数字技术经由系统的生态环境信息收集流程,通过搭建统一的信息平台,整合各方生态环境数据资源,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共享,同时构建完整的信息数据库,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生态环境数据维护和管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的可视化功能,将数据以直观的图表、地图等形式呈现出来,方便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快速发现潜在的问题和隐患。

其二,以数字技术支持下的问题识别与定位机制助力生态环境圈层创新治理中的问题追踪与解决。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准确判断问题性质是后续工作的基础和依据。在赋能方面,数字技术为生态环境问题研判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工具。它能够对生态环境治理矛盾进行深入识别,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公众反馈、媒体报道等文本信息进行分析,提取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关键问题和矛盾点;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生态环境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明确问题的具体特点和严重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决策树、神经网络等算法将生态环境问题分为紧急、重要、一般等不同等级。这种等级划分既有助于清晰认识生态环境问题的轻重缓急,也能为后续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明确的方向和优先级。在使能层面,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生态环境问题研判结果和等级划分,圈层创新治理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生态环境问题追踪与解决,

根据各个等级的差异性设定相应的解决时间,这种做法确保了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条件下能够及时应对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避免因轻视某些矛盾而导致更大的生态环境危机。

六、结语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既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纵观当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针对数字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或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文章通过对赋能与使能的内涵辨析以及二者间逻辑关系的探析,揭示出数字技术作用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数字技术能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与重构,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带来创新机遇。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工具与手段,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数字技术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尚未得到充分实现,面临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与应用程度不足、信息数据流通不畅与共享障碍、数据管理模式与体制机制待完善等现实掣肘,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为此,本文从技术驱动能力提升和创新发展的角度,着力探讨了数字技术对于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影响,倡导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主体按照数字化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开展现代化转型实践。在转型初期,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积累效应,实现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创新发展。

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我国在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的巨大潜力,也反映出我国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抓住了发展先机。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加快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以推动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但与传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相比,数字技术驱动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理论研究尚显不足。目前,这一领域的相关理论仍需进一步与实践相结合,以期实现更为显著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23-07-19.
- [2] 陈伟雄,李宝银,杨婷. 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J]. 当代经济研究,2023(9):99-109.
- [3] 孙全胜.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三重路径[J]. 理论研究,2024(1):62-70.
- [4] 唐萍萍,任保平.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生态现代化的机制、路径与政策[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85-99.
- [5] 杨达,胡瑞竹. 数据融通赋能数字政府绿色治理的逻辑机理与优化路径[J]. 探索,2024(6):100-111.
- [6] 闫瑞华. 中国林草电子政务数字化整合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1):95-104.
- [7] 王秉,史志勇,王渊洁. 何为数智赋能:概念溯源与解构[J]. 情报资料工作,2024(5):13-21.
- [8] 彭宗峰. 走向深层话语塑型方式建构:赋权理论本土化的认知逻辑演进[J]. 浙江社会科学,2022(8):78-86.
- [9] 汪基德,李博,朱书慧,等. 赋能、负能与使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多维审思[J]. 电化教育研究,2024(8):80-86.

- [10] 李国强,胡文安,孙遇春. 科技园区“使能型”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案例研究[J]. 科研管理,2022(7):53-60.
- [11] 周懿,郑慧. 从赋能到使能——产业大脑促进制造业提质发展[J]. 企业管理,2022(12):11-15.
- [12] 速继明. 论数字化对社会治理的空间重构及其思维变革[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12):3-12.
- [13] 赵新峰,张强,王洁. 生态文明建设视阈下数字生态治理系统的建构方略[J]. 北大政治学评论,2022(2):113-132.
- [14] 陈良斌. 数字孪生城市的治理变革与路径优化[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52-60.
- [15] 谢新水. 联通“平行世界”的数字场景:界面基础、驱动力量与时空冲击[J]. 探索,2022(2):140-152.
- [16] 杨达,鲁大伟.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城市绿色治理路径探析[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64-72.
- [17] 陶飞,刘蔚然,张萌,等. 数字孪生五维模型及十大领域应用[J].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9(1):1-18.
- [18] 戚聿东,沈天洋. 以技术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困境与路径[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62-72.
- [19] 韩少秀,朱美峰,刘慧洁,等. 碳排放监测预警体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相关数据的分析[J]. 生态经济,2022(7):21-27.
- [20] 曾维华,解钰茜,王东,等. 流域水环境承载力预警技术方法体系[J]. 环境保护,2020(19):9-16.
- [21] 郭晓燕. 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转型的难题与路径[J]. 人民论坛,2022(6):60-62.
- [22] 谢忠强,成文雅.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我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现实困境与发展进路[J]. 当代经济研究,2024(4):52-60.
- [23] 欧阳康,郭永珍. 论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J]. 江苏社会科学,2021(6):26-33.
- [24] 陈善荣,陈传忠,陈远航,等. 面向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研究[J]. 环境保护,2022(20):9-12.
- [25] 沈永东,毕荟蓉. 数字治理平台提升政社共治有效性的多元机制:以“社会治理云”与“微嘉园”为研究对象[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6):113-121.
- [26] 赵金旭,孟天广. 技术赋能:区块链如何重塑治理结构与模式[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3):187-194.
- [27] 李琬,张国胜. 跨越“数字鸿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供给政策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2022(11):24-30.
- [28] 钞小静,王灿. 打通“信息大动脉”:以数字基础设施助力数字中国建设[J]. 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4):41-48.
- [29] 赵华平,陈龙,孟宏伟.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创新系统韧性:韧性演化及影响机制[J]. 城市问题,2024(6):45-54.
- [30] 李建军. 基层治理中的数字技术滥用及其防控策略[J]. 国家治理,2023(6):25-30.
- [31] 黄建洪,陈伟光. “圈层式创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微观机理研究——基于苏州片区创新实践的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2024(10):60-68.

Empowering and Enabling: Important Paths for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ZHANG Banghui¹, LI Yibo²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wave is integrating into the fields such as social governance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providing fully support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upgrading of the governance model.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ecological and envi-

ronmental governance, its empowering and enabling effec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bility enhancement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hich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Empowering refers to the enhancement of decision-making and action capabilitie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ubjects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by providing tools or resources. Enabling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resources by digital technology to stimulate the inherent potential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ubjects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mpowering and enabling do not exist in isolation, but are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Empowering provides the technical basis and methods for enabling, so that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n better utilize their own advantages under the support of digital technology. But enabling further amplifies the effect of empowering, so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can play a greater value i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empowering, enabling and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further clarified. Howev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poor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and sharing barriers, and imperfect management models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Based on thi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dynamic monitoring and proactive prevention,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efficient governance, connectivity and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deepening stage of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chiev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rough concept changes, systemic improvements, and circular innovation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practical obstacle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direction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and achieving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empowering, enabling, digital technology,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金华宝 陈卓

引用格式:康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逻辑递进、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J].探索,2025(3):115-129.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逻辑递进、 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

康健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1731)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回顾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逻辑递进,探索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现实挑战及实现路径,对加快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经历了奠基、探索、成型、均等化目标扎实推进、以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实现均等化目标等五个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体现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显著的制度话语变迁。具体而言,强调均衡性和可及性是对新时代现实挑战的制度回应,是对均等化的价值深化表达,是实现均等化目标更为明晰的政策工具。然而,在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方面仍然面临多方面现实挑战。在均衡性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与人群间仍然存在差距,静态供给难以适应人口变化引发的需求变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监测体系有待完善;在可及性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物理可达性存在障碍,供需脱耦阻碍需求可及,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也有待提升。基于此,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应加快资源配置和要素保障达标建设,基于人口—空间关联分析完善资源配置制度,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中的动态监测;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需促进依托数智底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识别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属性促进供需精准耦合,提升政策灵活性。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均衡性;可及性;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115-15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一个现代国家履行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其主要功能在于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产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旨在解决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促进民生保障的公平正义;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旨在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城乡基层、偏远地区、弱势群体中下沉不够、“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人民群众获得感不高等问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可及、可享,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要加快建立起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评估与路径优化研究”(22CZZ027),项目负责人:康健。

作者简介:康健,男,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基本公共服务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2]。党的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发展目标,并明确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长期以来,学界高度关注基本公共服务问题。200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随后的“十一五”规划提出“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4]。此后,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得以兴起并迅速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这一时期基本公共服务研究的核心内容,学者们对均等化的政策目标与制度保障^[5]、均等化中的政府角色^[6]、均等化的评价体系^[7]等诸多内容进行了探讨。而除了均等化之外,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也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研究的热门话题^[8],以“均衡”考察城乡公共服务更是流行一时。

然而,基本公共服务研究的系统性、规范性仍然有待提升,例如“均衡化”和“均等化”并未被明确区分,两个术语常被混用^[9],研究也大多局限于区域性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公共服务等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研究的广度、深度进一步提升,较好顺应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10]。这一时期,均等化仍然是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议题^[11]。随着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3],均衡性和可及性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学者们大多从宏观层面对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进行了探讨^[12],将其视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立足点^[13],也有部分学者聚焦于公共治理问题的中观或微观切口对均衡性、可及性进行讨论^[14]。根据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可以发现,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制度与话语变迁既体现了对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坚守,也反映了治理目标从建立基础向质量优化的转型。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均衡性和可及性本身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蕴,较少对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制度话语变迁给予关注。这就需要深入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改革目标的逻辑递进,分析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现实困境并探索实现路径,从而进一步健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民生保障制度基础。

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发展历程

综合学界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的相关观点,并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的关键事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制度体系奠基阶段(1949—1978年)。自新中国成立起,党和政府就开始筹划如何保障群众基本权益^[15]。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等任务,为日后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提供了经验与参考。尽管这一时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不同单位和集体之间的服务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为新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6]。

第二,制度体系探索阶段(1978—2005年)。改革开放后,实现经济增长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被提上议程,一系列相关的政策举措相继出台。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设立“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一章,专门阐述社会保障改革问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1998年6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要求,强调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正式将公共服务界定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改革探索。然而,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出现空间分异,城乡、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问题也在这一阶段更加突出^[16]。但随着供给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逐步得到提升^[17],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

第三,制度体系成型阶段(2005—2016年)。以200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为起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日益成型。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4]。同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之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论及“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时强调,要实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18]20}。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对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专题论述,要求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19]30}。然而,此时在城乡间、群体间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服务,尚未实现投入与结果均等。因此,自《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发布后,我国开始建立政府主导、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同时注重与之相耦合的配套制度。如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201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201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得到初步健全和完善,各级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得到优化升级,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和标准得到执行落实,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逐渐成型。

第四,均等化目标扎实推进阶段(2017—2021年)。国务院于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这一规划全篇围绕“均等化”的主线展开,突出强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基于此,在这一时期,我国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为目标来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

系,注重采用标准化手段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2018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基本民生底线不断筑牢夯实,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得到提升,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第五,以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实现均等化目标阶段(2022年至今)。2022年以来,我国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来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重点在于让人民更好地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则是这一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是当前重要而紧迫的改革任务。

由此可见,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发端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制度体系奠基、探索、成型、均等化目标扎实推进等发展阶段,进而演变为当前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并正进入以增强均衡性、可及性实现均等化目标的阶段,即“均衡性—可及性”双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三、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逻辑递进

回顾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基本制度确立之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经历了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变迁,需要从“价值”和“工具”两个角度加以探讨。一方面,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解释公共管理制度建构的核心维度,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动态平衡能够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走出困境提供可行思路^[20];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本就是一项具有系统性和全局性的民生工程,涉及制度、价值、工具等多方面的内容,从制度、价值、工具等维度加以分析是深入理解和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要举措。基于此,可以从制度完善、价值深化、工具明晰三个维度出发,讨论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逻辑递进。

(一) 制度完善:均衡性和可及性是对发展新要求的制度回应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改革目标从实现“均等化”到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演进,不仅体现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也体现了治理理念从注重资源覆盖向注重均衡分配和服务可及的转变。从制度的维度理解,这一逻辑递进反映了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现实挑战的制度回应,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21世纪初,我国城乡公共品供给明显失衡,低收入社会群体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低于社会其他群体^[21],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性供给问题成为“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任务。彼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有待搭建,供给的效率、质量、结构等都亟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标的提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的政策举措,推动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均衡^[22],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开始起步,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在顶层规划性总体设计、政策执行制度保障落实等方面给予了充分重视,先后颁发了一系列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措施,以着力实现均等化目标^[11]。

虽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正如《“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指出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规模不足、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等短板”^[23],亟需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升,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2]。基于此,《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扎实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回应上述问题的核心政策表达。

随着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诉求逐渐从“有机会享有”向“更多更公平更优质享有”转变^[19],亟需以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为抓手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先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在《“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指导下稳步推进,以“均衡性—可及性”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可以发现,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演进同时也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反映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当前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调整^[23],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对现实挑战的制度回应。以均等化作为政策目标统领,以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为具体抓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了从目标提出、制度搭建到制度不断细化和完善的过程,这一制度发展过程也体现了均等化从理念设计到逐渐实现的实践进程。

(二) 价值深化:均衡性和可及性是均等化的深化表达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丰富和深化。从演进历程来看,“均等化”作为最初的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多样化,单纯的“均等化”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对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着将“均等化”等同为“平均化”“等同化”的倾向;此外,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搞“一刀切”“大水漫灌”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矫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过程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倾向,有必要对均等化的价值做进一步的深化阐释。

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制度话语变迁,既体现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改革的目标转换,也反映了对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价值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均衡性和可及性”是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一以贯之,也是对均等化价值的深化表达,是当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也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的更为可感而切实的途径。

均衡性深化了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均等”并非“平均”之意,而是强调机会公平和可得,是对共性需求和需求精准对接的兼顾^[24]。早在《“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就曾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简单的平均化”,此后出台的政策也并非以平均主义为目标,而是关注“公平”“均衡”的“均等化”^[11]。但在实践层面,人们往往将“均等化”误解为资源简单分摊的“平均主义”。均衡性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克服

这一认知误区。尽管仍有研究将“均衡”与“均等”视为同义词使用^[9],但相比之下,“均衡”更强调一种相对稳定平衡的状态^{[25]48},着眼于过程与产出的全方位平衡,关注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享有”,将公共服务分配的公平正义从静态的资源分配提升为动态的均衡调节,强调通过差异化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相对稳定平衡的供给状态。

可及性深化了基本公共服务结果均等的切实落地。“均等化”虽有良好的分配初衷,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有效获得这些服务。地理偏远、经济条件限制或信息获取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会让一些人“够不着”均等化的成果。可及性强调民众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较为便捷的方式获得符合自己需求的公共服务^[13],关注基本公共服务是否触手可得、经济可承担、时间可方便,即强调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高质量享有”,其研究的核心就是评价公共服务与服务对象需求之间是否适配,成为评价公共服务供给是否契合需求的关键指标^[26]。正如有学者认为,从“均衡”到“可及”是对公共服务供给基本目标的提升^[27]。只有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以可及性为着力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需有效对接,才能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 工具明晰:均衡性和可及性是实现均等化目标的政策工具

在政策科学中,政策工具是达成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从政策工具的角度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宏大的政策目标,需要配套有效的政策执行工具才能得以实现。“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正是这一政策目标的关键操作性工具:均衡性侧重于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维度,可及性聚焦于服务获取的便捷有效维度,二者作为相互补充的政策工具,共同构成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框架和评估标尺,既保持了政策传导的稳定性,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因地制宜的弹性空间,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政策统一性与自下而上的创新适应性的有机结合。

一是作为政策工具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具有明显的政策规范特征。均衡性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全过程要求,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标准,从而减少执行过程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均衡性重在缩小差距,可及性强调契合群众公共服务需求”,提出均衡性的目标“使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方向更明确、内容更可行”^[12],也使均等化的目标更加具体和可衡量。可及性则使基本公共服务目标从“物理可及”走向涵盖服务可用性、费用承受度与民众接受度等多因素的“多维度可及”,同样推动原本抽象、宏大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目标转变为更可感、可落实、可评估的方案。

二是作为政策工具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发挥着关键的调控和引导作用。均衡性政策工具通过优化资源分配结构,减少区域和群体间的差距,在制度设计层面塑造公平正义的框架,促使政策资源投放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而可及性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决策科学性、供需适配性和服务获得感等^[28],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过程的体现^[29],使用好可及性政策工具则能够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全过程的切身实惠,确保基本公共服务惠及目标民众,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是作为政策工具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还具备动态反馈与调整的能力。提高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程度的评估效能,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重要维度。基于对均衡性和可及性指标的持续监测与评估,决策者能够及时掌握政策执行瓶颈,有的放矢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循证的政策优化,形成“目标—工具—执行—反馈—优化”的闭环管理,从而使均等化目标的实现路径更加清晰可循,政策调整的方向更加精准有效,切实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综上所述,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在制度完善、价值深化和工具明晰三个维度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逻辑递进。增强均衡性着重关注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增强可及性强调服务获取的实效性,这也确立了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参照框架与标准,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执行、可测量的实践路径。“均衡性—可及性”双轮驱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为全面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提供方法论支撑,有效化解理论维度争议与实践进路分歧,更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体系与实践话语,揭示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逻辑递进(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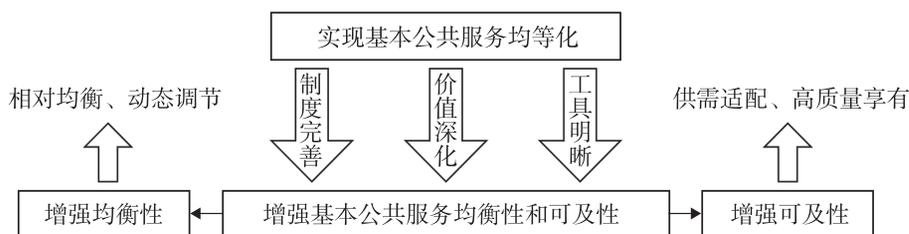


图1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逻辑递进

四、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现实挑战

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均衡性和可及性不足^[22],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面临制度执行偏弱、规划落实偏软、机制运行低效等问题,阻碍了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12]。从均衡性的角度来看,基本公共服务要素配置仍然呈现出非均衡态势;从可及性的角度来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仍然不足。

(一) 基本公共服务要素配置的非均衡

第一,城乡、区域与人群间仍存在差距。在城乡层面,农村地区不仅硬件配置存在短板,教师素质、医疗水平、文化内容等软性要素上也明显落后;在区域维度,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服务标准与质量的断层,即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增加资源投入,管理体制、人才储备、服务理念等深层因素的差距仍难弥合;在人群层面,表现为以户籍为核心的制度性壁垒造成流动人口、新市民等群体面临“同城不同待遇”的困境。与此同时,标准化、达标化进程受阻于标准细化程度不足、执行机制不健全、刚性与弹性失衡等问题,形成“有标难立、立标难执、执标难达”的循环困局,制约了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第二,静态供给难以适应人口流动引发的需求变化。首先,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深受人口流动形势影响^[30],但供给规划过度依赖户籍人口统计数据,忽视常住人口动态变化,导致人口流出地公共服务过剩而流入地供给不足,尤其在大城市边缘区和城乡接合部形成服务真空;其次,规划方法未能有效融入人口地理学原理,忽视人口迁移流动、密度变化和年龄结构等关键因素,使服务布局与人口空间分布脱节;最后,数智化手段应用不足,未能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预测人口流动趋势与服务需求变化,数据时效性差、系统割裂、分析滞后等问题限制了服务供给对社会变迁的敏感性和精准响应能力,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服务供给均衡性不足。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监测体系有待完善。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建立标准体系

并进行评估和监测意义重大^[31],但仍面临这三个方面的困境。首先是标准体系不完善,未建立分层分类架构,忽视地区差异和需求多样性,缺乏弹性调整和内在协调性;其次是评估监测方法欠科学,缺乏均衡性的多维度测量、区域差异敏感度和动态跟踪能力,难以支撑决策;最后是评估指标失衡,重投入轻结果,重硬件轻质量和满意度,致使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数据均衡”与民众“感知非均衡”的矛盾。

(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不足

第一,基本公共服务难以抵达“最后一公里”。首先,服务设施分布不均、交通不便导致居民获取服务成本过高,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其次,存在服务时间与工作人群作息冲突、流程复杂、材料繁琐和信息传递不畅等问题;最后,“数字鸿沟”问题长期存在,部分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难以适应或利用数字技术获取服务,进一步加剧了服务获取壁垒。综合来看,这些因素共同阻碍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下沉和覆盖,难以在真正意义上打通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前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一大挑战。

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供需脱耦。供需匹配是保证服务需求得到切实满足的基础,但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在内容与方式上均存在脱节。在内容层面,公共服务供给依然存在行政标准化配置和“一刀切”的现象,难以体现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特点。例如,教育方面存在重标准轻特色等问题,医疗方面存在重诊疗轻预防等问题,养老方面存在重机构轻社区等问题。在方式层面,公共服务递送受限于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在时间安排、场所布局和办理流程方面多以供给便利为导向,未能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特别是流动人口、弱势群体的实际使用场景和便利性需求,使得服务形式趋于单一。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政策执行灵活性有待提升。政策的刚性执行反映的是政策的严格执行,不允许出现拖延、变通、差异、例外和保留^[32]。在基本公共服务政策执行中,部分地方存在灵活性不足的问题。一是政策执行同质化,地方照搬上级要求,缺乏创新转化,导致出现政策“水土不服”现象,影响了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享有;二是考核导向异化,部分地区追求形式达标,进行“临时突击”和“包装工程”,重“痕迹管理”轻实效;三是缺乏差异化实施空间,上级政策对基层差异性和执行能力差距考虑不足,部分基层政府受财力人力限制难以标准执行,又缺乏创新调适空间,最终表现为政策执行刚性过强,反而阻滞了可及性的增强。

由此可见,我国在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基础更加坚实,发展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面临更加艰巨的现实挑战。在均衡性层面,城乡、区域和人群间的结构性差距仍然存在,静态供给模式难以应对人口流动的动态变化,标准化和监测体系有待完善,制约了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的增强;在可及性层面,“最后一公里”仍未完全打通,供需脱耦现象依然存在,政策执行的灵活性有待提高,不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

五、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实现路径

面对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提升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亟需从均衡性与可及性两个维度出发,分别讨论其优化路径。总体而言,在均衡性方面要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的均衡配置,破解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的服务差距;在可及性方面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动态精准,精

准回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一) 增强均衡性,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的均衡配置

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主要体现在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存在差距。城乡层面,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相对完善而农村相对滞后,影响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较为优质,而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相对不足;群体层面,农民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基本公共服务获取能力方面存在障碍。因此,要着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要素的均衡配置。

1. 加快资源配置与要素保障达标建设

第一,建立适应不同地区经济承载力的动态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坚持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作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原则。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应当根据各地区的经济承载能力和发展需求,制定相应的服务标准,以此确保公共服务的供给既符合实际需求,又不超出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根据实际承载能力,设定合理的服务标准,确保公共服务供给不低于国家标准。对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设定更高的服务标准,而对于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则应给予适当的灵活性。

第二,以数智化突破基本公共服务时空限制。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公共服务供给手段提供重要技术支撑^[33],引导公共服务供给结构的全面革新。在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方面,数智技术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对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的桎梏。具体而言,数智技术以其高效整合数据、优化资源流动的特性,为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搭建城乡资源共享平台,突破地域限制,将优质教育、医疗等城市资源输送至农村,缩小城乡间的服务质量差距;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精准识别区域间公共服务的供需差异,动态调整资源分配方案,从而实现供给的科学化与均衡化,实现更广泛、更公平、更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

第三,基于均等化实现程度评价补短板、强弱项。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进行评价,能够切实反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政策目标的达成度、政策执行的有效度、政策感知的满意度等^[34]。这一评价结果将指明哪些领域和地区存在短板和弱项。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大对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调试和资源倾斜,可以有效提升在薄弱环节的公共服务水平。例如加大对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投入,完善优质资源下沉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要素配置在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均衡布局。

2. 基于人口—空间关联分析完善资源配置制度

第一,深入研究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由于当前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拥挤,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较低,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融合发展有待进一步推进,因而需要加强对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研究,包括分析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模式的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间公共服务需求的动态变化,完善资源配置的制度设计。例如,对不同类型城镇(大中小城市、城镇)的公共服务需求差异进行深入研究,并预测未来城镇化发展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同时,要关注城乡融合发展对公共服务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提出的新要求,例如如何有效利用农村现有资源,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跨域协同、空间均衡。

第二,深入研究城乡人口流动与常住人口变化规律。“人的自由迁徙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显著标志,对资源优化配置、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35]需要对城乡人口数量、结构、空间分布等进行长期跟踪分析,预测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尤其要关注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方向、规模和速度以及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影响。针对常住人口,则要继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等。

第三,深入研究人口公共服务需求演化规律。人口公共服务需求的演化规律体现在人们不同层次的公共服务需求上,即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收入水平的人群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各不相同。为此,要研究不同群体(年龄、收入、健康状况等)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的需求差异,推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由“行政化配置”向“按人配置”“按需配置”转变。

3. 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中的动态监测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需要融入动态监测评估,其核心在于精准识别区域、城乡和人群间的资源配置差距。在构建包括投入、产出、效果等多维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将动态监测评估融入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能够全面反映公共服务在不同区域和群体中的均衡水平,及时发现资源分配中的短板和不平衡之处。基于评估结果,动态调整资源配置方案,确保公共服务在动态变化中实现合理分布,逐步缩小区域和人群间的差距,从而推动均衡发展。

第一,建立区域差异动态监测评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在监测评估内容方面,要动态监测评估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覆盖范围和质量差异,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资源分布情况。在监测评估工具方面,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结合大数据技术,实时分析区域间公共服务均衡性差距。在政策调整方面,根据监测评估结果,动态调整财政转移支付和资源分配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差距。

第二,构建动态监测评估的标准化体系,推动服务均衡发展。在监测评估内容方面,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评估,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服务达标率和覆盖率。在监测工具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监测评估平台,定期发布监测评估报告,评估各地区服务达标情况。在政策调整方面,针对监测评估中发现的标准化实施不足问题,制定补短板计划,推动服务均衡化发展。

第三,实施动态监测评估的过程评估,保障政策公平性。在监测评估内容方面,重点监测评估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公平性,包括政策对弱势群体的覆盖程度和补偿机制的落实情况。在监测评估工具方面,通过问卷调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收集弱势群体对政策公平性的感知数据,结合政策环境公平性指标进行分析。在政策调整方面,根据监测评估结果,优化政策设计,确保弱势群体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利保障,提升政策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二) 增强可及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动态精准

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本质上是解决“服务够不够得着”的问题,它要求服务不仅要“在那里”,更要“可获取、可使用、可负担”。“绣花针”式的精细化治理是提升可及性的关键路径——它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强调服务供给的精准化、差异化与灵活性,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精准回应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依托数智基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识别预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服务精准度,提高

物理可及;二是通过需求分类与挖掘,促进服务供给与多样化需求精准耦合,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实现感受可及;三是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灵活性,保障因地制宜。

1. 依托数智基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识别预测

利用数智技术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提出要鼓励支持新技术赋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同样指出要推动数字技术弥合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当前,数智化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重要创新手段^[36],有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耦合。依托数智基座成为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开展基于大数据驱动的需求识别与决策支持。要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的总量、配置需求的精确预测,基础和关键在于公共服务需求的“智能感知”和公共服务安排的“数据决策”,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需要主动收集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37]。基于数智基座集成的大数据以及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政府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公共服务需求。例如,利用社交媒体、在线调查和传感器数据构建的综合数据平台,可精准刻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具体需求画像和服务缺口。此外,数智基座使得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实施效果的精准模拟成为可能,也即通过模拟情景分析评估不同政策方案的覆盖范围和服务效能,为决策优化提供支撑,从而实现资源的前瞻性配置和精准投放。

另一方面,推动数智驱动可及性的动态监测评估。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需要融入动态监测评估,其重点在于确保服务的覆盖范围和触达能力,保证服务能够便捷、公平地触达所有人群。数智技术的发展为动态监测和精准评估提供了新机遇,突破了传统定期抽查和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静态监测和评估的局限性。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可实时感知服务供需动态,精准发现盲区和薄弱环节,预测未来需求。例如,结合社交媒体分析、在线反馈、传感器和手机信令等实时数据,建立需求画像与趋势模型,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利用空间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预测服务设施覆盖、交通可达性和满意度等指标的变化,为提升物理空间可及性提供决策支持。

2. 根据不同需求属性促进供需精准耦合

精准识别并有效回应群众需求,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需耦合从而提高可及性的关键。KANO模型是一种旨在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客户需求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分析模型。该模型将客户需求分为必备质量、期望质量、魅力质量、无差异质量和逆向质量五类。参考KANO模型,可以开展基于数智基座的需求调查,识别基本公共服务的必备属性、期望属性、魅力属性、无差异属性等,根据不同需求属性促进供需精准耦合(见图2)。

第一,巩固必备属性和期望属性需求供给。必备属性需求是指公众在基本公共服务中所需的最基本的功能和服务,例如教育、医疗和交通等。这些服务的供给必须得到保障,以满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期望属性需求则是指公众对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更高要求。为了巩固这两类需求的供给,政府和相关机构需要定期评估服务的质量和覆盖面,确保服务不仅能满足基本需求,还能在质量上有所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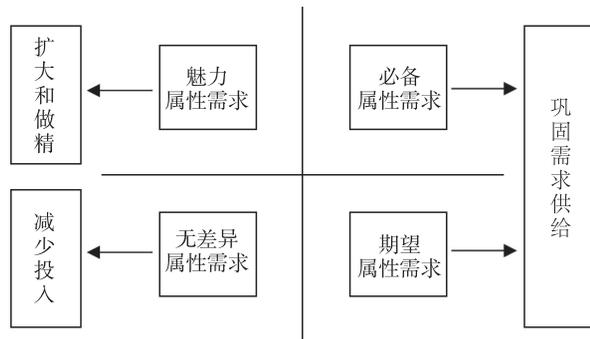


图 2 基于 KANO 模型的基本公共服务供需耦合进路

第二,扩大和做精魅力属性需求供给。魅力属性需求是指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附加价值和体验的追求,例如文化活动、休闲设施和社区服务等。为了扩大和提升这类需求的供给,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和增加服务的多样性来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

第三,适当减少无差异属性需求的投入。无差异属性需求通常是在不同人群中没有显著差异的需求。对于这类需求,政府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不必要的投入,由此集中资源提升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例如调整政务服务填写表格的样式、优化政务服务 APP 中的冷门板块等。

3.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灵活性

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过程中,政策的灵活性是关键。传统的公共服务政策往往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统一配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普及覆盖,但也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机械化和僵硬性,难以适应不同地区、群体的实际需求,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加剧了服务的可及困难。例如,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即使按照规定在相应行政区划内设置了卫生站,但由于地理面积大、交通不便,偏远村庄的居民仍难以及时获得医疗服务。可见,政策的简单执行不仅无法满足多样化需求,还可能削弱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因此,增强政策执行的灵活性,既是提升公共服务触达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最后一公里”服务落地的重要保障。

第一,在政策执行中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提高政策再生产与创新水平。一要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根据地区发展水平、城乡差异和地理条件,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政策关注重点。例如,对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可增加流动服务设施,如移动医疗车、巡回教学等,确保服务能真正覆盖到“最后一公里”;对于人口密集区域,则可采取集中布局模式,提高服务效率。二要增强政策执行的精准性。例如,在城市社区,针对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加大养老服务设施投入,提供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食堂等适老化服务;对于年轻人和流动人口集中的区域,则可提供 24 小时自助服务设施和错时延时服务,满足其特殊作息需求,让服务供给与人口特征精准匹配。

第二,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增强政策适应性。一要下放调整权限,打破“上下一般粗”的政策传导模式。允许基层根据当地居民实际需求和服务资源条件,对上级政策进行灵活调整和创新实施,以实现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精准对接。二要鼓励基层创新实践,支持其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公共服务新模式。例如,在人口小县等地区,可尝试“一站多能”的综合服务点模式,让有限的人员和设施发挥最大效用;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则可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互联

网+”服务新形态,提高服务的便捷性和可获得性。

第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政策响应。一要构建常态化评估反馈体系。通过建立政策执行的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收集群众意见,分析政策执行效果,及时发现服务可及性的薄弱环节。二要实施灵活调整和持续优化。根据评估结果,对服务内容、方式和标准进行动态调整,确保政策始终贴近群众需求,让公共服务真正能够“有需即达”“应需而变”。

六、结语

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是实现共同富裕价值追求与政治功能的重要制度基础。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进而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助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事关共同富裕目标,事关民族复兴伟业,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并将其作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任务,基本公共服务对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愈发重要,也愈发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然而,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其逻辑演进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当前,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研究力度,阐释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逻辑转换正当其时。本文认为:这种制度话语变迁,揭示了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从“均等化”到“均衡性和可及性”在制度完善、价值深化、工具明晰三个维度的逻辑递进。理解好和把握好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改革的这一逻辑转换,并明晰其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改革的内在规定与实现路径,不仅是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改革和完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国新时代民生政策的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28.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2006-03-17.
- [5] 项继权.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与制度保障[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2-9.
- [6] 刘琼莲. 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角色[J]. 东南学术,2009(1):104-112.
- [7] 王新民,南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基于我国31个省域的实证研究[J]. 软科学,2011(7):21-26.
- [8] 王国华,温来成.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可行性选择[J]. 财贸经济,2008(3):40-43.
- [9] 解建立. 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均衡化的目标探究[J]. 财政研究,2009(9):38-41.
- [10] 王佃利,王文婷. 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理论思考:内涵、要求与路径[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20-31.

- [11] 姜晓萍,郭宁.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与演化规律——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策的文本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6):33-42.
- [12] 钱振明.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基于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23(10):54-61.
- [13] 李宝荣.完善和推进立足于均衡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24(8):32-36.
- [14] 王欣亮,邢誉丹.数字治理与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感知: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06-116.
- [15] 尚虎平.保障与孵化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程、逻辑与未来[J].政治学研究,2021(4):64-74.
- [16] 康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显著优势及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5-61.
- [17] 姚树洁,张小倩.新质生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及实践路径[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87-102.
- [1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9]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20] 徐国冲,陈宇环.找回技术治理中的制度维度[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3-32.
- [21] 陈海威,田侃.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讨[J].中州学刊,2007(3):31-34.
- [22] 刘伟.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优化与效力提升——解码共同富裕“浙江经验”[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0-21.
- [23] 任保平,王昕.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中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47-55.
- [24] 张紧跟.治理视阈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J].探索,2018(2):27-37.
- [25] 解建立.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机制和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6] 张垒.公共可及: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新趋势、新模式与新路径[J].图书馆,2025(1):104-111.
- [27] 朱城坤.精细化治理何以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J].决策与信息,2024(9):78-86.
- [28] 刘丰睿,辛冲冲.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户籍门槛的调节效应视角[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86-97.
- [29] 宋佳莹,郭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可及性与受益性视角[J].统计与决策,2024(4):91-95.
- [30] 刘敏.人口流动新形势下的公共服务问题识别与对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9(5):42-50.
- [31] 康健,姜晓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评价要素与维度[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2):28-34.
- [32] 常健.跳出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执行的恶性循环——政策执行“一阵风”现象的形成机理剖析[J].人民论坛,2018(9):61-63.
- [33] 陈起风,李长源.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新理念与新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4(12):162-170.
- [34] 姜晓萍,康健.实现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的新视角与指标构建[J].中国行政管理,2020(10):73-79.
- [35] 王桂新.以人口迁移流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中国人口科学,2023(5):9-12.
- [36] 洪志超.数字社会与共同富裕:理论逻辑、机遇挑战与治理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4(8):195-204.
- [37] 谢小芹.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成都市的经验观察[J].探索,2024(1):90-102.

Logical Progress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Institutional System

KANG Ji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to enhanc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accessibility in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logical progression from “equalization” to “equity and accessibility”,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o achieving these goals.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ive distinct phases: foundation-building, exploration, formalization, steady progress toward equalization, and the current phase of achieving equalization through equity and accessibility.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transition from equalization to equity and accessibility reflects a significant discursive shift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Specifically, the emphasis on equity and accessibility constitutes the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era, a deepening expression of the value of equalization and the specific policy tool for equaliz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o many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realizing equity and accessibility. In terms of the equity, disparities persist in basic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across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gions and population groups, static supply systems fail to demand shifts driven by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s for basic public services require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he accessibility, physical barriers hinder the reach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upply-demand mismatches obstruct effective acces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mains insufficient. To enhance the equ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it is essential to accelerat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mprove resource distribution system based on population-spac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engthen dynamic monitoring. Improving the accessibility requires leverag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for demand identification and forecasting, fostering precise supply-demand alignment based on differentiated needs, and enhancing policy flexibility.

Key words: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equity, accessibility, equalization

责任编辑: 牟 怡

引用格式:冯刚,王凯宗.增强党的青年工作文化力量的实践经验与现实启示[J].探索,2025(3):130-143.

增强党的青年工作文化力量的实践经验与现实启示

冯刚^{1,2},王凯宗¹

(1.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不仅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还是一种文化现象,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力量。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既是一种哲学思考和价值关怀,更是对青年、青年工作与文化三者关系的深刻探讨。理清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文化逻辑,需要深入理解其内在的文化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的思想观念、红色资源、道德规范为党的青年工作提供丰富滋养,是青年工作的精神命脉、红色基因、文化支撑,共同构成了党的青年工作的文化维度。揭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取得伟大成就的文化密码,需要深刻总结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文化的育人价值,形成了在文化引领中增进青年思想认同、在文化创新中巩固青年文化主体性、在文化交流中拓展青年国际视野的青年工作文化经验。新时代新征程,党的青年工作是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深化拓展党的青年工作文化路径,就要沿着青年工作的文化维度,在百余年来积累的青年工作文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化的整合、创新、沟通功能,推动青年工作夯实体系根基、强化场景体验、提升开放格局,进一步增强党的青年工作文化力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青年工作;文化育人;文化力量

中图分类号:D29;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130-14

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中承担着特殊使命和重要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1]71}也就是说,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准确认清党的青年工作的目标要求,深化探索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实践路径,需要我们从更宽广的视角、更宏大的叙事来思考。文化在历史传承发展中表达着对社会生活实践的规律思考,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主张和价值系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到文化层面思考党的青年工作,是深刻把握青年工作丰富内涵与实践指向、以文化伟力丰富党的青年工作的应有之义。因此,要深入挖掘文化在党的青年工作中的地位、作用、效能,理解青年工作的文化维度。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青年工作发展史中,深刻总结党的青年工作的文化经验,揭示党的青年工作的文化密码,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深化拓展党的青年工作文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进一步增强党的青年工作文化力量提供理论指导与现实指引。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政课的公众形象塑造研究”(22JDSZKZ07),项目负责人:冯刚;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重大专项“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党的青年工作研究”(SCJJ24ZD08),项目负责人:冯刚。

作者简介:冯刚,男,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凯宗,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关乎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传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支撑,承载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深层逻辑。基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需要,近年来学者们主要从历史、实践和理论等多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进行了系列研究,为从文化视角研究党的青年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党的青年工作历史实践的研究

学界关于党的青年工作历史实践的研究,其实质是对百余年党的青年工作的经验总结与规律把握,对党的青年工作的地位、内容、方式等问题进行科学回答。一是对青年工作地位的认识,回答青年工作“为什么”重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现在、将来青年工作都是党的工作中一项战略性工作。”^[2]¹²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清晰指明了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基于此,学者们也对青年工作的战略性地位进行了深入解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视角出发,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青年工作属于经常性工作,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也具有基础性地位,其战略性是基于抓住当下、传承根脉、赢得未来的政治考量^[3]。从青年成长成才的视角出发,有学者指出青年具有积极性、社会发展生力军与需要被引领^[4]的特点,并认为发挥青年先锋力量和生力军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宝贵经验^[5]。二是对青年工作内容的认识,回答青年工作“是什么”的问题。着眼于整体性视角,学者们的研究明确了党的青年工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范围。同时,更多的学者聚焦于青年工作基本内容的具体性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从引领青年^[6]、组织青年^[7]、凝聚青年^[8]、服务青年^[9]等展开。三是对青年工作方式的总结,回答青年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运用分层分类工作方法创新开展青年工作的必要性日益突显^[10];也有学者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出推进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要遵循“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11],并且要运用系统思维整体推进党的青年工作^[12]。

(二)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理论演进的研究

学界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理论演进的研究,目的是把握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形成发展,聚焦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内容建构。对其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普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任务,对不同历史阶段和历代领导人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规律性总结。其中,对于不同历史阶段青年观的研究,侧重在对青年观的变迁特点^[13]、青年观在百年创新中的实践自觉^[14]、理论创新一般规律^[15]、青年观的现实思考^[16]的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青年观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话题。从《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17]到《论党的青年工作》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走向系统化。近些年来,青年工作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上,这些研究成果对习近平青年观的内在逻辑^[18]、理论贡献^[19]、实践指向^[20]、时代价值^[21]等内容进行了丰富阐释,对推进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指导^[22]。

(三)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需要关注文化力量

现有研究坚持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党的青年工作的本质论、发展论、

价值论、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充分阐述,深化了对党的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作为理论建构的根基、实践过程的载体,在青年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学界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主要从青年观的理论渊源^[23]等来探讨党的青年工作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元素。但从实践的角度,对文化在党的青年工作中发挥着怎样的价值和功能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此外,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深度交融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正经历着文化环境的深刻变革,他们成长于多元文化碰撞、数字技术叠加、社会转型加速的复杂图景中。这些环境的新变化对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在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中,文化不仅是精神引领的核心载体,更是推动青年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力量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24]149}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其本质要求与青年工作的文化功能发挥高度契合。因此,文化环境的深刻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的要求,共同决定了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要以筑牢青年现代化的精神根基、激发青年现代化的主体动能、培育青年现代化的现代性品格为重要内容,更加关注党的青年工作中的文化力量。

二、深入理解党的青年工作之文化维度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5]13},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青年工作是赓续文明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战略工程,其文化维度源于中国悠久历史的深厚积淀,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探索与深入实践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承、革命文化的红色赋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引领,为破解百余年青工作的难题找到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文化支撑。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青年工作的精神命脉

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基于历史文化的延续和民族基因的传承,是对传统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6]313}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百余年来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关于青年存在和青年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具象化表达,为青年工作厚植了独特的文化元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青年的德行教育,强调“立德修身”的价值准则,为教育青年厚植了“修德”的文化元素。“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强调在个人成长、处事求学、社会规范中要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特别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强调青年的成长成才要以良好的德行为基础。《大学》对青年培养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7]1}。这充分肯定了“修德”在国家培养和教育青年中的重要作用。今天,高校坚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对“修德”文化传统的继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青年的本领养成,强调“知行合一”的培养方法,为培养青年厚植了“博学”的文化元素。青年不仅要崇尚修德,还要重视本领养成。过硬的本领是青年建功立业的基本保障。《中庸》中就提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27]27}。这句话明确了从“学”到“行”整个过程的五个阶段,也是青年循序渐进成长成才的五个层次。这对中国共产党把握青年教育培养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起到了深刻的启迪作用。同时,青年也应该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王充在其名篇《论衡·实知》中提到,“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28]265}。这表明,王充承认人的才智的差别性,但他同时认为这种差别是相对的,可以通过学习来提升。无论是从青年的社会属性还是自然属性来看,青年这个阶段都是获取知识、增长才干的最佳时期。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教育青年、培育青年,为青年全面发展提供广阔舞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青年的学思践悟,强调“躬行实践”的社会意义,为造就青年厚植了“笃行”的文化元素。青年的成长成才既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也需要勤于实践。孔子指出要“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圣人只有通过躬身实践才能成为圣人;荀子强调“知之不若行之”,把躬行作为个人道德品格提升的根本落脚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青年的笃行。“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就是告诫青年,伟大的功业源于伟大的志向,完成伟大的功业需要辛勤付出。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引,突出青年工作的社会意义,把锻炼青年在社会实践中建功立业作为青年工作的重要使命。

(二)革命文化是青年工作的红色基因

革命文化上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彰显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方向的文化形态。构成革命文化的红色资源在中华大地星罗棋布,“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29]40}，“是红色基因的具象化”^[30]。“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31]708}由此看来,革命文化因其独特的理论品格、实践特征和历史经验而具有丰富的育人价值。“文化的育人价值在其生成与发展的进程中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32]革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同党的青年工作发展同频共振的,其价值也在党的青年工作的实践中得到彰显。

革命文化蕴含的理论品格指引青年工作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3]51}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本质上是被压迫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形成的集体意识觉醒。革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实践中的集体意识觉醒,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彻底的革命精神。革命文化的传播引领着青年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活动,提升着青年的思想境界,指引着青年工作要围绕革命事业的推进而展开。

革命文化蕴含的实践要求推动青年工作的使命担当。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决定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革命文化与革命斗争之间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革命斗争是革命文化生成的前提,革命文化的发展激励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青年作为社

会实践中最富有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以革命文化为滋养在近代革命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34]190}。革命文化之于青年工作的实践要求,不仅在于对革命文化本身的继承和延续,更是对其内在革命性的坚持,以革命实践推动社会进步。

革命文化蕴含的历史经验丰富青年工作的内容资源。革命文化是在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革命文化蕴含的历史经验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民族复兴的演进脉络和责任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最好营养剂”^{[35]24}。伟大事业的实现不是一时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这就需要一代代中国青年接续奋斗,深刻领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党的青年工作从革命文化中汲取丰富资源,不仅能够青年保持对革命历史的清醒认识、坚定对前进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还能够培养青年的历史自信以让青年在革命文化教育中增进文化认同。

(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青年工作的文化支撑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先进文化于解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和道义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源于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进程中,并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精神沃土,为党的青年工作提供有效文化支撑。

其一,以文化主体性建构为青年工作夯实思想基础。文化主体性是人作为文化创造者和承载者的本质属性,其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为形成前提。文化自觉的确立是主体性建构的起点,要求青年在全球化语境中理性辨识文化本源,科学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使青年能够从文明演进的高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必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现代化创新成果的有效整合,为青年提供了兼具历史纵深与时代特征的价值坐标。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这种自信并非封闭的文化排他,而是在多元文明对话中坚守根本、坚持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而形成的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核心要素,也将为青年提供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支撑,促使青年在文化比较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其二,以价值引领机制为青年发展标定目标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价值体系,其内在的真理力量构成青年价值观塑造的核心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实现价值整合。这三个层面的价值架构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生活哲学。对于青年群体而言,这种价值引领并非单向度的理论灌输,而是通过文化符号的现代诠释、文化载体的创新表达,形成具象化的价值参照系,让青年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

其三,以文明创新使命拓展青年发展的历史维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承载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这提升了青年工作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2]70} 青年既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实践主体,也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纽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为青年自觉承担文明赓续的时代责任提供了

方法论指引。这种文明自觉的培养,要求青年在时间维度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增强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在空间维度统筹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提升文明对话的话语能力;在价值维度平衡特殊性与普遍性,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这种多维度的文明参与使得青年发展突破了个体成长的局限,升华为与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有机统一的进程。

三、党的青年工作中的文化实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36]746}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凝结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青年工作的思考和认识,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与支撑。新时代新征程,要以党的青年工作文化实践为历史参照,全面总结党的青年工作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原创性的文化经验,进一步从文化视角把握党的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以文化伟力增强党的青年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在文化引领中增进青年思想认同

文化引领是文化通过其内在的价值体系、精神内核和实践导向,对社会发展、个体行为及文明演进产生方向性引导和动力性支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青年视为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通过文化引领将青年群体的思想认同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紧密结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全面增强,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创造性地运用文化工具,构建起以科学理论为根基的文化引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增进了青年对党的思想认同,更成为推动青年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进行文化引领的实践,始终根植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通过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迅速传播,中国共产党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成功将青年从传统士大夫的改良思想中解放出来。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通过《新青年》等刊物,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批判封建礼教与旧文化,引导青年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37]318}为己任。这一时期,党通过文化运动与思想批判的结合,使青年成为革命先锋,实现了从“家国情怀”到“阶级觉醒”的思想跨越。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既鼓励青年参与传统文化挖掘,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文学、革命样板戏等文化载体将劳动光荣、集体主义等价值观融入青年日常生活。例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等文艺作品以青年英雄形象塑造强化了“为国家奉献青春”的集体认同。这一阶段,党通过组织化教育与社会化实践,使青年在参与国家建设中形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的“四有新人”目标,标志着对青年的文化引领从价值灌输转向能力培养。党通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等主题活动,将精神文明建设 with 青年成长需求相结合,推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38]51}等时代精神融入青年文化。这一时期,文化引领的策略更加注重青年个体价值的实现,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为青年提供表达空间。进入新时代,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青年易于接受的理论话语,引导青年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深化青年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认识,让青年认识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增进青年的思想认同,引导他们主动投身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

党的百余年青年工作史表明,文化引领是增进青年思想认同的关键路径。从革命年代的价

值启蒙到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党始终以文化为纽带,将青年个体的精神成长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紧密结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的背景下,唯有继续深化文化引领的实践创新,才能使青年在纷繁复杂的文化激荡中站稳立场,才能在传承与创新中把青年培育成时代新人。

(二) 在文化创新中巩固青年文化主体性

文化创新通过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文化在历史传承中保持生命力、在时代变革中实现价值跃升、在全球交往中彰显主体自信,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力量。“青年在创新实践中生成文化,青年也在先进文化的滋养中成长成才。”^[39]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青工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文化创新作为巩固青年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路径。

文化创新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积淀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参与的当代实践,从根本上提升青年对文化主体性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体系深度融合,既保留文化基因的核心要义,又赋予其时代内涵。例如,将“民本思想”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逻辑,将“家国情怀”升华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使青年在理解文化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形成对当代中国价值的自觉认同。这种创新不是简单的符号挪用,而是通过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基因,使其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焕发新机。青年作为文化创新的生力军,通过参与非遗活化、古籍数字化、传统节庆创新等项目,将个体创造力注入文化传承过程,既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解码,又构建了基于历史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在此过程中,青年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诠释者与再造者,其文化主体性也在创新实践中得到历史性确证。

全球化背景下,巩固文化主体性既需要抵御外来文化的单向渗透,又需要避免封闭排他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文化创新底层逻辑,引导青年在吸收多元文化养分的同时,坚守中华文化价值内核,确保文化创新方向始终服务于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使青年在跨文化对话中既能阐释中国智慧,又能批判性借鉴外来文化精华。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文化内容审核机制、支持原创文化IP开发等举措,既为青年文化创新提供自由空间,又划定维护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边界,确保文化创新始终服务于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

以文化创新巩固青年文化主体性需要制度保障与技术赋能的共同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创新构建青年文化发展的生态系统,将文化创新纳入国家治理框架。在制度层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等文件明确将青年文化创新纳入国家战略,通过财政支持、项目孵化、人才培育等举措,为青年参与文化实践提供制度性激励。例如,建立青年创新创业基金、设立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将青年文化创新与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相结合,为个体文化实践构建结构性支撑。在技术层面,数字技术的发展重构了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青年借助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传统文化生产的时空限制,实现文化表达的自主性与多样性。例如,通过短视频创作、元宇宙场景构建等新兴形式,青年将文化创新从专业化生产转向大众化参与,既降低了文化创新的要求,又拓展了文化表达的边界。这种制度与技术的协同创新,不仅为巩固青年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更通过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激发着青年在文化创造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文化创新对文化主体性的作用,本质上是文化发展规律与主体性建构规律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引导青年参与文化创新实践,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又构建了抵御文化殖民的防御机制。这种创新实践不仅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现实根基,更通过青年群体的创造性转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在文化交流中拓宽青年国际视野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独立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之外。近代以前,世界的联系是单个的、孤立的,地理上的隔绝导致了相互之间交流的偶然性与间接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推动了世界交往变得更加紧密与频繁。文化成为沟通联系的媒介,而文化交流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3]35},为构建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党的百余年青工作发展历程中,文化交流始终是提升青年国际视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工具。中国共产党将青年群体置于文化交流的前沿,既注重传承中华文明精髓,又积极吸收全球多元文化养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国际视野拓宽路径。

在20世纪初,中国青年既是救亡图存运动的先锋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五四运动标志着青年文化视野从封闭的儒家伦理转向现代性启蒙。青年学生通过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等方式,系统译介《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将社会主义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对外话语体系。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对外交流虽受限于战争环境,但仍通过思想的双向互动拓展了国际视野。一方面,留法勤工俭学青年群体将巴黎公社经验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深化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另一方面,延安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大众哲学》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转化为通俗化的文化阐释,使抽象理论成为青年群体认识世界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青年的文化对外交流被纳入国家整体外交战略框架。通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交流等活动,青年群体成为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在此阶段,青年的文化对外交流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注重通过文艺演出、体育竞赛等形式传递政治理念。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标志着青年的文化对外交流进入转型期。随着留学潮的兴起和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青年群体逐渐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探索者,青年文化对外交流的内容与形式也呈现多元化发展。例如,这一时期共青团中央发起“希望工程”国际交流项目,通过资助贫困地区儿童入学吸引海外华人关注;高校青年学者借助国际学术会议平台,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同时,青年文化对外交流的内容开始突破意识形态限制,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的双向互动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青年的文化对外交流被提升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对此,共青团中央实施的“青年全球治理能力培养计划”“中外青年人文交流论坛”等项目,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网络。青年群体通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等议题,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不同文明形态的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46},为青年文化对外交流提供了新的行动纲领。

党的百余年青工作中的文化交流实践,实现了青年个体成长与国家战略需求的深度耦合。这种实践既坚守了文化自信的根基,又展现了开放包容的胸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青年群体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四、以文化力量深化拓展党的青年工作的路径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文化引领的作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青年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扎根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的整合、创新、沟通功能,深化拓展青年工作的文化路径,更好推进党的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 发挥文化整合功能,夯实青年工作体系根基

新时代新征程,深化拓展党的青年工作,既需要理念创新,更需要依托文化整合功能的系统性发挥。文化作为社会运行的深层纽带,其整合功能体现在对物质基础、制度框架与精神价值的统筹协调中。当前面对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与文化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既对传统青年工作体系构成挑战,也为文化融合功能的深化拓展提供了历史机遇。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通过文化要素的系统化融合与创造性转化,构建更具历史纵深感与时代适应性的青年工作体系根基。

物质文化作为文化整合的具象化呈现,是青年工作体系运行的基础。它既包括青年活动场所、数字平台等实体空间,也涵盖资金支持、技术设备等资源网络。在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中,物质文化的构建需要突破传统的“硬件堆砌”思维,转向“场景化赋能”与“资源生态化”发展。在教育领域,推进教育资源数字化共享平台建设,依托“青年大学习”等品牌项目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配置;在就业创业领域,打造“青年驿站”“创客空间”等实体载体,将政策扶持转化为可感知的创业支持网络;在生活服务领域,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通过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青年中心等空间营造,使青年在物质生活改善中增强对社会的归属感。当青年在这种场景中参与活动时,物质环境本身即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这种“环境育人”功能能够让青年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组织文化的认知内化。因此,物质文化整合需注重空间设计的文化意蕴。例如,在青年之家建设中融入地域文化元素,在数字平台界面设计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物质载体成为文化认同的具象化表达。

制度文化作为文化整合的规则体系,为青年工作提供了准则。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工作中形成的制度文化,既包含党团组织建设和青年权益保障等刚性制度,也涵盖价值引导、行为激励等柔性机制。制度文化的整合功能在于通过规则体系的优化重构,实现青年工作各要素的协同发展。一方面,要求制度设计既体现价值导向,又符合青年发展规律。例如,将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表现纳入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制度性激励引导青年投身志愿服务;建立青年发展型城市评价指标,将制度文化与城市治理创新相结合。这种制度文化的整合创新,使青年工作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赋能,在规范青年行为的同时释放其创造力。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如建立青年议事厅、青年立法联系点等,使制度体系既成为青年权益的保障网,又转化为青年社会参与的实践场域。这种制度文化的创新,既延续了党密切联系青年的优良传统,又适应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为青年工作注入持久制度活力。

精神文化作为文化整合的灵魂,为青年工作提供思想方向。它并非简单的价值宣导或文化符号堆砌,而是通过激活文化深层的价值共振,塑造青年群体的精神世界,使其在时代洪流中确

立价值坐标、校准人生航向。这种引领既体现为价值观念的传承创新,也表现为意义系统的建构传播,其深层意义在于构建青年与中华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脉搏、与个体生命价值之间的精神纽带,从而为青年工作注入持久而深沉的力量。一是在历史维度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的传承需要创新表达方式。通过建设“数字红色展馆”、开发“重走长征路”VR体验项目,将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转化为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在校园文化中推进“行走的思政课”,组织青年在乡村振兴一线、科技创新前沿开展实践研学,使抽象理论具象为生动实践。二是在现实维度传播主流价值。通过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将主流价值寓于青年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把理论话语转化为网络文学的叙事逻辑,当政策解读融入短视频的视听语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就获得了文化亲和力。这种整合本质是对文化领导权的创造性巩固,从而实现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柔性教育。

(二)发挥文化创新功能,强化青年工作场景体验

文化创新与青年成长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动关系。青年作为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群体,既是文化传承的接受者,更是文化变革的推动者。从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思潮的激荡,到改革开放后流行文化的兴起,再到数字时代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青年始终站在文化创新的前沿。这种创新活力不仅源于青年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知,更根植于其对社会变革的深层参与需求。新时代新征程,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与科技革命的加速,青年群体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交互化、体验化的新特征。如何通过文化创新重构青年工作的场景体验,成为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命题。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相互影响、深刻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其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40]文化创新不仅是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纽带,更是激活青年主体性、增强价值认同的关键路径。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创新功能,构建沉浸式、参与式、创造性的文化场景,让青年工作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在思想引领、价值塑造、实践养成中实现更深层次的渗透与共鸣。当前,青年对文化场景的期待已超越简单的信息接收,转而追求更具情感共鸣、价值认同与实践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这种转变要求青年工作必须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从静态传播转向动态共创,通过文化场景的再造与升级,构建符合青年认知习惯与情感需求的表达方式。以文化创新强化青年工作的场景体验,本质上是通过构建具有时代特征、青年特质的文化场域,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交互的具象化实践,使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精神共鸣与价值认同。

一方面,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文化场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催生了新的教育载体,青年群体接受新兴事物的速度很快,所以要不断结合时代特色^[41],形成贴合青年实际的文化创新场景。“科技的进步使内容创意得以转化为可体验的现实。”^[42]以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空间为例,传统的展陈方式往往局限于文物陈列与文字解说,难以激发青年的深层参与。而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手段,历史场景得以数字化复现,青年得以穿越时空与文物对话,文化记忆可以在交互体验中转化为精神力量。同时,二次元文化、国潮艺术、剧本杀等新兴文化形态的兴起,反映了青年群体对个性化、社群化文化体验的强烈需求。青年工作若能将主流价值融入这些文化载体,将有利于实现“润物无声”的价值引导。例如,将红色文化元素植入剧本杀剧情设计,通过角色扮演与任务闯关,让青年在解谜探案中感悟革命精神;或借助虚拟偶像、

AI 绘画等数字艺术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青年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这种创新不是对技术工具的简单挪用,而是基于青年文化心理的深层把握,在文化解码与编码中实现价值传递的效能跃升。

另一方面,打造可持续的文化创新生态。文化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青年主体性在文化场域中的觉醒与增强过程。当代青年不再满足于作为文化符号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以创造者、诠释者、传播者的多重身份深度参与文化场景的建构与重塑。这种主体性觉醒既源于代际文化自觉的升华,同时也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逻辑的时代要求,需要制度性保障与平台化支撑。例如,共青团组织可以依托构建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实践,通过建设文创孵化基地、设立文化创新基因、举办青年文化节等举措,打通产学研链条,将青年创意转化为可落地的文化产品,为青年参与文化场景建构提供制度性支持。同时,打通“创作—传播—消费”的全链条文化创新生态,深挖文化 IP 的精神内核,按照青年审美趋势进行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视觉包装,而是通过叙事重构、媒介融合、跨界联动等策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实现意义再生。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文化创新强化党的青年工作的场景体验,要在虚实交织的体验场域中构建起新型育人空间,打造可持续的文化创新生态。这种创新不是对文化基因的解构消解,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实现精神密码的现代表达,是深化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必由之路。

(三) 发挥文化沟通功能,提升青年工作开放格局

在全球化浪潮与数字文明交织的当代语境下,文化沟通已成为重构国际关系、增进文明互鉴的重要力量。青年是文化交流互鉴的先锋,对新事物有着更强的理解力,对广阔天地有着更强的探索欲望与热情,是发挥文化沟通功能的重要一环。深化拓展青年工作的文化路径,尤其需要以文化交流为突破口,构建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青年工作格局,这既是传承中华文明基因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文化沟通功能的有效发挥,能够打破青年群体中的认知壁垒,促进价值共识的形成,同时通过文化创新与传播增强青年工作的辐射力与感召力。当前,青年群体的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化,国际视野不断拓展,传统单向度的青年工作格局已难以满足时代要求。因此,要从文化对话、文化叙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切入,将文化沟通转化为提升青年工作开放格局的深层动力。

其一,构建文化对话平台。文化对话平台的构建需突破传统单向传播模式,形成多维度、立体化的交互网络。在物理空间层面,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国际青年交流基地建设,通过联合办学、学术互访、艺术驻留等项目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例如依托高校智库搭建跨文化研究平台,组织中外青年学者围绕气候变化、数字治理等全球议题开展联合研究,将学术对话转化为政策建议。在虚拟空间层面,可以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去中心化”的文化交流数据库,整合非遗技艺、历史文献、当代艺术等数字资源,开发沉浸式文化体验系统,使不同文明基因在数字时空中实现可视化对话。其二,创新文化叙事策略。文化叙事策略的创新核心在于构建青年话语体系,实现从官方话语向青年话语的创造性转化,让文化叙事替代灌输式传播。因此,在内容维度,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译机制,将典籍中的哲学思想转化为青年可感知的生活美学;在载体维度,打造虚实融合的文化体验场景,运用 AR 技术复原历史场景,通过元宇宙空间构建跨文化共情场域。其三,培育文化外交主体。青年工作要不断审视和确证“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异,努力把青年培养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例如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青年国际交流项目,通过文化互鉴增强国际话语权。完善青年文化使者培养体系,建立跨国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智库,培育兼具文化素养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共青团组织在此过程中应发挥枢纽作用,既要搭建类似“国际青年文明互鉴对话会”的高端平台,也要深耕社区文化驿站、校园文化节等基层触点,形成全域覆盖的文化交流网络。

文化沟通功能的有效发挥,本质上是文明互鉴的系统工程,是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青年对外交往的硬支撑。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通过机制创新实现文化资源向外交效能的创造性转化。当青年群体真正成为文化对话的主动建构者、文化叙事的创新引领者、文化外交的实践推动者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将在代际传承中愈发坚韧,青年工作的开放格局也将获得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与价值支撑。

五、结语

党的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承载着赓续中华文脉、培育时代新人的战略使命。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青年置于文化育人的深厚土壤中,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革命文化的淬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育人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精神养分,更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实践表明,充分发挥文化的育人价值和实践功能,是做好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内容,其中形成的青年工作文化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并深化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与数字文明交织的当下,“世界文化激荡展现新的态势”^[30],对青年和青年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年群体既是多元文化的体验者,也是文明互鉴的推动者;既有扎根传统的文化自觉,又怀揣面向世界的胸怀。深化党的青年工作的文化路径,既是赓续中华文脉的内在要求,更是应对时代挑战的战略选择。基于此提出的文化整合、创新、沟通的深化拓展路径,是对文化育人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探索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供了实践指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引领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应运而生、顺势而成。“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43],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化拓展青年工作文化路径,推动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增强青年工作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3] 胡献忠.党的青年工作战略性意义的多维度观察[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4):31-37.
- [4] 胡德庆,吴激.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百年经验、时代任务与方法创新[J].当代青年研究,2022(1):12-18.
- [5] 王宝鑫.习近平关于“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0):51-56.

- [6] 黄蓉生,刘涛. 中国共产党引领青年成为先锋力量的百年发展回溯与启示[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2(5): 127-133.
- [7] 王冬梅.“党管青年”的政治内涵、理论贡献与时代意义[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3):1-9.
- [8] 米占民,陈旭. 党的理想信念凝聚青年的价值意蕴、历史演进与实践要旨[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6):62-70.
- [9] 孙鹏. 共青团服务青年的方式方法研究:理论、形态与发展[J]. 中国青年研究,2020(4):5-12.
- [10] 张会杰. 在党的青年工作中运用分层分类工作方法的内在逻辑、功能价值与行动原则[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5):38-46.
- [11] 董大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内在逻辑[J]. 理论视野,2024(6):39-44.
- [12] 郑敬斌. 以系统思维推进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J]. 人民论坛,2023(10):102-106.
- [13] 张晓红,彭兴伟.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重心的变迁历程及其启示[J]. 青年探索,2021(5):38-45.
- [14] 郭宝付. 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百年创新的主体自觉[J]. 学术探索,2021(10):150-156.
- [15] 杨怀川.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党的青年工作理论创新史研究[J]. 青年发展论坛,2024(5):68-77.
- [16] 李源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发展历程与现实思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6):73-75.
- [17] 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 [18] 李兰. 新时代青年理想人格的时代意蕴、价值追求与培育路径[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19-25.
- [19] 艾楚君. 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8):108-117.
- [20] 匡列辉. 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要义与实践指引[J]. 甘肃社会科学,2022(5):1-9.
- [21] 艾楚君,陈佳. 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1-18.
- [22] 马振清.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探析[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59-72.
- [23] 王慧娟. 习近平青年观的理论渊源[J]. 当代青年研究,2019(1):20-25.
- [24]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7] 罗安宪. 大学·中庸[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8] 《中国哲学史》编写组. 中国哲学史: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9]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
- [30] 刘晓玲,徐悦. 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文化基因[J]. 思想教育研究,2025(1):98-102.
- [3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2] 冯刚.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育人价值[J]. 思想教育研究,2025(1):91-97.
-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4]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5]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3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37] 李大钊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9] 王振. 巩固新时代青年工作中的文化主体性[J]. 思想教育研究,2025(1):103-108.
- [40] 燕连福,杨进福.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标、原则与进路[J]. 探索,2025(2):1-16.

- [41] 王瑕莉,朱逸. 中国共青团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25-34.
- [42] 王林生. “北京中轴线”超级IP的文化价值及其路径转化研究[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2):46-54.
- [43] 冯颜利.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蕴[J]. 探索, 2024(1):1-12.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 of Enhancing the Cultural Power of the CPC's Youth Work

FENG Gang^{1,2}, WANG Kaizong¹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youth work is not only a social practice activity but also a cultural phenomenon, embodying profound cultural power. Examining the Party's youth work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s not only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value concern but also a profound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youth, youth work, and culture. To clarify the cultural logic of youth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understand its inherent cultural dimensions.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hinese culture, containing ideological concepts, red resources, and moral norms that provide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Party's youth work. They are the spiritual lifeline, red genes, and cultural support of the Party's youth work, collectively constituting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the Party's youth work. To reveal the cultural code behi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Party's youth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summarize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created in its practice.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the CPC has fully leverage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culture, forming cultural experiences in youth work that enhance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mong youth through cultural guidance,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youth through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youth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new journey, youth work is a fundamental and strategic project for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and rejuvenating the nation. To deepen and expand the cultural path of the Party's youth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youth work, build on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accumulated ove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f youth work, and fully leverage the integrating, innovative,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culture to promote youth work in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its system, enhancing scene experience, and expanding the open pattern, further enhancing the cultural power of the Party's youth work.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s youth work, 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power

责任编辑:陈卓

引用格式:徐昇,张志勇.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精神富有的理与路[J].探索,2025(3):144-156.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精神富有的理与路

徐昇,张志勇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重庆 400041)

摘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促进人的精神富有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从客观条件上看,精神富有需要富足的物质生活作为基础、和谐的社会关系作为条件、繁荣的文化事业作为支撑。从内生结构上看,精神富有源于超越现实的理想信念、具备重构历史的文化观念、拥有改变世界的内在动力。在普遍形态上,精神富有表现为让精神有所归属并始终充满活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富有在整个社会层面表现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落实到个体层面表现为具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精神富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以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一条现代化新路的崇高追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驱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精神富有,就是要在处理好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社会导向与个人取向、社会发展与精神实现等关系的基础上,为美好生活提供远大理想、价值观念、实践动力。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彰显强大精神动力。以实现精神富有为牵引,中国式现代化将书写出物的全面丰富、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与精神的自由发展协同共进的现代化新篇章。

关键词:精神富有;中国式现代化;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实践动力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5)03-0144-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1]21} 中华民族历来把人的精神追求纳入人生与社会理想之中,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来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通篇使用“精神”一词 42 次之多,可见党中央对精神问题的重视与关切;又明确将“精神富有”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标志着党对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关系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迈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需要我们认清精神富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作用,系统分析精神富有的条件结构与呈现样态,阐明实现精神富有的实践遵循,从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精神富有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精神维度自从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与要求之中,就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研究”(24AZX001),项目负责人:张志勇。

作者简介:徐昇,男,博士,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张志勇(通讯作者),男,博士,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学者们围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富有”“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等关键词,多维度地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图谱,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通过对既有成果的分析,依然能够找到继续深入研究“精神富有”的必要性与突破口。

其一,学界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上,而对“精神富有”的关注度较低。目前,学者们已经围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来源与历史演进^[2]、本质规定与内在结构^[3]、时代意涵与价值遵循^[4]、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5]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相比之下,对于“精神富有”的关注则明显不足。实际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针对的是精神上的两极分化问题,而“精神富有”针对的是物质富裕但精神贫乏的现象,两者所指不同、作用各异。“共同富裕”因为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受到更多的关注也理所当然,但不能因此忽略对“精神富有”的研究。精神富有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前提,每个人的精神富有是所有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条件,剖析精神富有的条件、结构、样态与实现路径应该成为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

其二,既有成果在“精神富有”的价值意义方面研究得比较深入,共识度较高,而对于“精神富有”的内涵结构与应然样态方面着墨较少,共识度较低。关于精神富有的价值意义,有学者指出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之思、应然之知、当然之行^[6];多数学者认同实现全体人民精神富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必然,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破题之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征^[7]。关于精神富有的构成要素与呈现样态,有学者从消费性、建设性、创造性的内容维度和现实性、发展性、价值性的动力维度两方面搭建起精神富有的“坐标系”,并以和而不同、永无止境作为精神富有的未来样态^[8];有学者以知识富有、情感富足、心理安康、信仰安定说明精神富有内容,以自立之精神、健康之思想、高尚之德性刻画精神富有样态^[9]。

其三,既有成果在“精神富有”内涵结构以及实现路径的讨论上,存在全面性有余而重点不突出的情况。例如,学者们往往是从夯实物质文明基础、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加强舆论引导中的多个乃至全部去阐明精神富有的实现路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精神曾被马克思称作“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10]^[11],自然需要在全面系统的部署中去实现。不过,精神不但具有丰富性,也具有一贯性,有其一以贯之的纲领可供提挈。因此,思考精神富有的实现路径既要注重整体推进,也要注重抓住重点、纲举目张。有学者试图将重点放在全民教育上^[11],但教育的内容仍显过于宽泛,尚需进一步凝练。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富有话题的研究,在其内涵结构与呈现样态方面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其实践路径方面还有突出重点的必要。特别是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抓住精神活动的特质,并将其贯穿到对于精神富有条件结构、呈现样态和实现路径的讨论之中,使得对于精神富有的分析既兼顾全面又突出重点,仍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二、精神富有的必要条件、内生结构与呈现样态

理论上的清醒有助于实践上的自觉。明晰精神富有的依赖条件,才能不断推动解决精神发展与外部条件限制的矛盾,夯实精神富有的客观基础;明晰精神富有的内生结构,才能不断深化其内涵建构,引导个体的精神成长;明晰精神富有的呈现样态,才能推进精神富有的层级跃升,更为主动地发挥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突破了以往精神研究中存在的内向性、封闭性倾向,引

入了实践维度和唯物史观,将精神置于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并在社会历史总体性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对其加以阐明,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精神富有的条件、结构与样态的根本遵循。

(一)精神富有的必要条件

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身受用、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精神修养论,也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强调精神自由、追求主客体统一的精神实现论,马克思主义开辟的精神研究道路,是强调客观现实、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解放论。它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影响精神发展的现实梗阻上,通过改变不合理的现实条件为人类走向精神解放铺平道路。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精神富有,首先就要了解精神富有所需的必要条件。

其一,精神富有需要富足的物质生活作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精神是人脑的机能和产物,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思维、意志、情感等意识活动乃至无意识活动的总称。“‘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12]533}精神活动是从物质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的形式相对独立的活动,虽然具有极大的能动性,但不可能真正脱离物质生活的制约。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286}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基本方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人的其他一切生活方式。精神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物质需要的满足,精神生活贫困是物质生活贫困的直接后果和人文表征^[13]。只有在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才可能出现真正的精神富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14]15}。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精神富有,不再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5]85}的“安贫乐道”,而是建立在富足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人民对于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

其二,精神富有需要和谐的社会关系作为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6]459}人的精神生活同样是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条件的,甚至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加依赖社会关系,因为作为精神生活中介的语言符号本身就是社会交往的产物。社会关系是有结构的,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构成了人们精神交往关系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12]538}。精神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不是感到自由、快乐和光明,反而由于无法在对象化活动中汲取使自身再次对象化的动力,变得日益萎靡、消沉、物化。因此,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建设更加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关系,是摆脱现代性精神困境、促进人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出共享发展,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有效调动了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精神富有持续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其三,精神富有需要繁荣的文化事业作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17]261} 精神富有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滋养下才可能发展起来。提高精神文明程度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建设也是提高精神文明程度的主要途径。正是基于两者共生共存的关系,“精神”与“文化”往往并提,称之为“精神文化生活”。对于精神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深刻把握,不但在根本上不同于将精神生活理解为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宗教活动这种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而且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砍柴担水无非妙道”式的精神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其“世俗性”,即“人们超出日常生活的‘精神性’需要之满足,是通过如此‘世俗性’的文化活动来表达的”^{[18]12}。这种日常生活融于其中的精神生活方式,也更加契合于现代化的世俗性特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但“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19]69}。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为人们实现精神富有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精神富有的内生结构

在客观条件基本具备的前提下,实现精神富有还需要个体化精神的内在生成。对于精神内在结构的考察,马克思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对精神整体性、自足性的强调,也不同于西方传统所做的静态分析,如将精神划分为理智、情感、欲望或者知、情、意等结构,而是着重刻画出精神伴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所呈现出的层次性。一是受动性维度,包括具有明显受动性的感觉、意识、观念等感性因素和认知性因素;二是能动性维度,包括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能动反作用的目的、意志、激情、觉悟等动力性因素;三是超越性维度,包括源于实践而又批判和超越现实的“自由的精神生产”“自由个性”等理想性因素^[20]。相应地,精神富有要求内在结构上的合理性,即以超越性维度的理想信念为牵引,贯穿和调动精神中的认知性因素和动力性因素,使之为实现理想而服务。

其一,精神富有源于超越现实的理想信念。人总是现实存在的人,但现实的人又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现实,总是希望不断把现实变成人的理想中的现实。人的生活的理想性体现在意识活动中,就是人的意识基于现实构成理想中的世界图景。理想性、超越性是精神的本质特征,但理想不是空想、幻想、妄想,而是人的头脑对现实的一切社会关系进行观念化的最高产物。马克思主义要求从精神生成的现实性根源和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特征两个方面去理解精神世界的理想性。一方面,理想凝聚在实践主体的目的性要求中,是超越现实的观念性存在;另一方面,实践主体的目的要想得以实现,这个目的本身就必须积淀着关于现实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合理的理想总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引申出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本质规定的超越性精神追求”^[21]。总之,富有的精神能够以理想引导现实、以现实规范理想,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其二,精神富有具备重构历史的文化观念。人的理想不是封闭的、孤立的精神活动的结果,而是以历史文化为材料和依托。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2]470-471} 这些作为实践前提的条件,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

的传承构成了人的历史的真实内涵。人无法离开文化世界而存在,“人类的超越意识所获得的现实性,就是人类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神话的世界、宗教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和哲学的世界”^{[23]57}。一方面,人以文化世界为中介与历史、他人乃至自我相互理解,获得知识、观念并逐步形成人格中深层的和稳定的信念系统,充实和升华着内在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人又以文化为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价值观念,并通过精神的现实化重构文化世界。总之,精神植根于文化世界,具有历史性,富有的精神总是以文化世界的丰富为内容和表现的。

其三,精神富有拥有改变世界的内在动力。精神活动构建出理想世界,遨游于文化世界,目的是让生活具有意义、让生活过得更好。过有意义的生活,是生活本身的目的;求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是人的精神家园的灵魂。但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生活的意义不是现成的,只能在人追寻意义的实践活动中显示出来。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人们需要调动目的、想象、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在实践中把生存变成有追求、有向往的生活,把世界变成人们所憧憬的理想的世界。生命的意义以及意志、情感等能动性因素都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及其结果中得以逐步体现出来。追寻人生意义的过程就是精神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也是将与自身理想不相符合的现实改变为理想性的现实的过程。追寻人生意义的精神活动和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精神总会为了实现自身而创造出价值世界,具有实践性。富有的精神能够调动内在能动性因素,不断为人创造生活的意义、为超越现有的生活提供不竭动力,使现实生活变得对人来说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三)精神富有的呈现样态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富有,既有精神富有的普遍形态,也有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就普遍形态而言,精神富有表现为可以持续为生活提供理想、信念、动能等养料,以激活、支撑、延续精神,让精神有所归属并始终充满活力。中国人常用“心”指人的精神,精神富有状态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安心乐业”。心安与否,要在生活中体现。精神世界形成于感性实践并通过感性实践显现自身,因此,人的感性实践过程与结果就是辨别精神世界真实与虚幻、评价精神富有与贫乏的根本标准。从外化结果上看,精神富有的基础形态是生有可恋、热爱生活,不会抑郁、不想自杀。生活不易,让人觉得生活值得过,需要精神世界立足于现实持续提供生活的信念和未来的希望。精神富有的理想形态则是实现个性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在化理想为现实的过程中使自身的知、意、情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使现实变成更加符合人的需要的真、善、美的世界,并在这个现实化了的理想世界中获得“自作主宰”的精神自由。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富有在整个社会层面表现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其中,“人民有信仰”是基础和前提。信仰是人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对于生命价值的终极确认和对人生意义的根本领会,是人的理想信念的终极支撑。“信仰的根据就在于人性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或整体之中”^[24],面对本无确定意义的生命,人需要通过信仰来获得确定性支撑,来照亮生活、安身立命,从而实现自我理解、自我塑造,为生命提供进一步展开的动力。信仰也是有好有坏的,就好的信仰而言,其对象必然是现实的而非虚构的,其目标必然是改造实践而非精神寄托,其方式必然是行动指南而非盲从迷信,其结果必然是“为了人”而非“奴役人”。好的信仰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马克思主义作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规律”的

科学理论,在“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道路”^{[25]7-8}的同时也为人民确立了科学的信仰。“人民有信仰”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26],信仰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精神世界中的主导力量,成为人做出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的终极依据。通过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来激励自己、淬炼思想、凝聚人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信仰伟力的最好证明。同时,这种科学信仰的内生实践力量使得信仰不再是属于“彼岸世界”的憧憬,而成为属于“此岸世界”的现实。这又进一步激发人们敢于有梦想,愿意为梦想而奋斗。整个社会的精神富有状态,就表现为科学信仰的明灯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进而凝聚民族意志、激发中国力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富有落实到个体层面表现为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中,获得感是人民群众通过劳动获得的实在利益与其预期的劳动价值相统一后的主观感受;幸福感是人民群众对自身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的生活状态的总体性、肯定性评价;“安全感是一种在信任和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对内外环境安全的主观体认”^{[27]128}。从精神层面上看,安全感让人“放心”。“放心”意味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安全有保障,也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安全有保障。只有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都有保障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将精神集中于干事创业、创造价值、实现自我。获得感让人“顺心”,通过实现劳有所得、多劳多得,使人们敢于有梦想,愿意为梦想而奋斗,并觉得为梦想而奋斗的过程有体面、有尊严。幸福感让人“舒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28]241}。幸福感是对安全感和获得感的体认与升华,拥有幸福感的人,不会整天为琐事而“烦心”、为缺吃少穿而“伤心”、为人际关系而“闹心”,而是觉得事业有奔头、生活有趣味、未来有希望。“放心”“顺心”“舒心”最终让人“安心乐业”,这是为理想而努力奋斗着的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精神富有的最好体现。

三、精神富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29]1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30]111} 精神富有何以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需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价值追求和内生动力三个方面予以阐明。

(一)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

人的精神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还是社会发展的集中反映,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之所以要改变世界,促进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通过改变现有的生活状况,更好地发展和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就体现在能够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与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告诉我们:“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501} 这里所说的“总和”,不是一种“数学的”“力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化学的”化合反应,“总和”的过程就是一切现实的社会关系在实践中生成人的具体本质的过程。这种“化合”过程产生了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其中,“精神是现实的一切社会关系‘化合’出的最高产物”^[31]。人的本质就是以精神性为核心的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相互交

织、有机结合而成的特性统一体。实现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是有层次的,社会的发展只有在基本满足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需要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满足人的精神自由发展的需要。因此,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包括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在内的本质的全面发展,而人的精神发展状况因其在人的本质中的最高的、核心的地位,成为集中体现和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识。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内在要求实现人的精神富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尽管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的发展,但真正自觉地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自身发展的目标和纲领,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30]71},且“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32]420}。这里所说的“人”,是文化的人而非“物化”的人,是全面的人而非“单向度”的人;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也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裕,还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精神生活的充实。人需要从劳动活动的全面性和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中获取自身发展的全面性,没有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没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就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没有实现以精神发展为标志的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道路就将偏离其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实现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达成其最终目标并彰显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要求。

(二) 走出现代化新路的崇高追求

物质主义膨胀而精神相对贫乏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痼疾。现代化发轫于西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人的全面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30]111-112}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催生的结果,也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33]269}资本的逻辑就是价值增殖的逻辑。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交换价值支配着一切,包括精神活动在内的万事万物都要服从商品化、效率化原则,以便服务于资本的无限增殖。资本的统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2]34},人的丰富的、全面的关系都被单一的物的关系所取代。资本迫使精神生产的主体将“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33]469},精神生产的时间一再受到挤压;资本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使得精神生产的产品与真正的精神生产者相分离,从而把精神生产活动也异化为了单纯谋财谋生的物质活动;资本统治下的数字技术以其强大的生产与推广能力进一步导致了精神享用的封闭化与失控化^[34];资本主导的文化工业不但消解了思想文化的崇高性、深刻性,也使得人们的精神需要变得单一化、被动化。资本逻辑对生活的统治最终造成一面是庞大的物质财富的堆积;一面是人们在心理生活上的焦躁不安、患得患失,在伦理生活中的信任危机、道德失范,在文化生活中的单调平庸、审美低俗,在信仰生活中的信仰虚空、意义消解的现代性危机。

实现精神富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要打破西方式现代化的诸多迷思,避免陷入物质主义膨胀而精神相对贫乏的现代性困境,就需要从根本

上转变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摒弃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让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同样富足的现代化新路。实现精神富有是这条现代化新路使人不受资本的统治并反过来使资本服务于人的有力体现。这种变革不仅意味着对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包括精神贫乏在内的诸多表象问题的克服,更意味着对现象背后的诸如资本与劳动、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等一系列根本性矛盾的化解,其实质是一场推动人类发展阶段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5]⁵² 迈进的社会革命。因此,实现精神富有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将推动整个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崇高追求。

(三) 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内驱动力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的结果。人的社会实践使世界二重化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物质的、可感知的世界,主观世界是人的头脑反映和把握物质世界的精神活动的总和。在实践中,两个世界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相互促进、不可偏废。在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出现过片面夸大精神理想的作用、盲目崇信“精神变物质”、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的现象;也出现过片面强调和夸大物质利益驱动的作用、忽视理想信念与思想道德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物质文明精神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7]¹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方面,要坚持物质文明的基础性作用,以物的全面丰富厚植精神富有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精神文化能动的反作用,让精神文化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36]¹⁴⁹,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人民的高品质生活,从而在整体上“形成‘发展—生活—精神力量—更高质量发展、更高品质生活’的辩证运动”^[37]。

精神富有体现着人民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和斗争进取的主动精神,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具体而言,精神富有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它以科学思想指导人们自觉建构起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关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精神富有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实践动力,它能够在顺境中鼓舞人们的干劲,增强人们的信心和力量;在逆境中唤起人们的斗志,促使人们自强不息。精神富有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它以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将观念内化于社会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创新的机制。精神富有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凝聚力量,它汇聚起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理想追求,形成较强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从而将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动员起来,共同推动民族复兴伟业。可以说,精神富有不仅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表现,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驱动力。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富有的实现路径

实现精神富有既要在主观世界中构建起充实合理的精神家园,为生活提供远大理想、观念

支撑、精神动力,又要在客观世界中解决那些影响或可能影响精神发展的现实梗阻,确保精神照进现实的道路畅通。从现实性上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精神富有,就是要在处理好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社会导向与个人取向、社会发展和精神实现等关系的基础上,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起以理想信念为目标、指引,以价值观念为骨架、坐标,以实践动力为能量、保障,且三者有机联结、动态互构的精神体系,进而在不断化理想为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把握历史主动。

(一)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

一方面,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理想信念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建设精神家园、实现精神富有,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以理想信念为灵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个人一旦明确了干事创业的目标与方向,精神就不会萎靡,人生就不会沦为平庸。同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同心同德奋发前进,也必须以共同的理想信念为支撑。古人的精神修养论,常以“立志”为首要工夫,强调“先立乎其大”,志立则有根本。必立志,然后能自拔于流俗;必立志,然后他事不足以相夺;必立志,然后进学无间断^{[38]38-39}。习近平总书记将理想信念视作“精神之基”,正如他所指出的,“培养时代新人,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这个理想信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坚定自信”^{[1]166}。共产主义信仰既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所必须坚持的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上,既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映,也是立足现实社会而对人类未来的合理推论。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学、思、践、悟的过程,只有彻底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才能确立和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需要发挥典型事例、榜样示范的作用,善于向革命先烈的光荣事迹学习,增进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需要党员干部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群众观,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在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出对理想的坚守和追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他人。

另一方面,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眼前所做的事与共产主义信仰联系在一起。”^{[39]57}对于现实的个人而言,只有把远大理想渗透到现实的生活中,和眼下正在做的事情融为一体,才能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真切的感受和牢固的认同,才能真正发挥出远大理想改变现实的精神伟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渝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29]83}可以说,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目前最大的现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当下最需要做的事。此外,即便是做好当下符合现实需要的事,也要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指引下进行。有没有崇高理想的指引,实践的结果会大不一样,精神境界更是大不相同。在新时代,以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境界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工作,就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体现其立场观点方法的“六个必须坚持”涵养出站得正、立得直、行得稳、谋得实、想得全、看得远的理想人格,从而确保当下所做工作都一步一步地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同时成为实现精神自由解放的事业。

(二) 锤炼价值观念,赓续精神血脉

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观念是理想的支撑,崇高的价值理想以丰富的价值观念为血肉。文化道路是个体形成价值观念的根基和土壤,个体价值观念的发展变革又促进文化的发展变革。因此,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是构建富有的精神世界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40]3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文化沃土、智慧结晶;革命文化为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红色血脉、精神气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立足于当下实践又汲取了前两种文化的丰厚滋养,为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科学指引、以中国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动力。三种文化熔铸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实现人民精神富有的文化沃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坚持守正创新,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41],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秉持开放包容,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社会价值导向与个人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是任何一个社会在价值体系中都会遇到的一对基本矛盾。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的价值导向,矛盾的次要方面是个人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个人价值取向的内容具有社会性,“个人的价值取向的总体趋向,总取决于社会的基本价值导向”^{[23]47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它所昭示的前进方向契合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景”^{[17]120},因而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凝聚力。在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的今天,要整合利益诉求、凝聚社会共识,就需要以能够最大程度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个人行动准则和社会行为规范指引,并通过构建系统的、合理的培育践行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建设之中,为构建精神世界奠定共同价值观念。

(三) 投身伟大实践,迸发精神动力

一方面,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普遍出现的精神需要与困顿,从根本上说都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速度和成就让世界所瞩目与惊叹。伴随这种高速发展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和结构性转型。这种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带来的是思想的大活跃、观念的大碰撞、文化的大交融,也造成中国人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上呈现出理智、主动与浮躁、焦虑并存的明显两极化特质。同时,“当代中国的社会力量博弈,就是围绕资源占有、财富生产和利益分配,资本的增殖力、知识分子的思想力和大众的劳动力等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和互相影响”^[42]。博弈中,有人得利就难免有人利益受损。当自身发展一帆风顺、自身利益得到保障时,精神上就有“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快慰,当自身利益一时受损或发展受限时,便顿生“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惆怅,这是人之常情。面对由社会加速转型、矛盾叠加、竞争加剧所引发的人们心理的纠结感、价值的失落感、精神的空虚感,不能盲目否定发展本身,而是既需要提升“乐天知命故不忧”的精神调节能力,更需要以现实的高质量发展

继续推动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9]23}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还要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解决。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既不能走“颜回之乐”的精神自足之路，也不能走“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逃避现实之路，而是需要与创造更加美好的现实生活中同步进行。

另一方面，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彰显强大精神动力。在现实中实现理想是对精神动力的最好激发。实现理想是精神动力的源泉，精神动力是实现理想的引擎，两者统一在化理想为现实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2]500} 实践是精神主体和现实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个人精神在适应和学习现实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又在利用和改造现实的过程中自我价值实现出来，从而获得满足。在今天，要实现精神上的富有，就应当主动投身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实践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改造世界，以理想指引行动，以行动积累成果，以成果验证意义，以意义反哺动力，在事业奋斗中彰显精神力量，不断在实现理想的奋斗过程中收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就是说，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创造物质财富、改造社会关系、发展文化事业，打造更适合于精神发展的客观条件；也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一步步地提升精神生产的自由度。精神力量的发挥虽然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但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不能一味等待客观条件的到来，而是应该通过积极地发挥精神的自主能动性和自由创造性，创造出精神富有所需要的条件，并在创造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精神富有。

五、结语

理想性是精神生活的本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人的精神世界需要保持的必要张力。实现精神富有需要在清醒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坚守积极的理想主义。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2]525} 我们不能离开客观物质世界的牵绊来谈精神理想的实现，精神的实现逻辑与精神的解放逻辑向来是同一条道路的两个不同侧面。因此，分析精神现象的出发点不在精神现象本身，而在于分析精神现象背后的社会价值观念，构建精神世界的落脚点也不在编织理想本身，而在于重构支撑理想的现实社会根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与其把精力投入在畅想精神富有的美好状态，不如去解决阻碍精神富有实现的堵点来得更富有成效。紧紧抓住现实矛盾这个制约精神富有的关键维度，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阻碍精神自由发展的现实根由，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与强烈的斗争精神去实际地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2]11}，“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2]46}，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精神富有的根本遵循。而由此构建起来的精神家园，就不只是充实人的精神的寓所，还会带来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丰裕、人的社会生活的协调和优化。以实现精神富有为牵引，中国式现代化将书写出物的全面丰富、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与精神的自由发展协同共进的现代化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论党的青年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2] 冯留建, 王子环.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理论渊源、历史演进和实践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11): 71-80.
- [3] 袁富民, 张晖.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内在结构与促进路径[J]. 伦理学研究, 2023(6): 24-28.

- [4] 柏路.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意涵与价值遵循[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2):64-75.
- [5] 文丰安.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J]. 探索,2023(4):151-163.
- [6] 徐福来,陈琳. 精神富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11-19.
- [7] 晏娜,毕红梅.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精神富有的科学内涵、价值逻辑及实践进路[J]. 理论导刊,2023(7):10-16.
- [8] 代玉启,于小淳. 新时代民众精神富有“坐标系”的构建与形塑[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63-74.
- [9] 陈乙华,曹劲松. 新时代精神富裕的内涵与实践要义[J]. 学海,2022(4):5-12.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于春玲,周赫群. 全民教育:实现人民精神富有的国家行动[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43-149.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唐任伍,史晓雯. 数字技术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现实障碍和实现路径[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0-19.
- [14]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8] 童世骏,文军,等. 我们的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1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0] 王海滨. 马克思开辟的精神哲学道路[J]. 江海学刊,2022(5):58-63.
- [21] 徐海峰. 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重构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关于精神的哲学解读[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4):56-63.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3] 孙正聿. 生命意义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24] 胡海波. 精神生活、精神家园及其信仰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2014(1):19-26.
- [25]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6] 生命线在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中闪耀——习近平主席、中央军委领导和推进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纪实[N]. 人民日报,2014-11-04.
- [27] 江畅. 新时代中国幸福观[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21.
- [2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 [2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31] 廖小琴. 再论人的本质——兼谈人的精神生活之理论根据[J]. 求实,2005(3):26-29.
- [32]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4] 徐秀慧,卢爱国,黄亚果. 数字技术推进精神生活富裕的现实梗阻与突破路径[J]. 重庆社会科学,2024(4):113-125.
-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6]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37] 张志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内涵、关系与路径[J]. 探索,2022(6):158-172.

- [38] 梁启超. 德育鉴[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
- [39] 陈学明. 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微观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
- [4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41] 姜迎春. 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与遵循[J]. 探索,2024(5):155-168.
- [42] 韩庆祥,王海滨. 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人的精神世界重建[J]. 求索,2019(1):4-10.

Principles and Paths for Achieving Spiritual Enrich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XU Sheng, ZHANG Zhiy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Chongqing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meeting people's spiritual needs and promoting people's spiritual enrichment have become a new era topic. From an objective perspective, spiritual enrichment requires a rich material life as the foundation,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as the condition, and prosperous cultural undertakings as the sup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structure, the spirit is rich in ideals and beliefs that transcend reality, cultural concepts that reconstruct history,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to change the world. In general, spiritual enrichment is manifested as giving the spirit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always being full of vit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piritual enrichment is manifested in the whole society as people have faith, the country has strength, and the nation has hope, and in the individual level a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Being rich in spirit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lofty pursuit of a new road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To achieve spiritual enrich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o provide great ideals, values and practical power for a better life on the basis of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l pursuit and practical needs, social orientation and personal orient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realization. Guided by the realization of spiritual enrich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ll write a new chapter of modernity in which the all-round enrichment of things, the high harmony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spirit go hand in hand.

Key words: spiritual enrich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deal and belief, value concept, practical motivation

责任编辑:陈卓

探索

哲学社会科学（双月刊） 1985年创刊

第3期（总第243期） 2025年5月出版

主管/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探索杂志社

邮编地址：400041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160号

电 话：（023）68593010

网 址：<http://www.tszszs.net> 或 <http://suta.cbpt.cnki.net>

总 编 辑：金华宝

副 总 编：王 慧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单位：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内发行：重庆市邮政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渝工商广字011153

PROBE

Philosophy and Soeial Sciences Edition (Bimonthly) (Started in 1985)

No.3 (Sum No.243) May, 2025

Competent Authorities / Sponsor: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Edited and Published: Journal Press of Probe

Postcode and Address: No.160, Yuzhou Road, Jiulongpo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400041

Tel: (023)68593010

URL: <http://www.tszszs.net> or <http://suta.cbpt.cnki.net>

Editor-in-Chief: JIN Huabao

Vice Editor-in-Chief: WANG Hui

Distribution Range: Public offering at home and abroad

Printed: Chongqing Guofeng Printing CO.,LTD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ongqing Postal Service Corporation

Distribution Abroad: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Advertising Business License: 渝工商广字 011153

ISSN 1007-5194
CN 50-1019/D

国内发行代号：78-84
国外发行代号：BM4024

定价：每册15.00元 半年价：45.00元 全年价：90.00元

ISSN 1007-5194



9 771007 519253